

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理環境資源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Geography

College of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台灣 1.5 代年輕回流移民之適應與認同

Adaptation and Self-identities of
Taiwanese Young Return Migrants

陳鈺淳

Yu-Chun Chen

指導教授：姜蘭虹 博士

Advisor: Lan-Hung Nora Chiang, Ph.D.

中華民國 99 年 1 月

January, 2010

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理環境與資源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Geography

College of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台灣 1.5 代年輕回流移民之適應與認同

Adaptation and Self-identities of
Taiwanese Young Return Migrants

陳鈺淳

Yu-Chun Chen

指導教授：姜蘭虹 博士

Advisor: Lan-Hung Nora Chiang, Ph.D.

中華民國 99 年 1 月

January, 2010

謝 誌

希望有一天，能夠看見更寬廣的世界，一直是我長久以來的夢想；進入地理所，是一個契機，讓我有機會去試著實踐我的夢想。

研究所生涯，對我而言，不僅僅是完成了一本碩士論文的過程，更是一段蛻變的時光，讓我知覺、體驗了另一個不同的世界，學習如何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學習跳脫自我設限的框架，用更積極的心情去努力，在不斷試誤、反省、改進的過程中，一點一滴地緩慢成長。回顧這段時間，自己受到了許多人的照顧與幫助；如果論文的完成，可視為一種榮譽，那麼這份榮譽應該歸功於大家，而非我個人的努力。

首先，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姜蘭虹老師，她是個對學術研究充滿熱忱、做事全力以赴、具有包容心又關懷學生的好老師。感謝老師帶著我一起從事研究工作，讓我從做中學；每一次移地研究與訪談的參與，都讓我受益良多，其價值不僅在於學問上的成長，眼界的拓展與各種無形的收穫，亦非文筆拙劣的我依靠寥寥數字所能表達。除此之外，也要感謝老師在論文寫作的過程中，不斷地鼓勵我，給我建議，並包容我在遇到瓶頸時的壞脾氣。藉此機會，也一併向師丈黃老師表達謝意，儘管相處時間不多，黃老師的關懷與堅定的態度，總能帶給我繼續努力的勇氣。

人文組的其他四位老師們，也都是我必須致上謝意的恩師；雖然每一學期的 seminar 課程都讓我覺得很緊張，但老師們的指導，無疑是我進步的重要動力。感謝周素卿老師一次又一次地提點我報告內容中的盲點與需要改進之處，並給予我做研究的相關資料；感謝黃宗儀老師在課堂上耐心地聽我不成熟的發言，並在反覆地討論中，讓我了解左派的精神與關懷；徐進鈺老師雖然惜字如金，但老師的存在就已足夠成為我努力的動力；簡旭伸老師活力十足，總是能夠提出明確的技術性建議，將我從一團混亂的思緒泥沼中拉起，重新做出「賽螃蟹」。除了人文組的老師們，也要向我的口試委員蘇淑娟老師和徐榮崇老師致謝，感謝他們在繁忙的工作行程中抽出時間來評閱我的論文，無論是在思考的方向，或是應注意的細節，都給予我相當多的建議，肯定我的努力，並鼓勵我繼續前進。也許在這兩年半的過程中，我進步得不夠多，但從老師們身上所學到何謂專業的素養，以及自我要求的精神，會是我在未來的人生旅途中，時刻提醒自己，不敢或忘的信念。

除了老師們的指導，也要感謝陪我一路走來的同學、學長姊，與學弟妹們，彼此扶持、互相砥礪；不知不覺地，與你們相處的點點滴滴，成為了我碩士生涯最多采多姿的回憶。已

經畢業的靜珮學姊，就算工作繁忙，仍不忘給我鼓勵；走在前方的驥懋和裕民學長，總會在適當的時機，幫我解答疑惑，給我建議；美麗溫柔的林雅，使人如沐春風，樂於親近；積極奮鬥的巧欣，是個一起討論人生規劃的好夥伴；元氣滿點的智勇(小 P)，幽默風趣，是聊天的好對象；敏真追求學問的態度，讓人佩服；盈君勇往直前的無畏精神，令人欣賞。而同樣選擇進入人文領域的宛婷(小 DA)和欣倩，是非常重要的夥伴，遇到瓶頸時，互相鼓勵，渡過難關時，互相道賀。還有雅晴、耀婷、育源、尚書、俊佳、郁樓、筑筠、依璇、元輔、俊豪…等地理所的朋友們，雖然並沒有太多的時間相處，但是每一次相聚的時光，總是充滿歡笑，令人難忘。

感謝室友鈴雅，在我壓力最大的時候，容忍我陰晴不定的情緒，適時給予我關懷與鼓勵；遠在高雄的靜怡、婉妤、燕如、昭逸和素美老師…以及其他的工作夥伴和朋友們，也謝謝你們做為我的後援，幫我注意大大小小的事情，讓我能安心地在台北完成我的碩士學位；還有韋竹、朝宏、正昌、子揚、泓丞、國良…等，謝謝你們的關心。

藉此機會，也要向提供親身經歷讓我做為研究素材的受訪者們表達誠摯的謝意，感謝你們願意為素未謀面的我，在忙碌的生活中，抽出時間填寫問卷、接受我的訪談；沒有你們的付出，不會有這份論文的產生。並特別感謝劉雅瑄老師、闕河嘉老師、陳韻如老師、冠慧姊、真汝、阿德、Alison、Julie、Linda…等，為我介紹適合的訪談對象，讓這個研究能夠順利進行。

最後，要對我的父母親致上最深的感謝，感謝他們無條件地支持我就讀研究所，讓我能成為全職的研究生，為我的人生開啟另一扇窗，重新體驗得來不易的學生生活；感謝外婆總是給予我精神上與行動上的支持，不求回饋。謝謝健源、亭君、淑芳、佳蕙姊，怡蕙姊和姊夫，在我剛上台北時，給予我必要的協助，讓我能順利地適應在台北的生活；還有姑姑、姑丈、叔叔、嬸嬸、小叔叔、小嬸嬸、芳君、怡君姊和姊夫，你們的關懷與問候，一直是我重要的精神支持。

洋洋灑灑寫了許多，發現不論如何增補，總不足以形容心中的感謝，只能說，自己真的是一個很幸運的人，因為大家的幫忙，讓我能一路平順、不經波折地走過我的研究生生涯。未來，期勉自己能延續現在的精神，在不斷成長與茁壯的同時，也能成為幫助別人的力量。

台灣 1.5 代年輕回流移民之適應與認同

陳鈺淳

摘要

1980 年代，政治解嚴之後，台灣經歷了一段政治與社會皆動盪不安的時期，在經濟起飛時期所產生的中小企業主及中產階級，為了尋求較佳的生活環境以及子女的教育資源，開始有了移居海外的想法；1987 年，政府對於一般民眾移居海外的情形不再加以管制，適逢海外各國陸續施行投資移民法案，使這些有意願移居各國的潛在移民，能符合各國所設立的移入條件，於是台灣移居海外的人數開始大量增加。

近年來，海外移民出現了回流的趨勢，由於缺乏完整的官方統計資料，本研究採用多元方法，參考相關次級資料，以出生於台灣、於 1980 年後自台灣移出的 1.5 代移民為研究族群，在台灣各地進行深度訪談並參與觀察，期望藉由質性研究方式來了解他們遷移的經驗。研究發問包含移出及回流原因，回流後的適應情形及自我認同，以及未來的再遷移計畫，希望能描繪出其整體遷移的歷程與輪廓。

本研究包含 35 位受訪者，均具有大專以上學歷及流利的外語能力，職業類型則包含工程師、設計師、教師、貿易人員、研究員...等不同領域。近半數的回流移民曾有居住第三國的經驗，但情形並不同於空中飛人 (astronaut) 或循環式遷移型態 (circulatory migration)。他們的遷移經驗相當具多元性，遷移原因、回流後之適應情形，及自我認同，皆會依不同的個人背景與移居國家而呈現出不同的風貌，但仍可看出部份的一致性，反映出時代背景與社會脈絡。

從研究結果可得知，1.5 代移民當年移出原因主要受政治與教育因素所影響，之後為了學業、家人團聚、就業、婚姻...等因素，而決定回流台灣；回流決策的產生包含了多重考量，除了個人因素，也受到大環境的影響。回流者即使生於台

灣，在台灣有過數年的生活經驗，回流後仍需經歷一段重新適應的時期，適應的程度及所需的時間，與個人的年齡、個性、語言能力及過往經歷...有關。由於生命的各個階段在不同的國家渡過，年輕移民的身份認同情形顯得複雜，代表著個人對於土地的歸屬感與自我的定位。身份的選擇，除了會受到出生地、公民身份，與居留權等客觀事實的影響，也會因受訪者當下的情形而改變；多數回流移民認為自己是「台灣人」，或是選擇台灣及移居地人民的複合身份，少數受訪者仍對於自我身份認同的選擇顯得猶豫與不確定。回流移民雖對於再次移出皆抱持著開放的態度，但只有 7 位受訪者有明確的移出計畫與時間，多數受訪者認為自己會永遠留在台灣。

關鍵字：回流移民、1.5 代、適應、自我認同、質性研究



Adaptation and Self-identities of Taiwanese Young Return Migrants

Yu-Chun Chen

Abstract

The number of Taiwanese emigrants has increased greatly since 1980s. Among the various reasons accounting for this increase, rapid economic growth,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 increase of personal income and the relaxation of restrictions permitting citizens to go abroad as tourists starting in 1989 are foremost. Other important factors are the introduction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migration policies by various countries targeting skilled and entrepreneurial groups.

Recently, there i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returning young Taiwanese migrants from abroad. They emigrated earlier with their parents at young age, but have returned as grown-ups. With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composed of in-depth interviews and semi-structure questionnaires, this research would like to discuss the motivation of these returnees, the adaptation process and self-identities after returning.

Interviewees of this report wer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Argentina. There were 35 interviews conducted by snow-ball sampling from July, 2008 to January, 2009. Interviewees were drawn from different professions such as finance, commerce, computer scienc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This report indicates young migrants returned for multiple considerations including family and marriage reasons, getting better jobs, escaping serious economic recession and so forth. Even born and living in Taiwan before, returnees still had to experience

re-adaptation process. The factors of re-adaptation are including individual reasons, such as age, sex,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the influence from the majority in the host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of interviews, most returnees considerate they are Taiwanese. This choice reveals the decision of returnees to stay in Taiwan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and hometown although some interviewees are still uncertain about their identities. Most returnees said they may stay permanently in Taiwan while 7 interviewees have planed re-emigra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return migrant, 1.5 generation, adaptation, self-identiy, qualitative research



目錄

圖目錄.....	VII
表目錄.....	V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台灣跨國人口遷移概況	1
一、留學生的遷移情形.....	1
二、移民遷移情形.....	4
第二節 台灣移民主要海外移居地介紹	9
一、美國.....	10
二、加拿大.....	11
三、澳洲.....	13
四、紐西蘭.....	15
五、阿根廷.....	16
第三節 問題意識	19
第二章 移民的跨國遷徙、適應與認同	22
第一節 遷移決策與回流移民	22
一、遷移決策與遷移型態.....	22
二、回流移民研究的興起.....	29
三、回流移民的定義及型態.....	34
四、移民回流因素分析.....	39
第二節 移民的適應	45
一、適應的意涵.....	45
二、影響移民適應的因素.....	48
三、回流移民的適應情形.....	52
第三節 移民的自我認同	58
一、認同的意涵.....	58
二、移民認同之建立.....	60
三、移民之適應與認同.....	64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執行	67
一、研究對象與方法.....	67
二、研究設計.....	68
三、受訪者樣本分析.....	71

第四章 研究結果.....	76
第一節 1.5 代年輕移民回流原因分析.....	76
一、家庭因素	79
二、經濟因素與就業考量	86
三、婚姻考量	92
四、其他因素	94
第二節 1.5 代回流移民的再適應	96
一、回流後的適應情形	96
二、影響年輕移民再適應的因素	106
三、小結.....	116
第三節 1.5 代回流移民的自我認同	118
一、回流移民的身份認同情形.....	118
二、影響身份認同的因素	124
三、小結.....	129
第四節 1.5 代回流移民的未來動向.....	131
第五章 結論	138
參考文獻	141
附錄：台灣 1.5 代年輕回流移民研究問卷.....	146



圖目錄

圖 1：1950 年後台灣犯罪率與民眾評估治安狀況嚴重性趨勢比較圖	6
圖 2：台灣移出人口的比例趨勢與地區別 (1990-2006)	8
圖 3：遷移決策過程的模型	26
圖 4：國際移民的遷移循環示意圖	27
圖 5：研究架構圖	70
圖 6：台灣 1.5 代年輕回流移民遷移路徑概念示意圖	133
圖 7：阿根廷 1.5 代年輕回流移民遷移路徑示意圖	134
圖 8：澳洲 1.5 代年輕回流移民遷移路徑示意圖	134
圖 9：紐西蘭 1.5 代年輕回流移民遷移路徑示意圖	135
圖 10：加拿大 1.5 代年輕回流移民遷移路徑示意圖	136
圖 11：美國 1.5 代年輕回流移民遷移路徑示意圖	137



表目錄

表 1：解嚴之前台灣留學生赴海外人數及主要國家列表	2
表 2：解嚴之後台灣留學生赴海外人數及主要國家列表	3
表 3：1950 年代之後回流台灣的留學生人數統計	4
表 4：台灣移出人口的趨勢與地區別(1990-2006)	8
表 5：歷年台灣出生僑民移入加拿大之趨勢	13
表 6：歷年移居澳洲之台灣、香港、大陸出生移民人數統計表(1985-2002)	14
表 7：台灣移民申請移入紐西蘭之項目及人數 (1987-2001)	16
表 8：阿根廷移民出生地普查 (2001)	18
表 9：回流意願與實際行動參照表	37
表 10：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73
表 11：1.5 代移民回流原因分析	76
表 12：1.5 代回流移民的自我身份認同	119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台灣跨國人口遷移概況

台灣人口跨國遷移的趨勢形成，與國內政治、經濟發展的變動有密切的相關。根據現有的政府統計出版品及委託研究報告中可得知，台灣民眾遷居海外的情形，主要可以分為兩個部份，包含（1）早期以留學身份移出並滯留海外，或是留學生完成學業後，選擇回國服務者，以及（2）解嚴之後，政府放寬移民限制，民眾直接辦理遷出的情形；以下將分別說明。

一、留學生的遷移情形

台灣地區自 1950 年代之後，即陸續出現人民向外移出的現象（蕭新煌等，1994）。在未解嚴之前，台灣民眾出入國境皆需取得內政部出入境管理局所核發的人民出國許可證；早期也有不少留學生赴海外求學，畢業後留在當地就業，並進而取得當地的永久居留權或公民身份，以此做為移出的管道之一。早期台灣政府為了防止人才外流的問題，對於留學生的各項管控極為嚴格，根據 Tsay (2003) 的研究，可將其過程分為五個時期：（1）1962 年之前，是嚴格控管時期（the tightly controlled period）：能出國唸書的只有政府公費考試通過者，名額極少；（2）1962-1975 年，是鬆綁時期（the relaxed period）：政府開放留學生自費出國唸書；（3）1976-1989 年，為監控時期（the screening system period）：留學生需要定期申請出國許可的相關文件；（4）1989 年之後，是開放時期（the open-door period）：解嚴之後，所有關於留學的限制皆取消，自費留學不再受政府任何管制，前往海外的學生人數因此大量增加。

表 1：解嚴之前台灣留學生赴海外人數及主要國家列表

年代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法國	德國	澳洲	紐西蘭	日本
1950-1954	1,383	33	0	4	0	0	0	21
1955-1959	2,557	88	0	6	37	5	0	303
1960-1964	6,362	357	19	52	135	11	0	1,041
1965-1969	10,873	584	29	158	177	24	0	989
1970-1974	9,623	138	44	176	165	27	2	377
1975-1979	18,179	358	128	139	332	24	2	776
1980-1984	26,557	69	102	132	341	15	0	636
1985-1989	28,383	62	203	326	1,508	78	4	943

*1989年7月起，自費留學不需經教育部核准。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際文教事業處 (<http://www.edu.tw/BICER/index.aspx>)

由表1可知，自1950年代開始，台灣前往海外的留學生人數大致呈現增加的趨勢，且以美國為最主要的移居國。美國之所以成為早期最主要的留學目的地，除了美國當時提供獎學金給來自台灣的留學生之外，在台灣方面的情形，高等學府數量有限，入學競爭相當激烈，畢業後不易尋得與學歷相符的工作，因此當年前往美國的留學生形成了一種模式：先在台灣就讀至大學畢業，服兵役後赴美深造，取得學歷後在當地尋找工作，進而申請綠卡並入籍（張玲，2001；Saxenian, 2007）。

二次戰後，美國移民制度的改革，擴大了外籍學生畢業後留在美國的機會，其中最重大的改革是1965年的Hart-Celler Act，新增了一個移民簽證類別給美國境內人力短缺的專業技能從業者，同時取消了各國的移民配額限制；隨後在1980與1990年兩次的修訂法案中，提高了以專業技能類別獲准移居美國的外籍工程師人數，許多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因而能夠在美國長久居留；循此模式赴美的台灣留學生人數在1970、1980年代達到高峰，以舊金山地區為例，1985至2000年，共有約18,000名來自台灣的工程師以專業技術移民項目移入當地，佔當地移民總數的13%；1990年代之後，中國與印度留學生則快速增加(Saxenian, 2007)。

表 2：解嚴之後台灣留學生赴海外人數及主要國家列表

年代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法國	德國	澳洲	紐西蘭	日本
1990-1994	60,253	8,960	13,186	2,603	2,435	6,199	1,987	10,253
1995-1999	65,698	9,829	29,366	2,148	1,719	12,139	2,022	8,047
2000-2004	68,570	11,274	41,567	2,850	1,902	12,464	2,986	8,087
2005-2008	66,294	9,417	34,418	2,996	2,151	10,481	2,250	8,918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際文教事業處(<http://www.edu.tw/BICER/index.aspx>)

1990年之後，留學生的數量遠超乎解嚴之前的人數，且數量仍不斷增加，前往海外的國家，除了日本之外，仍以美國等西方國家為主，前往澳洲與紐西蘭的人數也快速攀升；究其原因，可能適逢當時台灣經濟起飛，政府解嚴，不再限制前往海外深造的管道與名額，加上文化上華人對於子女教育的重視，許多有能力的家庭選擇自費將子女送出國接受教育。依據教育部國際文化教育事業處1988至2003年的留學生人數統計，國人出國留學的主要國家，依人數多寡排列，分別為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除了因為台灣的第二外語訓練為英文之外，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在許多學者的研究中提到，華人父母非常重視英文的學習，認為是提升下一代未來競爭力的重要關鍵，在讓下一代出國留學或舉家遷移時，英文學習環境亦是一重要的考量與動機，因而前往英語系國家（Chiang and Kuo, 2000；Huang and Yeoh, 2005；Ho *et al.*, 2001）。

儘管在張玲（2001）的研究顯示，許多早期的留學生滯留海外，並進而在該國定居，但仍有部份留學生選擇回流台灣，且回流的比例似乎在近年來呈現增加的狀態。依據行政院青輔會在2000年的統計資料，回流的人口中，61%為男性，39%為女性；女性回流的比例較男性低，可能是因為早期出國留學的學生，在性別比例上，男性比女性多，因此造成乍看之下男性回流比例較女性高出許多的數據結果。此外，台灣政府從50年代開始就有機構在從事招攬旅居在外的人才回流的政策，例如行政院青輔會與國科會，但大部份的台灣移民與家鄉之間的聯結，仍是透過親友的人際網絡，並非國家政策（Tsay, 2003）。回流比例在1980

年代後半達到最高，推測可能與當時台灣經濟發展之前景看好有關（蕭新煌等，1994）。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留學生可能因為留在移入地就業，進而轉為移民的身份，但兩者之間並不適合當作對等的看待，留學生出國主要的目的仍是繼續深造或學習新技術，移民基本上是抱持著要在當地生活的想法，回流意願就身份而言應該相對較低；雖然如此，在缺乏更完善之調查記錄的情況下，留學生的回流情形仍是可做為參考的資訊。

表 3：1950 年代之後回流台灣的留學生人數統計

年代	出國的留學生人數	回流人數	回流比例(%)
1950-1959	4,515	400	8.9
1960-1969	21,248	1,172	5.5
1970-1979	31,365	5,166	16.5
1980-1984	28,321	5,269	18.6
1985-1989	35,895	9,611	26.8
1990-1994	135,062	30,328	22.4
1995-1999	80,766	7,627	9.4

Source: Tsay, C. (2003) Taiwanese: significance, characteristics and policies on return skilled migration, In: Iredale, R., Guo, F. and Rozario, S. (eds.), Return Mig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112-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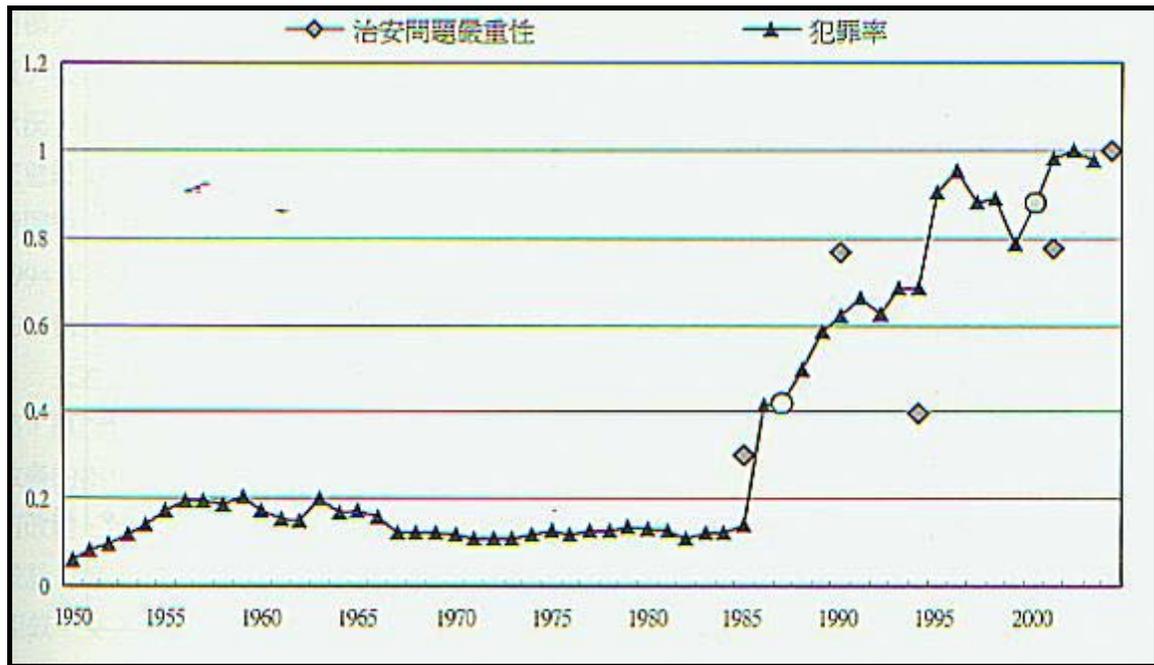
二、移民遷移情形

除了留學生以外，台灣歷史上也曾出現過幾次較大規模的人口移動，在1970年代的移出潮，大致與台灣在國際上的孤立所引發的恐慌有關，如台灣退出聯合國，及台美斷交等重大政治事件。1980年代的後半，因1987年的政治解嚴而出現另一個人口變化的高峰，人口統計數字中出現了大量的移出與移入人口，移出的原因，可能是因為解嚴前後，一般民眾對於政治上的不確定性感受較深，產生不安全感，因而造成較強烈的移出動機；同時期，台灣的經濟活動呈現活絡的景象，

可能因此吸引了大量原本有移出企圖的人口留在台灣發展，也同時吸引了已移居海外的移民回流（蕭新煌等，1994）。

1990 年起，移出的人口數又呈現大幅增加的趨勢，移入人數跌至谷底，這個時期移出人口的增加，除了原有對於台灣政治因素所感到的不安外，也反映了中產階級對於生活品質、教育機會，以及治安問題的憂慮，政治的因素已不是移出唯一的推力，社會與經濟面向的問題逐漸成為重要的移民因素（蕭新煌等，1994）。

1990 年代之後的移出高峰，除了反應許多民眾在股市與房地產市場直接或間接受益後，擁有足夠的財富之後，考慮到國內生活環境不佳，以及子女教育等問題，同時因為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國開放投資移民項目，使得高收入的移民有機會移往海外，也有部份的家族企業為了拓展海外事業，選擇讓部份家庭成員移居海外。此外，解嚴之後的社會動盪也成為移出的動力之一，由圖 1 可看出，1985 年之後，台灣治安敗壞，犯罪率快速提升，民眾之不安全感也急速升高，1990 年代初期社會上更陸續發生多件手段兇殘的綁架或滅門事件，引起民眾普遍之恐懼，促使不少有能力的民眾下定決心移居海外（蕭新煌等，1994；姜和徐；2000；姜和宋，2001；徐和齊；2004）。



資料來源：瞿海源、張苙雲編 (2005) 台灣的社會問題 2005，台北市，巨流。

圖 1：1950 年後台灣犯罪率與民眾評估治安狀況嚴重性趨勢比較圖

關於台灣實際的跨國遷移人數，其實並沒有明確的統計數字。1989年之前，移民資料的來源之一，是內政部出入境管理局所核發的人民出國許可證¹，依照出國的事由及地點做資料的登錄，然而，由於此項目是由申請者自行填寫，且無法驗證內容之可信度，使得移民資料的正確性受到相當大的限制（蕭新煌等，1994）。目前，台灣地區國際移民人數的統計缺乏專責機構做統整性地記錄，雖有登記出入境的統計資料，如《中華民國僑務統計》、《中華民國台灣地區警政統計月報》、《台灣警務統計資料》、《台灣省統計年報》、《中華民國台灣人口統計季刊》、《台灣省各縣市之統計要覽》等期刊，但出入境的資料並不能等同於確切的移民統計資料，且各期刊內容之完整性、可信度，及統計的結果皆有所差異，只能從中以間接的方式了解人口遷移的概況（蕭新煌等，1994）。

¹ 解嚴之後，台灣政府於 1989 年停止核發許可證的作法。

以移民現況來說，2007年監察院公佈關於海外僑民情況的調查報告，移民²人口中，女性略多於男性，以15~44歲青壯年人口為主，教育程度極高，具大專以上程度者約佔70%。移居海外僑民當中，單獨居住海外者占28.3%，以澳洲比例最高。所有獨居移民中有六成仍在求學，小家庭型態之遷移者佔全體移民的45%，在紐西蘭、加拿大等地的比例超過五成。移居海外的僑民有七成仍有家人居留台灣，其中有62.2%是父母留在台灣，子女留在台灣的只有7.7%，由此推知，為了子女能得到更豐富的教育資源或個人尋求繼續深造，仍然是移民的主要因素之一。

參考內政部委託政治大學所做的《2006年人口政策白皮書》內容可知，在過去十多年來，移出人口從1990年的26,180人，降低至2006年的7,453人，似有漸漸趨緩之走勢。而移出國家之選擇，仍以美國與加拿大比例為高，在1991年至2006年間，移往美國（45%）、加拿大（31%）者即佔所有移出人口之76%，其次為紐西蘭（10%）及澳洲（7%）。移民對於移居地之選擇，除了個人偏好與目的，以及社會性的影響因素，如親友建議以及社會集體偏好之外，影響甚重的因素之一是移入國所設定的移民門檻。因此，以下將分別瀏覽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四個台灣移民之主要移居國的情形；此外，由研究者自身之經驗出發，發現近年來似乎也有不少從阿根廷等中南美洲國家回流的移民，因此也對當地情勢做簡單的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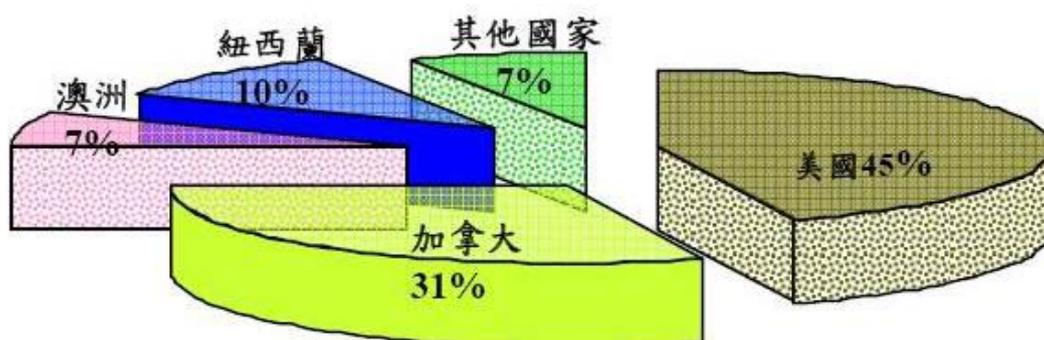
² 此處的移民界定為在國內設有戶籍，但目前經常居住海外之台灣國民及其家人，不包含居住於中國及香港、澳門地區的移民。

表 4：台灣移出人口的趨勢與地區別 (1990-2006)

年代	美國	加拿大	澳洲	紐西蘭	巴西	阿根廷	巴拉圭	南非
1990	15,151	3,681	2,988	2,118	111	446	119	1,382
1991-1995	63,356	36,913	8,385	26,762	694	4,270	1,682	5,247
1996-2000	42,997	42,506	7,133	2,763	2,656	1,813	1,102	1,107
2001-2005	24,289	13,264	5,187	2,363	665	284	262	731
2006	4,059	2,121	752	227	45	77	2	0
總計	151,852	98,485	24,445	34,233	4,171	6,890	3,187	8,467
所佔比例	45%	31%	7%	10%	2.1%	3.5%	1.6%	4.3%

(單位：人)

資料來源：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http://www.immigration.gov.tw>



資料來源：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http://www.immigration.gov.tw>

圖 2：台灣移出人口的比例趨勢與地區別 (1990-2006)

第二節 台灣移民主要海外移居地介紹

隨著全球化興起，世界經濟結構產生重大的轉變，已開發國家從傳統的製造業轉向高科技及服務業，特別是金融、銀行業與貿易等方面（Wu, 2003）；美、加、澳、紐等國家希望能改變本身的結構，以增加全球競爭力，於是陸續修改具有種族歧視的政策與法律條文，試圖營造族群和諧的社會面貌；例如加拿大在 1962 年提出的 *Immigration Regulation*，美國在 1965 年公布的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澳洲在 1973 年由工黨執政後，聲明放棄白澳政策；紐西蘭則在 1978 年宣布，以後的政策及正式聲明中，不應該再有任何有關同化（*assimilation*）以及限制亞洲移民入境的敘述。

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政府也開始思考開放移民的好處，認為移民能帶來投資當地的資金、創造就業機會，也能提供新的經濟結構所需的人才（Liu and Cheng, 1994）。此時，東亞的新興經濟體正好踏入以高科技及服務業為主的階段，可同時提供不同類型的人力資源（Sassen, 1998），於是，各國開始歡迎來自這些國家的移民，利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來吸引及篩選具有高教育水平及專業技能的人才移入，例如澳洲在 1981 年的 *Business Migration Program*，加拿大於 1978 年的 *Business Immigration Program*（Wong, 2003），以及美國的 1990 *Immigration Act*（Tong, 2003）。

基本上，這些國家雖然採取較歡迎的態度來對待新移民，但畢竟仍是以國家本身的需求做為主要考量，因此並非所有提出申請的移民都會被接受；以香港而言，實際成功移出者，被稱為「yuppies」，其特色為年輕（*young*）、教育程度高（*educated*）、社經地位為中產階級以上（*middle-class*）並具有專業技能者（*professionals*）；以 1988 年香港政府的 *social indicators survey* 為例證，可發現成功移出者有 25.7% 在 30 歲以下，44.2% 月收入高於 10,000 港幣，36.9% 的職位

為管理階層，29.5%為高科技從業者；而這群人之所以能成功移民，主要是因為他們對移入國有正面的幫助（Wong, 1992）。

以加拿大的狀況為例，全球化時代來臨後，在激烈的競爭之下，加拿大政府面臨了一些困境，例如財務狀況不佳、稅收減少、國家主權及政府權力受到挑戰，失業率升高及平均工資下滑等問題，需要資金及人才來改善整體經濟狀況；正好遇到東亞的經濟起飛，以及政策限制的解除，產生了一批較富裕且本身條件較佳的潛在移民，於是加拿大政府以「經濟公民」(economic citizenship)的角度出發，向這些可能移民的族群招手；除了放鬆對移民的限制之外，也有做宣傳的動作，例如舉辦說明會與博覽會；並利用「積分制度」(Points System)來挑選具有一定資產，或本身具專業技術的移民，讓他們到加拿大投資，一方面帶來資金，一方面提高加拿大的就業率，以振興經濟（Wong, 2003）。

於是，在台灣開放移出，以及各國接受移入的情況下，移居海外的台灣移民快速增加，以下將對各主要移入國的情勢做簡要的介紹。



美國長期以來是台灣移居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二次戰後，美國一直與台灣地區保持政治、軍事、經濟與文化上的密切關係，透過民間貿易的往來與大眾傳播媒介的所傳達出的美國形象是比較正面的，它的民主政治、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和良好的生活品質，吸引了許多與美國有密切往來之國家的人民前往移居，台灣也是其中之一。早期台灣地區有許多的留學生前往美國，並在當地定居，透過他們，在台灣民眾更加了解了美國生活的具體內容，相對於其他國家，一般台灣民眾似乎對美國擁有一種建構於媒體與自我想像之上的憧憬及熟悉感，因而加強了移居美國的偏好（蕭新煌等，1994）。

相較於其他移民國家如加拿大、紐西蘭、澳洲等地，美國有較繁榮的經濟，

可以提供較被看好的工作機會。此外，以子女教育為主要考量的移民，相對於台灣被垢病的填鴨式教育，美國式啟發而自由的教育方式，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且在基礎教育方面，美國的學區採開放式政策，居住在該國的學童一律可以上公立學校。

在僑委會委託蕭新煌等人（1994）針對美國移民所做的研究報告中顯示，民眾移出台灣的原因依序為：（1）有利於事業發展、（2）子女教育問題、（3）國內政局不穩、（4）台灣生活品質差、（5）出國深造、（6）台灣社會治安太差。選擇遷居美國的因素則依序為：認為在美國可得到較佳的工作機會、為了子女教育而移居美國、為了繼續深造而前往美國。多數能成功前往美國定居的移民，已有親人在美國，依據美國於 1965 年公佈的新移民法案中鼓勵家庭團聚的條例，幫助仍留在台灣的親友以依親的管道申請移入。

在現實條件考量上，對於部份有意願移民的中產階級而言，美國所設定的移民門檻是較難以跨入的，於是，部份有意願遷居美國的移民，經過了全盤的考量，如本身條件、移民目的、移民門檻、時間、資金成本...等，可能退而求其次選擇移居其他國家。

二、加拿大

台灣移民之所以選擇加拿大做為移居國，以個人或家庭層面來說，主要是希望能有更好的生活環境，並兼顧小孩能獲得西方啟發式教育之目的；Chiang（2008）的研究呼應了此一看法：在台灣競爭激烈的教育體制之下，成績不好的學生認為在學校會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父母則認為孩子在台灣的环境下無法獲得與在加拿大一樣的教育資源與學習機會，因此有意願遷居海外。進一步考量所需付出的資金成本，若是讓子女以國際學生的身份前往求學，需付出高昂的學費，若是擁有移民身份，加拿大是社會主義國家，在教育及醫療方面的開銷，政府都

有所補助，整體的代價反而可能較低；況且，加拿大距離美國較近，子女仍然有機會到美國接受高等教育，符合國人對於接受美國教育的偏好。

由上可知，與美國的地緣關係便成為華人移民加拿大所考量的其中一個附加價值，如鍾佳君（2007）的研究結果所示，大多數移民加拿大的人，多是礙於辦理美國移民門檻太高，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選擇加拿大，或是把加拿大當作是進入或了解美國的途徑之一，加拿大可謂台灣移民心目中僅次於美國的選擇。依時間成本而言，若選擇以依親項目移入美國，即使有親人定居美國，大部份的人仍需要花多年的時間等待許可，台灣移民若考慮到小孩教育與兵役問題，則無法等待多年，希望能快速獲得移民許可。比較美國與加拿大的移民規定，加拿大移入的門檻較低，取得身份的時間也較短，需要在當地居住三年以上，相當適合迫切需要移出台灣，或是無法長久居留於移居國的移民。

以移民所需的資金成本而言，美國之商業移民的投資金額需要 50 至 100 萬美元（約 1612 萬至 3225 萬台幣³），且移入後需從事實際經營行為。若申請加拿大的商業移民項目，除了主要申請需達到積分制的要求之外，本身所擁有的淨資產與投資的金額合計範圍在 44.3 萬至 100 萬加幣之間（約 1300 萬至 2900 萬台幣⁴），依各省規定有所不同，但總體來看，所須資金較美國少了約 300 萬台幣。除了資金需求較少之外，其他規定也有利於台灣移民，例如加拿大政府並未要求移民者在原居國需要有相同的職業、背景或工作經驗，對於移入後的資金利用也只做原則性的規定，因此許多台灣移民傾向將移入的資金交給專業經理人操作，免去自己經營的困難；甚至可能在達成法定期限的要求之後，便將資金撤出加拿大，回到原居地運作（Wong, 1997）。

於是，加拿大逐漸受到台灣移民的青睞，成為可以理解的事實；自 1980 年代開始大量移居加拿大，並在 1990 年代達到高峰，移入的管道多以商業和投資

³ 台幣對美元的匯率主要參考台灣銀行於 2009 年 5 月 9 日的牌告匯率，為 1：32.25。

⁴ 台幣對加幣的匯率主要參考台灣銀行於 2009 年 5 月 9 日的牌告匯率，為 1：29.28。

移民為主，依據 2001 年加拿大統計局的資料，台灣出生之移民⁵主要居住於溫哥華（64.1%）、多倫多（22.0%）及卡加利（2.2%）三大城市；選擇定居溫哥華的原因是喜愛當地優美的生活環境、華人人數較多，以及距離台灣較近；選擇定居多倫多的考量多半與求學、工作機會多，以及事業發展等方面有關（徐榮崇，2008）。

表 5：歷年台灣出生僑民移入加拿大之趨勢

移民年代	總計	女性	男性
1961-1970	1,255	645	610
1971-1980	3,540	1,990	1,545
1981-1990	8,530	4,655	3,870
1991-2001	53,750	27,600	26,155
1991-1995	23,405	11,885	11,520
1996-2001	30,345	15,715	14,630

資料來源：徐榮崇、齊力 (2004) 2004 年加拿大台灣僑民現況之研究，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澳洲在 1973 年廢除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1979 年頒布施行澳洲多元文化政策（Australia's Multicultural Policy）以鼓勵多元文化發展，1981 年追隨加拿大的腳步頒布商業移民法案（Business Immigration Program），由於地緣關係而特別向來自東亞的移民招手，亞裔移民迅速成為最大的移民族群。1980 年代末期及 1990 年代初期，澳洲政府由工黨出身的 Hawke 總理所領導，積極推動與亞洲企業之間的聯繫，台灣因此被澳洲列為接受經濟與商業移民的來源國之一，移居澳洲的台灣移民人數在 1980 年代末期快速增加（徐榮崇，2001）。

儘管在 1990 年代曾一度有反對移民的聲浪出現，但澳洲仍然是台灣移民喜

⁵ 台灣在加拿大的人口統計資料中，並未單獨成為一移民來源國的統計項目，因此只能以出生地來做為判斷依據。

愛移入的主要國家之一。透過類似於加拿大的積分制度的移民篩選機制，進入澳洲的台灣移民多具有專業技能、高教育程度，以及相關的商業經營或其他專長。在澳洲的人口統計調查中，台灣並未被獨立成為移民的來源國家，但仍可從其人口統計資料中得知華人（Chinese）移居澳洲的人數有增加的趨勢，並依照移民的出生地，來間接得知台灣人民移入的情形。

根據 2006 年澳洲普查統計資料，台灣移民有 84.9% 的居住地點集中在雪梨、布里斯本和墨爾本（徐榮崇，2008）。選擇移居澳洲的原因，Ip *et al.*（1998）認為主要是在於教育與家庭因素，對於澳洲的自然環境與生活型態的喜好，大於經濟發展性的考量；姜和徐（2004）在實際的訪問調查中也認為，移民的考量多半是為了下一代著想，生活環境和教育資源為澳洲最大的吸引力。

表 6：歷年移居澳洲之台灣、香港、大陸出生移民人數統計表(1985-2002)

抵達時間	出生地			單位：人數/百分比 台灣出生居留 人數與澳洲所 有居留人數比
	台灣	香港	大陸	
1985 - 1986	381	3,117	3,138	0.4
1986 - 1987	804	3,398	2,690	0.4
1987 - 1988	1,146	5,577	3,282	0.8
1988 - 1989	2,100	7,307	3,819	1.4
1989 - 1990	3,055	8,054	3,069	2.5
1990 - 1991	3,491	13,541	3,256	2.9
1991 - 1992	3,172	12,913	3,388	3.0
1992 - 1993	1,434	6,520	3,046	1.9
1993 - 1994	785	3,333	2,740	1.1
1994 - 1995	794	4,135	3,708	0.9
1995 - 1996	1,638	4,361	11,247	1.7
1996 - 1997	2,180	3,894	7,761	2.5
1997 - 1998	1,518	3,194	4,338	2.0
1998 - 1999	1,556	1,918	6,133	1.8
1999 - 2000	1,699	1,467	6,809	1.8
2000 - 2001	2,599	1,541	8,762	2.4
2001 - 2002	1,715	931	6,708	1.9

資料來源：姜蘭虹、徐榮崇（2003）澳洲台灣僑民現況之研究，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四、紐西蘭

紐西蘭跟隨加拿大、澳洲的腳步，於 1986、1991、1995 年分別修訂移民政策，和澳洲情形類似，為了吸引人才及投資，加以地緣關係的考量，來自亞洲的移民成為紐西蘭政府招攬的主要對象 (Ip, 2003)。從台灣移入的人數，自 80 年代開始增加，在 90 年代初期形成高峰，96 年之後人數慢慢減少，中國成為華人移民的主要來源地。由於台灣在紐西蘭政府的統計作業中，並未被設定成一個移民的來源國，因而台灣移民的資料實際上是被涵括在「華人」(Chinese) 的族裔選項之中，或是只能以出生地的資料來了解台灣移民的情形，所得的訊息必然與實際人數有所出入。

台灣移民當地的家庭型態，除了年輕人獨自前往接受高等教育之外，以小家庭型態為最常見。以移入的管道來說，早期(1987 至 1991 年)是以商業移民(投資移民)為最大的移入項目，但在 1991 年後，多數台灣移民的主要申請人轉而選擇以技術移民的身份移入當地 (Ip, 2003)。台灣移民會選擇遷居紐西蘭，除了自然環境優美之外，紐西蘭的生活環境比較單純，氣候宜人，在 90 年代初期適逢澳洲出現排外的聲音，於是較多的移民選擇紐西蘭做為移居地；以政策面而言，紐西蘭移民政策對於投資金額的要求較美國、加拿大、澳洲低，且紐西蘭政府允許移民在得到移入許可後，有兩年的緩衝期，不需立刻移入，這對於一些需要時間處理在台產業的移民而言是一大誘因。另外，紐西蘭在台灣人的印象中，是個美麗、自然而友善的地方，教育方面較自由、全人，且具支持性，對於小孩的人格培養有助益 (Ip, 2003)。

表 7：台灣移民移入紐西蘭之項目及人數（1987-2001）

	Business	Skilled	Family	Other	Total
1987-1991	5,676	--	105	182	5,963
1991-1996	1,842	24,475	696	355	27,368
1997-2001	783	1,264	1,097	130	3,274
Total	8,301	25,739	1,898	667	36,605

資料來源：Ip, M. (2003) Seeking the last Utopia: the Taiwanese in New Zealand, In: Ip, M. (ed.), *Unfolding History, Evolving Identity*, 185-210.

五、阿根廷

除了美、加、澳、紐四個主要移民國之外，近年來，研究者從個人經驗出發，遇到了不少來自南美洲，特別是阿根廷的回流移民，且阿根廷也是台灣移民的主要移居國之一，因而在此亦對於阿根廷台灣移民的狀況做概略介紹。然而，台灣僑民移居阿根廷的情形，不論是在台灣或是阿根廷當地，皆缺乏完整的統計資料，國內的相關研究數量亦不豐富，因而在相關背景上，所知較美、加、澳、紐四國的僑民受限。

台灣與阿根廷於 1945 年建立正式外交關係，1972 年，阿根廷政府承認中國政府的地位，遂與台灣斷交，台灣外交部駐阿根廷的單位更名為「台灣貿易辦事處」(Taiwan Commercial Office)，於 1995 年再次更名為「台北貿易文化辦事處」(Taipei Commercial and Cultural Office)。

台灣僑胞移民阿根廷的時間甚短，只有約三十年的歷史（僑委會，2004）。阿根廷政府於 1960 年代之後，開始制定吸引移民的相關法規，以商業移民及技術移民等項目鼓勵外國人士申請移入，並藉此取得當地發展所需的資金與勞力（Albarracin, 2004）。1987 年，阿根廷政府的移民管理部門（National Migration Office）修訂移民條款，鼓勵具有資金的投資移民移入，促成了來自台灣與中國移民人數的增加（Bretal, 2005）。由於其移入門檻較美、加等國寬鬆，申請等待所需時間亦相對較短，加上與美、加之間的地緣關係，對於條件不符而無法直接申請移入美加境內的移民，是個值得考慮的遷移中點站。

阿根廷的移民法規接受屬人 (*jus sanguinis*) 與屬地 (*jus soli*) 兩種雙重申請管道，凡是在當地出生者，或阿根廷公民及永久居民之配偶、子女等直系親屬皆可申請永久居留 (阿根廷商務文化辦事處，2009)，不僅承認其雙重國籍，更數次大赦讓來自附近國家的人民申請永久居留權 (新華社，2004/09/16)。相較於台灣經濟起飛之前，早期阿根廷的經濟情況相對甚佳，於 1985 年之前，阿根廷的人均 GDP 均高於台灣 (行政院主計處，2008)，加上當時台海政治的不穩定，阿根廷曾一度成為部份台灣移民心中的理想移居地點之一。僑委會關於台灣僑民移入國家的人數統計資料顯示，阿根廷高居台灣移出人口總排行的第六位，其中最主要的移民潮出現於 1980 年代初期，90 年代之後，來自台灣的移民人數逐漸減少，來自中國的移民則快速增加 (Liu, 2009)。

Zuzek (2004) 曾在 1998 年針對定居在阿根廷的台灣移民家庭做過調查研究，所得結果顯示，有 26% 的移民家庭在 1980 年之前移入，58% 於 1980 年代移入，於 1990 年後移入的只佔了 15%；移入的項目中，42% 是以投資移民身份進入，36% 是辦理依親，4% 則是受僱前往當地。選擇移入阿根廷的原因包含：(1) 希望給小孩更好的未來，佔 28%；(2) 為了更好的生活環境，佔 26%；(3) 因為台灣政治局勢不穩定而移出，為 17%；(4) 為了其他因素而移出，主要是由於經濟因素，以及台灣社會動盪，覺得生活缺乏保障。目前台灣移民有 94% 居住於首都布宜諾賽利斯，86% 的移民人口從事自營生意或受僱於同族裔者；而當地的移民子女，有 69% 就讀私立學校，8% 會前往他國完成大學以上的學業。

由上述內容可得知台灣人民移入的趨勢，以及大致的情形，但實際的移民人數，不同單位所認定的結果出入甚大。台灣駐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的台北貿易文化辦事處認為目前在阿根廷的華人數量約有 40,000 人，其中來自台灣的僑民約有 10,000 人，除了少部份是來自巴拉圭或巴西等地的再移民，其餘則多來自中國及其他地方，但阿根廷官方的統計數字認為來自台灣的人口數只有約三千多人 (INDEC, 2001)。

表 8：阿根廷移民出生地普查（2001）

出生地	總人數	性別和年齡											
		男性					女性						
		總數	0~14	15~24	25~49	50~64	65+	總數	0~14	15~24	25~49	50~64	65+
總人口數： 36,260,130；總移民人數： 1,531,940													
中國	4,184	2,365	84	330	1,512	342	97	1,819	96	252	1,123	266	82
南韓	8,205	4,143	190	476	2,169	995	313	4,062	162	447	2,198	948	307
日本	4,753	2,331	150	55	399	858	869	2,422	122	40	445	700	1,115
台灣	3,511	1,786	179	356	848	341	62	1,725	168	316	886	304	51

資料來源： INDEC. Argentinean Population, Home and House Census 2001.

除了阿根廷之外，在拉丁美洲國家中，台灣與巴拉圭也曾有正式的邦交關係，因此巴拉圭曾是台灣僑民移居拉丁美洲的主要地點之一（僑委會，2001），可能以此做為中點站，再轉遷移至其他國家。阿根廷在拉丁美洲算是較富裕而強盛的國家，若再次遷移至阿根廷是可以理解的選擇之一，不過，對多數華人移民而言，美國才是主要的目的地（Liu, 2009）；即使已移居至阿根廷，再次遷移的可能性仍相當高，而此種可能性顯示出了台灣移民在拉丁美洲之遷移歷程的複雜性。

台商在當地經營的事業，早期多以開設餐館及經營小型超市等自營事業為主；90年代初期及之前，當阿根廷經濟正當榮景時，經營超市的日營業額普遍超過 1,000 元比索⁶，對於多數移民而言，獲利率頗高。後來阿根廷本地與外資合作經營的大型超市相繼出現，加上來自中國的移民增加，彼此從事的生意類型接近，龐大的競爭壓力，使得獲利降低，也間接降低了移民前往或停留在阿根廷的意願（僑委會，2004）。

⁶ 當時阿根廷政府採用固定匯率的金融政策，一比索可兌換一美元，直到 2000 年底經濟危機之後才取消此作法。（CIA, 2009）

第三節 問題意識

在瀏覽過台灣的國際人口遷移趨勢，以及海外主要移居地的概況之後會發現，台灣移民向來是以教育程度較高的青壯年移民為主，遷移的型態也從個人逐漸轉移到以家戶為遷移單位；除了早期留學生滯留海外可能造成的人才外流情形，近年來，隨著國際遷移的趨勢，以商業移民管道為主要的移出方式，不僅是人力資源的移出，更伴隨著大量的資金外流；而移居海外的原因也逐漸從害怕政治不穩定轉而更加強調教育目的及追求更好的生活環境。

近年來，台灣的國際遷移人口出現回流的趨勢（蕭新煌等，1994），但目前政府並沒有專職機構對於回流移民的情形加以記錄；在缺乏官方統計數據可加以佐證的情況下，只能間接以回流意願來探查移民回流的趨勢。就台灣移民人數較多的美、加、澳三國為例，僑委會於 2006 年所做的調查報告顯示，美國僑民考慮回台者佔 33%，不確定者為 31%，主要回流原因則是基於落葉歸根的心態；加拿大僑民有意願回流者為 33%，不確定者為 20%，考量因素則為就業與落葉歸根；澳洲則有 33% 的僑民考慮回台，47% 的僑民抱持著不確定的態度，回流考量則與加拿大移民類似（大紀元，2007/10/04）。

目前國內關於回流移民的資料，除了上述的抽樣調查報告之外，還有政府的委託研究報告，如蕭新煌等（1994）所著「台灣地區移民及其在美國的調適過程與回流轉向」、徐榮崇與齊力（2004）所作「加拿大台灣僑民現況之研究」，以及姜蘭虹與徐榮崇（2005）所完成的「澳洲台灣移民第二代的就業適應與回流之研究」；另外，國內也有部份學者從事相關的學術研究，試圖藉由現有的人口統計資料及實地調查，來描述了移民回流的現象，如廖珮君等（2005）「年輕移民在台灣、澳洲兩地之間的流動原因、適應與自我認同」，以及 Chiang and Liao（2008）「Back to Taiwan: adaptation and self-identity of young Taiwanese trans-nationals」

等。在閱讀過相關調查報告與學術文章後，研究者亦從自身經驗現象出發，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了移民回流的情形，啟發了作者對於回流移民現象的研究動機。

就直觀的想法而言，移民是為了能有更好的生活與發展，才會選擇離開台灣，既然如此，在海外生活了如此多年之後，為何再次選擇回到台灣呢？以前述報告內容來看，落葉歸根的觀念是影響移民回流的最重要因素，但此因素顯然不適用於年輕的回流世代，於是，促使居住於海外的年輕移民回流台灣的因素是什麼？是當年使他們外移的推力消失，或是台灣社會出現了其他的拉力而吸引其回流？回流之後的生活與發展，是否符合他們的期待？海外生活的經歷，對他們回台後的適應及發展，有著什麼樣的影響？他們對於自我的看法為何？未來是否會留在台灣，還是會再次移居海外呢？

綜合整理以上的問題之後，研究者提出了以下的主要發問，並以此做為整體研究設計的主軸：

- 
- (一) 年輕移民回流決策的形成，包含哪些影響因素？與他們當年移出時的考量有哪些相似或相違背之處？而其海外的經歷是否是促成其回流決策的因素之一？
 - (二) 回流之後，對於台灣社會適應的情形如何？需要多久的時間才能適應？在哪一方面遇到適應上的困難？在海外生活的經驗對於他們在台灣適應與發展造成什麼影響？
 - (三) 回流移民對於自我的看法為何？其身份認同為何？是何種因素導致形成此種對自我認同的看法？
 - (四) 回流者將來的動向為何？是否會再次走上遷移的道路？

基於以上的研究擬旨，研究者著手進行了相關的文獻瀏覽，主要可分為四類：

- (一) 第一類探討遷移決策的形成、遷移型態的演變，以及造成改變的因素；內容包含了傳統的人口遷移理論、遷移型態，以及在全球化的影響下，遷移型態的改變，並點出人口遷移研究取向的轉化。

- (二) 在上述的內容中，研究者發現回流移民在傳統的跨國人口遷移研究中的角色是不明顯的，直到近年來，才受到相當的重視。於是，在第二部份的文獻回顧中，研究者試著閱讀早期學者實地研究關於回流移民的情形，以及回流的各種型態，並特別留意華人回流移民之相關研究，探討促成移民回流的因素。
- (三) 第三部份是關於移民的適應情形，先介紹移民適應的相關理論，再了解現有文獻中，關於回流移民再適應的狀況，並特別著重在華人移民回流後的適應情形。
- (四) 最後一部份的文獻是關於移民的認同，包含何謂認同，生活在主流與族裔文化相互影響的情況下，移民如何逐步建構其自身的認同，並回顧在全球化時代下，跨國遷移者之自我認同的情形。

下一章主要呈現相關文獻內容，第三章則討論整體研究架構的設計、研究方法的選擇、問卷的設計，以及實際的訪談工作。



第二章 移民的跨國遷徙、適應與認同

第一節 遷移決策與回流移民

一、遷移決策與遷移型態

所謂「遷移」，不僅只是地理距離上的移動，還代表著進入另一個不同文化系統之社會定居一段時間的概念；由於遷移管道並非暢通無阻，原居地的移出機會結構、移入地區的移民要求與社會接納程度，以及整個遷移過程需付出的成本以及必須跨越國界的障礙，包含有形的資金與無形的社會資本，使得遷移行為本身充滿了選擇性，不僅是移民對遷移地點的選擇，也是兩地的社會結構對於遷移者所做的篩選；換言之，遷移者是在本身條件及社會結構共同作用下所產生的，而非移出社會中的隨機樣本體，遷移行為也無疑是多方因素作用下的產物。

國際人口遷移現象的研究，在傳統的理論基礎上，多歸因於經濟因素的影響，如以新古典投資理論為基礎，芝加哥學派的Schultz和Sjaastad提出以人力資本觀點來解釋人口遷移的說法，認為遷移行為是否能為個人帶來淨利潤，是遷移決策被實現的最主要原因，包含薪資差異、社會資源、事業發展等有形與無形的價值。以哈佛學派Kuznets和Thomas為代表所提出的人口選擇性理論，則是從區域經濟的角度解釋人口遷移的原因，將人口移動視為對區域經濟機會的調適，而區域經濟機會的改變則受到技術發展的影響。

近年來，關於人口遷移的研究，由早期利用各種統計分析資料建立原則性理論架構的傳統作法，逐漸發展出不同的取徑與面向，越來越強調以移民個體做為決策的核心，以人本主義地理學的方式，來探討移民的生命歷程與遷移經驗（宋

郁玲，2006)，而研究內容也逐漸關注隨著遷移行為而產生的社會文化因素以及隨之而來的各項議題（Jones, 1992）。

於是，若關注於移民者本身與遷移決策的形成，會出現下列四種情形（佟新，2003）：

- (一) 生命周期理論：強調生命週期的不同階段，人們所具有的遷移傾向。遷移的第一個高峰期在二十多歲左右，但具體的年齡間距則可能視時代與社會文化的不同而有所變動；處於此年齡層的人，多半未婚，正處於進一步追求學業，或選擇伴侶、尋求事業發展的初步階段，有較大的可能性為了達成學業、事業或婚姻等目的而遷移，且長輩可能也會對這個階段的子女出外闖蕩表示支持與鼓勵；另外一個遷移的高峰期則出現在退休之後。若以家庭結構而言，在第一個孩子出生之前，或最後一個孩子成年離家之後，遷移的可能性較大。
- (二) 職業生涯理論：強調特定職業與遷移之間的關聯性，遷移可能成為因應工作需要，或尋求事業發展的策略之一，例如跨國公司的職員。此種遷移策略出現的可能性與個人的能力及教育程度呈正面相關，受教育程度越高，事業的發展可能性越高，就有更多的機會選擇是否遷移。
- (三) 遷移的成本與收益理論：強調年輕人和高素質人口的遷移較具價值性，因潛在收益較高，而成本較低，不論是有形或無形的成本。
- (四) 遷移網絡理論：除了遷移者本身的個人條件與意願之外，是否擁有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例如在移入地擁有人際網絡之優勢者，較有可能遷移，發展成鍊結式的遷移型態（chain migration）。此種遷移型態強調遷移者與移入地之較早移民者所構成的網絡；此種關係能提供移入地的訊息及移民管道，也能降低遷移成本，減少遷移所需負擔的風險。

就外部的選擇性而言，移入地與移出地本身也在進行著對於遷移者的篩選。移入地區以移民政策、社會結構與規範等方式來找出符合條件的可能移民人選；在移出的社會中，遷移者的形成，會受到年齡、性別、教育程度、職業等相關因

素的影響，較高素質的人力，如教育程度較高、身體狀況較佳、較年輕且富有冒險精神者，對於移入地的正向因素較能做出積極的反應，比在地的其他人口更具遷移的可能性（佟新，2003）；因此，移民的產生，除了考量移居地、移入地的情形之外，也需配合移民者的個人特質、條件、目標與喜好，是在宏觀與微觀因素多重影響之下所產生的結果。

於是，由上述內容可得知，若以遷移過程而言，並非僅具有想要遷移的意願即可能成為遷移者，由於遷移的管道有限且必須付出代價，因此遷移者必然是在原居地的社會中與其他有意願者競爭時，擁有優勢的一方。而若以遷移者本身的選擇性而言，當個體本身已能達到移入國對於移民所設定的門檻，接下來要考量的便是個人的偏好及目的，亦即在遷移行動前之思考與決策時，扣除必須付出的遷移成本之後，所獲得的淨遷移效益有多少，是否足以打動具有遷移意願者去實際執行遷移的決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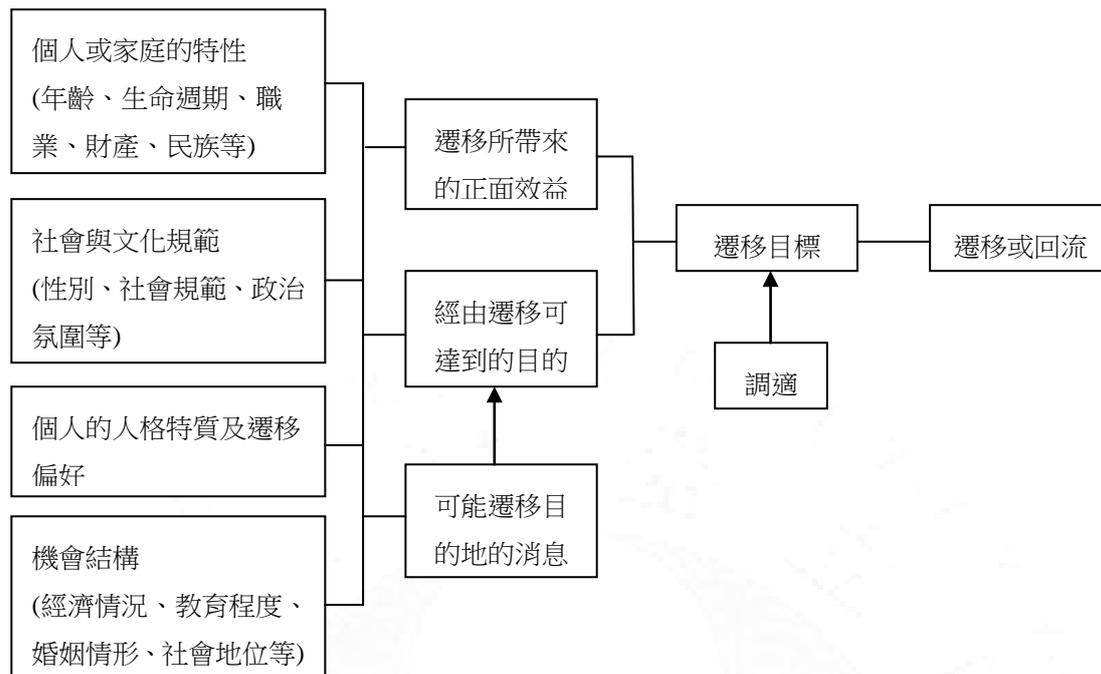
呼應上述的看法，DeJong and Fawcett（1981）提出遷移決策形成的概念模型，認為遷移決策的組成可分為三個部份：

(一) 總體的遷移偏好：無論是個體或家庭的遷移，皆發生在特定的文化與社會環境之中，免不了受到整體大環境的影響，包含對遷移的看法、可能遷移的機會結構、對於移居地之訊息的獲得管道等，因此遷移決策的產生常立基於社會的風氣與對移入地普遍的印象；例如 1980 年代之後，台灣移民前往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地，相關研究顯示，可能是因為台灣政府開放旅遊，移民前往當地觀光後，普遍認為當地環境優美，並具有較具啟發性的教育，因而決定移居該地（Chiang and Hsu, 2006; Wu, 2003; Ip, 2003）。

(二) 遷移到特定地區的動機：除了原鄉促使個體想要移出的原因之外，移居地的選擇，必然是因為當地擁有對移民有吸引力的誘因，可能包含個人想要達成的目標或想要取得的事物，或者移入該地的條件恰好符合移民本身所具備的條件。例如台灣移居至加拿大的移民，除了當地環境優良之外，地近美國也

是某些移民的考量之一（鍾佳君，2007）；部份華人移民選擇前往阿根廷的考量，除了當地移入門檻較低之外，被視為前往美國的中點站也有可能是移入的附帶因素（Liu,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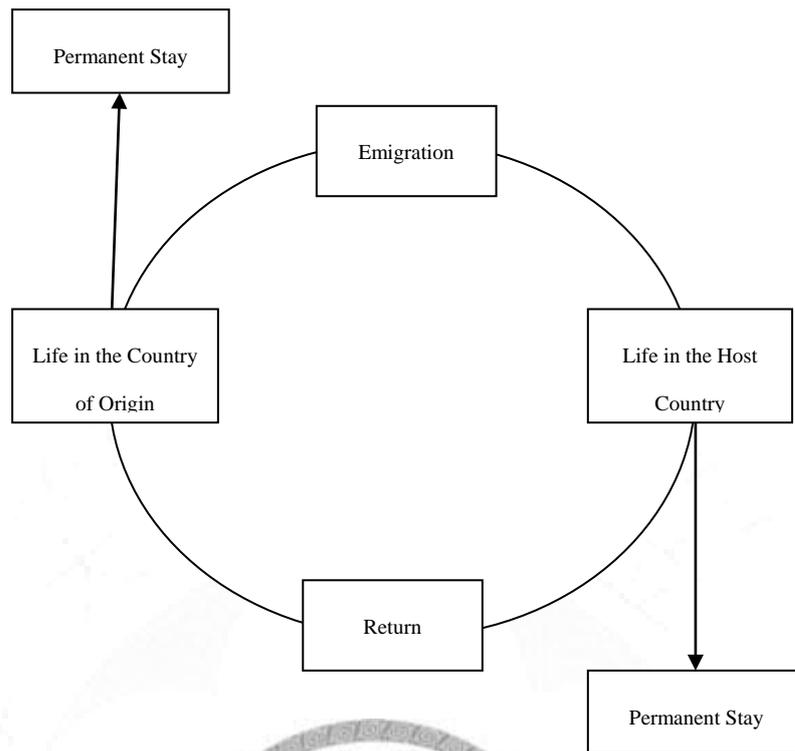
(三) 遷移的實際考量：上述兩個部份，主要形塑了遷移者想要移動的想法，以及想要移動至各地的意願，不過，光只有想法或意願並不必然造成跨國遷移的結果，產生遷移決策不可或缺的部份在於潛在遷移者對於遷移的實際考量，即遷移本身可能帶來的成本與效益。在實務上，對遷移者而言，首先必須考慮的，是自身條件能否達到各國所設定的移入門檻，其次才是關於是否能在在移入地安適生活。就遷移成本與效益兩者比較而言，多數人著眼的是遷移後可能的發展機會，並期待著隨之而來的後續美好願景，換言之，決定是否遷移，除了考量社會的機會結構以外，主觀的認定佔了相當重要的成份，也因此造成了執行遷移決策之後，由於遷移前的認知與想望，與遷移後的生活有所落差，而必經的衝擊與調適過程。不過，遷移的決策常被視為改善家庭生活質量的策略，特別是外在大環境若處於政治與經濟不佳或不穩定的情況下，人們會傾向思考並嘗試遷移的可能性。



資料來源：DeJong, G. and Fawcett, J. (1981) Motivation for migration: an assessment on a value-expectancy model, In: DeJong, G. and Gardner, R. (eds.),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圖 3：遷移決策過程的模型

DeJong and Fawcett 所提出的遷移決策概念模型大致說明了影響遷移行為的因素，雖然國際遷移的存在未曾間斷過，但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其特性和影響力其實不斷在改變，特別是全球化時代來臨之後，由於交通運輸與通訊科技的進步，遷移的成本大幅降低，帶來了國際遷移在規模、頻率，以及型態上的改變，距離、時間、遷移目的、社會競爭、移民管道限制等形塑移民者與遷移行為的因素，雖然不應完全排除其影響力，但其作用情形與涵意，無疑已不同以往。在跨國主義的架構之下，移民建立其社會領域（social field）時，開始試圖將原鄉與移入地視為連結的整體（Schiller *et al.*, 1992），削弱地理距離的影響，擴大了個人的發展空間，在不同的土地上，取得自身所需的資源，正如同 Faist（2000）在其跨國空間理論中指出，空間不再只是一種自然的現象，在時空壓縮的情況下，轉而成為一個更大型的機會結構體（opportunity structures）；遷移者在其中來去，尋找對自己在當下最有利的位。



資料來源：Virtanen, K. (1981) "Counter-current: Finns in the overseas return migration movement," Finnish diaspora: Canada, South America, Africa, Australia and Sweden, In: Karni, M. (ed.), Paper presented at Finn Forum Conference, November, 1st-3rd, 1981, Toronto.

圖 4：國際移民的遷移循環示意圖

對於新的跨國人口流動型態，Virtanen (1981) 認為，移出或回流不應被視為國際遷移的終點，部份移民在回流之後仍可能因原居地生活條件的變動而再度離開，因而不論是移出或回流，皆可被視為一目前的、暫時的狀態，而國際遷移，以個體而言，則成了沒有明確終點的旅途。因此他提出了國際移民的遷移循環圖，分成在原居地的生活 (life in the country origin)、移出 (emigration)、在移入地的生活 (life in the host country)、回流 (return migration) 等四個階段 (如圖 4)，以此說明他對於跨國遷徙的概念。

以現有的研究實例來看，可分成兩種情形：一是回流者無法接受原鄉的生活，而不得不再次移出，如從加勒比海地區的 Trinidad 和 Tobago 移居北美和英國的移民，回流之後認為原鄉工作選擇少、薪水低，且社會風氣過於保守，而想

要再次移出 (De Souza, 2005); 或是自西方國家回流印度的工程師, 在海外接受高等教育或相關訓練後, 由於看好印度科技產業的未來發展性而回流, 但回流後, 生活上卻面臨嚴重的衝擊與不適應, 包括生活水準太低、官僚風氣盛行、政治貪污腐敗, 公共建設太差, 行政體系無效率...等等, 於是許多工程師不打算長期在印度居留或定居, 也許現階段在印度工作, 但將來仍會回到之前居留的西方國家 (Saxenian, 2001)。

另一種情形是移民自身希望能保有兩地生活的優點, 以及自身與兩地社會的聯結性, 例如從加拿大回流香港的移民, 希望能在香港開拓自身的事業, 卻也渴望享受加拿大美好的生活環境, 因而往返於兩地之間, 或希望退休後返回加拿大定居 (Ley and Kobayashi, 2005); 由澳洲回流台灣的移民也有相似的情形 (Chiang and Kuo, 2000)。

Ong (1999) 呼應上述的概念, 提出了「彈性公民」(flexible citizenship) 的說法, 認為在全球化的情況下, 不論是個人、各種組織, 或是政府會發展出一種彈性的策略以累積資本與權力。個人可以藉由文化上的資本的積累、旅行與移位, 採取機會主義式, 具流動性的身份選擇, 來面對不同的政治經濟情況。簡單來說, 是指這些人具有極高的能動性, 能夠轉換身份、跨越國界, 選擇對自己最有利、最具發展性的環境, 包括工作地點、投資地點的選擇, 或者決定要在何處安置家人、與家人團聚。

於是, 當研究人口遷移的學者們開始以循環的概念來看待跨國人口移動, 其他類型的遷移型態也開始受到注目, 包含以及在過去移民研究中, 較未受到關注的回流移民現象, 以及不侷限於在地, 在兩地或三地以上往返的跨國移民。相關研究除了針對大規模移民做宏觀角度的探討之外, 也開始注意移民個體的經驗以及與不同社會的互動, 包括移民者本身所保有與原鄉、移入地之間各自的連結, 進一步理解遷移者與地方之間的關係, 在這些個體與外在環境互動之下, 所產生的各種遷移決策串連而成的遷移軌跡。

二、回流移民研究的興起

所謂的國際遷移，早期研究多關注於，從原鄉移入新社會的單向遷移行為，而忽略反向的人口流動情形。最早關於移民回流的現象，由人口學者雷文斯頓 (Ravenstein) 在 1889 年根據英國的人口普查資料指出，各種遷移行為必然存在著逆流，即反向的遷移，每一個在規模上佔優勢的主要人口流動方向，必然會產生規模較小的補償性的逆遷移流動，也就是今日所稱的回流移民 (佟新, 2003)；然而，當時只將回流移民視為國際人口遷移所產生的附帶現象，並未引起普遍的重視；回流者被視為無法在移居地生存，或是無法融入當地社會的失敗移民，而處於不得不回流的狀態 (Borjas, 1996; Ip, 2006)。

1960 年代起，移民及其後代，試圖以各種形式追尋、保存原鄉與族裔的文化，使得回流移民的存在開始受到關注 (Stefansson, 2004)；直到 1980 年代，探討移民回流的研究才開始興起 (Gmelch, 1980; King, 1986; Thoms-Hope, 1999)。1990 年代，在全球化的影響下，Schiller *et al.* (1992) 進一步提出將跨國遷移視為一頻繁的移動概念，移出和回流的界線不再明確，遷移逐漸被連結為一不斷進行的過程 (King, 2000)，移出和移入的社會被視為一體的社會場域 (social field)，形成跨越國界的發展空間，藉由頻繁的遷移行為，移民能在其中尋找最有利於自身的位置 (Faist, 2000)；如此一來，回流移民研究雖仍受到重視，回流與跨國遷移的分野卻不再明確 (Stefansson, 2004)。

回流移民的研究，之所以在早期人口遷移的研究領域內較為受到忽視，除了將回流移民視為主要移民潮流的附屬情形，以及慣性地把回流視為一種「回家的」自然行為，如同回到原有的社會位置，不會產生任何需要討論的議題，而受到忽略 (Stefansson, 2004)，另一個影響因素是資料取得的困難度，以及研究進行的限制 (Gmelch, 1980; Stefansson, 2004)。

在人口統計資料方面、由於各國人口統計的項目、分類方式、以及進行統計的時間點皆有所不同，加上採取移入從嚴，移出從寬的態度，許多國家的人口資料中，只登記遷出，並未登記將移往何處，尤其是兩地往返者，並不容易從人口資料上得到完整的訊息，於是，對於回流的人數多寡，只能從間接的調查當中，得到大概的估計；以美國為例，Borjas and Bratsberg（1996）認為以二十世紀而言，移入美國的民眾，約有三成會回流原鄉；Ley and Kobayashi（2005）認為，二次戰後至今，約有 20%至 30%的英國移民自澳洲或加拿大等地回流；然而，不論是從移入地或是從原鄉角度來看，皆同樣缺乏完善而有效的回流人口統計數字。

位於加勒比海地區的牙買加政府，試著在 1992 年起，利用減免貨物稅率的優惠措施，鼓勵回流移民自動登記，藉以了解回流移民的人數，然而，在當地進行回流研究的，西印度群島大學（the University of West Indies）的地理學者 Thomas-Hope（1999）認為，此種方式所得到的結果將與實際回流人數有相當大的出入，一方面是因為無法驗證登記者是否真的是回流移民，另一方面，以個人名義登記以取得優惠的調查設計方式，可能使戶長以外的回流移民人數被低估。

在研究限制方面，不論是質化研究或量化研究，都面臨了相似的問題，除了難以界定回流移民的範圍，回流移民的高流動性與不明顯，也加深了尋找、追蹤回流移民的難度。根據 DaVanzo 及 Morrison（1981）的研究，新移入的移民不論是在生活、居住、就業等方面都處於不穩定的狀態，其回流的時間有所謂的「神奇的時間點」（magic time point），即移出的頭兩年內，回流的意願實際行動的比例會不斷升高，但兩年之後，回流的可能性則會隨著時間而降低；正因為可能的回流者本身多是處於變動的狀態，且回流行為的發生的時間點容易集中在遷移後一個短暫的時期內，因而若要進一步做長期追蹤研究，可能受到相當的限制。

回流移民研究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的原因之一，在於國家之間對優秀人力資源的爭取。所謂「優秀人力資源」，泛指「高技術性人才」（the high-skilled），並

不僅限於從事高科技產業的工程師們，根據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在 1999 年所公佈的定義：高技術性人才為擁有大學以上的學歷，並具有相關領域的工作經驗與職場訓練者，包括專業的學者專家 (highly skilled specialists)、能獨當一面的總裁及高階經理人 (independent executives and senior managers)、專業的技術人員 (specialized technicians)、貿易人員 (tradespersons)、投資者 (investors)、承包商 (sub-contract workers)，以及核心工作者 (keyworkers) 等各行各業的勞力市場參與者。

站在國家發展的立場，移出的個體具有類似容器的功能，而技術和知識則結合於個體之中，於是，當個體移居國外，即代表了技術與知識的流失，也等同於國家培養這些人才所投資各項資源的無效，即所謂的「人才外流」(brain drain)，最為嚴重的後果，可能因此減緩國家發展的腳步；許多開發中國家希望能對此優秀人才出走的情形加以管制，卻沒料到，數十年後，人才外流情形逆轉，即所謂的「人才獲得」(brain gain) 或「人才流通」。這些過去離開原鄉以追尋個人發展機會的移民，回到國內發展，將海外的新資訊與技術知識傳回國內，並透過頻繁地旅行和電子通訊技術來保持與全世界的即時溝通，為國家的發展帶來意想不到的重大影響；例如由美國矽谷返鄉的工程師與創投家，使得台灣成了世界上主要的 IT 與網路硬體製造廠商所在地之一，以色列則成為網路安全、通訊軟體及電子組件方面的重要研發地區；而中國與印度也透過類似的人才流通管道，朝此一發展方向邁進 (Saxenian, 2007)。

有鑑於人才流動對於國家發展影響甚鉅，部份的發展中國家政府開始希望能創造讓這些人才回流的誘因，例如國際組織 I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近年來開始在非洲進行一系列的促進人才回流計畫 (Return of Talent Programme) (World Bank, 2000)，牙買加政府也透過與 IOM 的合作，從 1992-1997 年進行聘請海外優秀人才回國擔任公職的計畫 (Thomas-Hope, 1999)；中國政府的「獎金計畫」(Chang Jing Scholar Project) 或「百位學人計畫」

(Hundred Scholar Project) 也希望藉此政策吸引定居海外的高技術性人才回流。

以母國的角度來說，若移居海外的移民回到家鄉，會對原鄉的發展帶來正面的助益，有形者如海外僑民的匯款，無形的助益則是人才流動所帶來的知識移轉，其重要性並非人數、金額等量化數字可加以解釋；如 Gmelch (1980) 在巴貝多(Barbados)的研究，其看法是將回流移民視為一種社會「轉變的介質」(agents of change)，認為回流移民會帶來金錢、技術、觀念等等，而影響原來的社會；Thomas-Hope (1999) 研究牙買加 (Jamaica) 的回流移民，認為當地移民擁有所謂的「回流意識」(Ideology of return migration)，遷移是尋求自我發展機會的策略之一，回流也是人生規畫的一部份；並非如同早期所認為的失敗移民，回流決策是當年移出時早已做的決定，儘管回流的時間和情況可能與自身的計畫有所出入。此類在西印度群島地區出現的回流型態，不僅可為資源稀少的國家（例如小型島嶼國家），以及發展較落後的國家帶回其所欠缺的資源，例如外匯、技術等，也可促進個人及下一代的社會流動，提升移民在原鄉社會中所處的位置。

以移入國的角度，人才的回流，並不一定帶來國家的損失；以美國為例，由美國返回母國創業的工程師與創投家，實際上為美國帶來無形的經濟發展機會，受惠於海外科技區域的成長，如台灣、中國、印度，在 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產業方面，美國的生產面、消費面的技術成本均大幅降低，也為美國進入外國市場開啟了大門 (Saxenian, 2007)。

另一方面，移民回流的情形，可做為對於國內移民政策的檢視 (King and Newbold, 2008)。進入全球化的時代後，世界經濟結構產生重大的轉變，之前大量輸入低技術性移工的已開發國家從傳統的製造業轉向高科技及服務業，特別是金融、銀行業與貿易等方面 (Wu, 2003)；為了因應新興產業對於人力資源的需求，以台灣所在的環太平洋地區而言，因為地緣關係以及東亞地區急速的經濟發展，美、加、澳、紐等國開始向亞洲新興工業國的移民招手，希望能改變本身的結構，以增加全球競爭力 (Ip, 2001)，例如澳洲 1981 年的「Business Migration

Program」，加拿大 1978 年的「Business Immigration Program」(Wong, 2003)，以及美國的「1990 Immigration Act」(Tong, 2003)。

經由這一類的法案移入的新移民，不同於二十世紀初期的國際移工，多數是年輕、受過良好教育、具有專業能力及資本的優秀人力資源，常以家庭做為主要的遷移單位，且同時保持與移入地和原鄉之間的聯結性，而此種關係，使得移民回流的可能性變得明顯。移入國訂定的移民政策，例如商業移民或技術移民項目，包含對於年齡、學歷、語言能力、資本、專業認證等要求，主要是希望移入者能帶來國家發展所需的人才與資金，而針對移入國境內移民之回流情形所做的研究，其實展現了移民政策的利弊，並可因此檢視是否達到了當初制定政策時的目的。

近年來，兩岸三地的關於華人回流移民的研究，開始受到了相當的重視。以香港地區而言，Waters (2002) 探討了香港移民為了政治與教育因素移居加拿大，在該地社會與經濟結構的影響下，由於創業、就業上的困難，為了維持家庭生計，演變成家人分居於香港與加拿大之間的情形，稱為跨國家庭(transnational family) 或分隔家庭(split family)，頻繁來往於兩地的父親或母親被稱為「空中飛人」(astronaut)，單獨在加拿大陪伴子女生活與求學的母親則稱為「單棲媽媽」(Chiang, 2008)；在此基礎之上，Waters (2005) 進一步分析港人遷移的目的與華人的價值觀、職場競爭之間的關聯性，認為移出是對於子女未來發展以及延續中產階級家庭地位的投資，得到較多的教育資源、培養更具職場競爭力的下一代，向來是移出的重要考量之一。此類跨國家庭移民的社會生活空間建立在兩地的聯結之上，當子女準備進入就業市場時，就可能評估自身在兩地的發展性，而衍生出回流的意願。

中國的情形，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後，有許多海外的華人與留學生回歸；Luo *et al.* (2003) 認為海外華人移民之所以願意回流，主要是因為在海外職場升遷

管道受阻，遭遇所謂「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⁷)情形，預期回流之後，在職場上的升遷會有較大的發展空間；Wihelm and Biers (2000) 則認為，對中國移民而言，回到中國發展比較有「家」的感覺，而此種歸屬感是在海外生活所無法得到的。這一類帶著高學歷與專業技能回到中國的移民，被稱為「海歸」(haigui)，意為「從海外回來的華人」，他們對於中國的發展影響甚大，使得「海歸」成為近年來中國在政策探討與學術研究的一大重心 (Wang *et al.*, 2006)。

以台灣的情形而言，以往對於回流移民的研究，焦點多在於海外高科技人才回台發展的情形 (蕭新煌等，1994)；這一類的回流者，當年多是以留學生身份前往美國，學成之後，以技術移民的身份轉而留在當地工作，在政府政策、台灣經濟起飛，以及潛在市場發展的影響下，選擇回台發展並貢獻所學 (徐進鈺，1997；張玲，2001)。近年來，部份學者開始注意以其他方式移居海外的移民類型，將研究焦點放在 1980 年代之後的商業移民，試圖了解其在海外的生活情形，以及其回台發展的狀況 (姜和徐，2005；蕭新煌等，1994；Chiang and Liao, 2008)。

三、回流移民的定義及型態

所謂的回流移民，就字面上的意思，可以簡易理解為移入者由移居地返回原居的國家，然而進一步的詳細界定，各個學者在研究上依照不同的情況有著不同的定義；在相關的文獻與前人研究中，若依照研究族群 (移民) 本身與原鄉之間的關係來分，可將其歸類為：

- (一) 移民回到自身的原居地與出生地：如 Gmelch (1980) 在巴貝多的研究，認為回流移民是指，在移居國以外的國家出生，在移入國生活一段時間後，再次回到出生地生活者；前述內容中所提到的 Thomas-Hope (1999) 關於牙買

⁷「玻璃天花板」現象 (glass ceiling) 主要指歐美主流社會中，外來移民，尤其是亞洲人往往只能擔任技術性職務或處於低層職位，或者做到相對高位後便再難晉升，無法進入核心決

加的移民、Waters (2002) 研究中，由加拿大回到香港工作的空中飛人，也是屬於這一類的情形。

(二) 在海外出生成長的族裔後代回到父母或祖先的原鄉：如 Potter (2005) 在聖露西亞 (St. Lucia) 和巴貝多的研究中，則是指在移入地出生、成長的第二代移民，回到加勒比海地區就業、定居；或是 Tsuda (2004) 研究在巴西的日本移民子孫回到日本的情形。

(三) 其他類型，包含前述兩種情形的結合，或是其他的界定方式：如 De Souza (2005) 在千里達 (Trinidad and Tobago；千里達島和托巴哥島) 的研究中，僅以族裔為做為是否為回流移民的界定標準，而不考慮其出生地。King and Newbold (2008) 研究加拿大的回流移民，是從移入國的角度來看，除了將研究族群鎖定在加國以外地區出生的移入者之外，配合加拿大的移民政策，進一步限定必須是在移入滿五年後，再次遷移回出生地者，才能被納入研究的範圍。

什麼樣的移民有可能成為回流者、回流移民的背景是否有一定脈絡可尋，目前並沒有一致的答案。早期的看法多認為移民的回流是大環境的經濟因素所導致，失敗的移民者，即無法在移入地生存者才會回流，如景氣的蕭條或是特定產業的凋零，此時的回流移民強調的對象是替移入國提供勞力的低技術性移工。之後的研究，逐漸開始重視社會文化以及家庭牽絆等方面的回流因素，對於潛在回流者的特質也開始有了不一樣的想法，認為回流者並非是成功融入當地經濟與社會面的移民，或是無法在當地生存下去的失敗移民，而是介於兩者的中間族群。

對於已在當地有相當成就及資產的移民而言，回流相當於放棄未來看好的發展與前景，對於失意的移民而言，回流則必須投資另一番代價與費用，例如遷移的旅費及找尋新工作，而這一類移民不見得能承受得起所付出的機會成本

(Gmelch, 1980)；或許正如 De Souza (2005) 所言，移民不願再次遷移的重要

策層，就像玻璃天花板，抬頭可見，卻難以突破，以此做為比職場情形的比喻。

理由之一，是不想「重頭開始」；在這種心態下，有成就的移入者不易放棄，失敗的移民則難以重頭來過。然而，上述看法是否能適應於不同的移民類型以及所處的時空狀態，是值得再加以思考的；例如，在最近的加拿大回流移民研究中，由統計數字上發現，1990 年代以後的回流者年紀多集中於 25-34 歲，具有大專以上的教育背景，並有超過 60% 以上擁有專業技能的受教背景或曾投身於這一類型的職場中（King and Newbold, 2008）。

回流移民的類型，同樣也沒有一致或明確的分類方式，多是依照不同的角度，或是針對某個國家或區域的實際情形來加以分類，因而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呈現多元的型態。

Cerese（1974）研究從美國返回義大利的移民，依其回流的原因將其分為四種型態：

- 
- (一) 失敗回流（Return for failure）：回流者無法找到適合的工作，無法在當地社會生存或匯款回鄉，因而回流。
 - (二) 守舊回流（Return of conservation）：回流者很早就明白自己無法適應當地社會與文化，不願意離開親友的支持與相伴，最後決定回流。
 - (三) 退休回流（Return of retirement）：在海外工作，累積足夠的財富，或達到自我設定的目標後，回原鄉享受較舒適的生活。
 - (四) 創新回流（Return of innovation）：希望能對原鄉盡一份心力，因而回流。

人類學者 Gmelch（1986）研究加勒比海地區移民遷移至北美、歐洲的回流移民，並依其回流的意願及停留時間長短加以分類：

- (一) 暫時性回流及循環遷移者：回流者為了某些特定的原因而回到原鄉，對於再次遷移抱持可能的態度，當回流的原因不再，或有其他的目標與需求時，就有可能再次遷移。
- (二) 半志願性回流：回流者希望能永久居留於移入地，但為了某些外在因素而必須回流。

(三) 原本打算在移入國長久定居，但因為思鄉、難以適應、家人需求等因素，經過考慮後，決定回流原鄉定居。

King (1986) 加入距離的概念，依照距離、時間、與意圖來加以分類：

(一) 依距離 (distance) 而言，兩地之間距離越短，回流的可能性越大。

(二) 以回流的時間長短 (time) 而言，則可將其分為：

偶發性的回流 (Occasional returns)、定期性的回流 (Periodic returns)、
 季節性的回流 (Seasonal returns)、暫時性的回流 (Temporary returns)、
 永久性的回流 (Permanent returns)。

(三) 依回流的意圖 (intention) 及是否真的具有回流的行動，可將情形分為下列四種：(I) 有意願回流原鄉，且成功回流者：例如到異鄉去工作的外勞，工作契約期滿後再返回家鄉；(II) 有回流的意圖，卻沒有回流的行動。即當初設定在外國停留一陣子後，就要返回家鄉，卻因為某些原因而在外國留下，甚至成為當地的永久公民，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留學生學成後，因為當地較佳的工作機會與生活環境而滯留不歸，而造成了所謂人才外流的爭議；(III) 原本打算永久遷出，最後卻回流，也許是因為不適應當地環境，或當地的環境與預想中的差異太大，最有可能的因素是在當地無法找到理想的工作；(IV) 原本就不想回流，也確實未回流者；可能是因為已融入當地的環境，或是無法回流，如在當地窮途潦倒而無力回流，或因政治因素而無法回流。

表 9：回流意願與實際行動參照表

	實際行動	回流	不回流
回流意願			
	回流	I	II
	不回流	III	IV

資料來源：廖珮君 (2005) 澳洲回流台灣年輕移民在台、澳社會間的適應與自我認同，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時代背景的轉變，會產生不同的遷移現象近年來，在跨國主義的框架下，遷移行為早已變得多樣而複雜；遷移不再是單向的、線性的單一事件，而是往返的、更為頻繁的空間移動過程，從以往的遷移鏈結型態（migration chain），變成了遷移網絡（migration net），Schiller *et al.*（1992）為全球化下的遷移模式定義為：一種連續的過程，移民同時塑造並維持多向的關係，在兩個或以上的地區建立一種網絡，以維持兩地以上地區的聯繫性。

在此種情形下，不只是移出的行為模式有所改變，回流的情形也同樣不如以往單純，De Souza（1998）在千里達的研究中，將回流移民的循環型態，分為下列三種：

- （一）季節性回流，機動性地移動於兩地或以上地區之間，主要為經濟因素所驅。
- （二）回流探訪，因為某些原因，輪流居住於原鄉與移入地區。
- （三）跨國回流，不定期居住於數個地區，在各國之間循環往返。

King and Newbold（2008）以加拿大 1990 年代的人口統計資料來研究移民不規則循環遷移的情形，並提出了「回流移入者」（return immigrant）的說法，即已取得公民身份或永久居留權的移入者，不規則地往返原鄉與加拿大兩國之間，並依照離開加拿大境內的時間，將此類往返式移民加以分類。這些回流移入者與來自中、港、台三地之空中飛人的差異在於遷移行為之間的時間間隔；空中飛人為了家庭生計與家人團聚，通常是以一年數次，或數年一次的固定型態往返於兩國之間，但回流移入者的遷移行為時間間隔較長，並未出現明顯的遷移時態。

儘管 King and Newbold（2008）中，並無法對於加拿大境內移民的不規則遷移情形提出可供推廣的型態與時序，但其研究結果顯現出近年來，在全球化時代下，加拿大移民遷移/回流行為的頻繁與複雜性，也印證了 Faist（1997）的看法，強調跨國移民的概念已不同於以往將遷移視為兩地之間單一的空間的移動，或將遷移視為單一事件或決策，而應將其視為一連續不斷的過程及網絡式的空間聯結。對於移民而言，遷移的驅力也許不再由原鄉的「推力」做為主導，在原居地

和移入地之間的移出與回流等遷移行為，只是他們在跨國的社會空間系統中，追求最有利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機會的結果。

四、移民回流因素分析

影響回流決策的因素有許多，以外在環境因素而言，國家的經濟情況與移民在職場所遭遇的經驗常是最直接的考量，社會與政策面也是極為重要的一環；內在因素則包含對原居地的情感、親友的牽絆、移民自身的背景、期望、偏好等，皆是形成回流意願與實際回流行動可能不同調的變數，除了影響是否真的回流，也會影響何時回流，以下將討論一些常見的回流影響因素。

(一) 經濟因素與社會結構

原居國的狀況是否改善，對於移民是否做出回流的決定具有重大的影響力。當原居國的政治及社會情勢動盪，其公民不看好國家未來的發展，甚至可能危及自身，便會設法離開祖國，例如 97 回歸之前的香港移民潮、智利於 1991 年的政權移轉 (Olesen, 2002)。當局勢緩和或穩定之後，移民衡量在兩地的發展情形，當看好原鄉的前景，或認為自己在原鄉將能有更好的發展，便會考慮回流，例如移居加拿大的華人移民，看好未來的經濟發展，而決定回流中國或香港，以尋求更好的職場發展性 (Ley and Kobayashi, 2005; Ip, 2006; Salaff *et al.*, 2008)，或是在美國、澳洲等西方國家的專業技術人才選擇回流台灣、中國與印度 (Iredale *et al.*, 2003; Guo and Iredale, 2003)。

除了原鄉的情形改善之外，若移入地的經濟情況不佳，或出現特殊的經濟或社會危機時，移民回流的意願也會增加；無論是移民的世代、高技術性人才或移工，皆會受到影響，而形成半志願性回流的情形。以美國地區為例，以專業技術移入的印度工程師，在 1990 年代以前，回流原鄉者屈指可數，但後來在美國科技業不景氣的情況下，工程師們逐漸回母國發展，相較之下，移居時間較長的移

民，與當地社會的聯結較深，能夠堅持的時間也較長，回流的時間點較晚；年輕移民在缺乏當地社會資本的情況下，較易做出回流的決策（Saxenian, 2007）。

此外，移居地社會對於移入者的態度，也是促使移民產生回流意願的隱性因素，如 1960 年代之後移居美國的華人技術移民，儘管擁有高教育程度，可憑一技之長加入當地的勞動市場，但不論在個人生活或是事業發展上，普遍被隔離在主流社會之外，如當地人不願將房屋售予移民，工作上擔任專業技術職位而無法晉升至管理階層的情形也相當普遍；在此情況之下，若回到原鄉能有更好的職業生涯發展空間，自然成為強大的回流誘因（Saxenian, 2007）。

移工的部份，以巴西的日僑為例，如同台灣地狹人稠的環境，二十世紀初，日本政府選定巴西做為主要的移民地點，並以官方力量協助日僑在當地落地生根，在日本政府的外勞引進政策中，也明定以需要工作的日僑及其後代為優先考慮；1980 年代後半，巴西經歷了嚴重的經濟危機，適逢日本國內缺乏低技術性的勞工，於是大量的日僑及其後代回流日本，估計約有 280,000 人，成為日本國內最大的外來族群（Tsuda, 2004）。

以華人而言，經濟因素同樣是較常見的回流原因，許多來自香港、台灣、中國的移民，在 1980 年代後，以商業移民、投資移民、技術移民等項目移居美國、加拿大、澳洲等西方國家（Wong, 2003）。儘管透過政策性的篩選方式，如積分制度，確保移入者（主要申請人）擁有一定程度的語言能力、學歷、專業技能，以及其他的條件，但移民要在當地成功創業或找到滿意的工作仍不容易，多數人面臨職業或職位向下流動的情形；除了語言能力，不熟悉當地法令及社會文化、在地經驗不足，學歷證照不被承認等問題，都是導致職場發展經驗不佳的原因（Ip *et al.*, 1998）；於是，在家庭生計的考量下，有些家庭會選擇由父親回流原鄉工作（姜和徐，2000、2003；Waters, 2002），而下一代的年輕移民，考量回鄉可能有更好的工作選擇或升遷機會，也有可能因此而回流（Ley and Kobayashi, 2005; Chiang and Liao, 2008; Salaf *et al.*, 2008）。

(二) 移民與原鄉的情感聯結

另一個促使移民回流的可能性在於移民本身對於土地、國家、或是故鄉的內心情感因素，如對於祖國的認同感，對於移入地缺乏歸屬感，在海外的生活總是沒有「家」的感覺等，想要尋根的心願或是擁有落葉歸根的傳統觀念，也可能促使移民回流，如 De Souza (2005) 所描述加勒比海地區移民回流的動機，以及 Wilhelm 和 Biers (2000) 所提中國移民回流是為了尋找「家」的感覺；亦或是如同居住在西歐的波士尼亞移民，願意放棄生活在西歐地區較佳的經濟環境，以及難民的庇護身份，即使原鄉的條件仍不理想，但還是願意回流，為了「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對於因政治、經濟或是戰亂等原因而非志願，或是半志願性離開家鄉的移民而言，「生活在自己的家園」可能成為強烈的回流誘因；回流的重要性對於此類移民而言，並不僅只是顯現出個人與土地情感的聯結，而是藉由家園之在地性的塑造，賦予移民自身的定位以及自我認同，成為移民建構自身族裔網絡與社會關係的重要元素 (Stefansson, 2004)。

(三) 移民本身的條件與背景

根據 DaVanzo 和 Morrison (1981) 的研究，年紀越大才初次移出的遷移者，回流的可能性較高，可能是因為較難以適應當地的環境及生活習慣，也有可能是較難找到令人滿意的工作。這一類人傾向往原居地回流，而不會移往第三地，一方面是因為對原居地的資訊掌握較多，另一方面是因為遷移不順利所造成的陰影，而不易再往第三地移動。反之而言，在移入地居住的時間越長，對原居地的即時資訊掌握越少，且越來越適應移入地的情況，回流的可能性就會慢慢降低。

除此之外，是否回流與遷移者本身的教育程度與能力有關，教育程度或能力高者，容易找到令人滿意的工作，也較能蒐集到完整的資訊，遷移的可能性較高，但不一定回流原鄉。兩次遷移行為的時間間隔長短，也會有所影響，若在短時間內曾有過遷移行為，再次遷移的可能性會比較高，不同的是，若是成功的遷移經驗，那麼再次遷移往第三地的可能性較高，若是失敗的遷移經驗，則傾向回流

(DaVanzo and Morrison, 1981)。

以僑委會在 1994 年針對居住美國之台灣移民的調查報告為例，從整體研究結果來看，越具專業性的工作者回流台灣的可能性越低，因其在美國具有令人滿意的職業、較高的收入，以及受他人所認可的社會地位，較缺乏意願去改變現狀；另一方面，在美國定居越久的移民，在家庭生活、工作、文化方面都已相當習慣，融入美國社會的程度較深，相對於回流台灣後，需重新適應另一種生活型態的難度也較高，因而降低了回台發展的意願（蕭新煌等，1994）。

(四) 移民的生涯規畫

除了外在環境的影響，回流行為也有可能出自於個人積極的意願，意即回流行為是移民人生規畫中的歷程之一，且往往附帶其他的目標，以回流的方式做為達成的策略。以加勒比海地區的島國而言，遷移到海外工作是很普遍的情形，也是快速累積資金與學習相關工作經驗的管道，一旦達到當初所設定的目標，或是已屆退休年齡，便決定回鄉養老，享受家鄉的田園生活及親友的陪伴，或是另外開創一番自己的事業（Gmelch, 1986; Thomas-Hope, 1999）。

對於將回流行為視為生涯規畫中的一個環節，在華人社會中也有相似的情形。由於華人相當重視下一代的教育，認為良好的教育是成功職場生涯的入場券，取得西方的教育資源成為累積未來發展資本的重要策略（Ong, 1999: 95; Waters, 2005）。在 Waters（2005）研究由香港遷居加拿大的華人移民，也認為許多家庭將遷移的行為視為一種家庭發展的策略；讓子女在年紀尚幼時，前往海外，期望經由在當地的生活與學習，讓子女累積將來所需的能力、經驗，與人際網絡等各種資本以提升其競爭力，成為 1980 年代後常見的情形，被稱為「Satellite Kids」。年紀較小的子女尚未具備自我照顧的能力，需要父母陪同前往海外，在傳統的分工之中，這個角色多半由母親擔任；當孩子完成學業，或是年紀漸長，能夠自理之後，父母親(或是只有母親)覺得已完成階段性的任務，可能因此回流（Chiang, 2008）。

Salaff *et al.* (2008) 亦認同此觀點，認為在加拿大的香港移民家庭，可能以家人之間的連結性，依照規畫將家庭成員在不同時期送往特定的地方，以達成人生不同階段的目標，家庭或家族的榮景之延續以及下一代的發展是整體計畫的主要宗旨；King and Newbold (2008) 研究移居加拿大的所有新移民，關於其回流與再遷移行為，所得的結果，不僅認同此上述的看法，更擴大了此觀點應用的範圍，認為多數回流行為並非意外出現，而是為了不同的人生階段發展，所計畫好之另一次遷移行為的實踐。

(五) 傳統文化與宗教因素之影響

Dustmann (2003) 對德國境內移民的研究，認為除了遷移時的年紀、教育程度、是否具有專業技能等個人特質之外，由於其傳統文化與宗教的影響，不同的族裔回流的意願及傾向不同，當然，其原居地的情形也是考慮時不可或缺的一環。Dustmann (2003) 將德國境內的移民，大致分為來自東歐（前南斯拉夫）、南美、西亞（土耳其），及北非地區四大類，其中土耳其及希臘移居至德國的移民，回流性比來自前南斯拉夫的移民高，除了經濟因素之外，前南斯拉夫的政治情形較不穩定，也有可能是影響因素之一。再者，除了傳統文化因素之外，宗教也是可能影響因素之一，例如在此研究中，土耳其移民主要是穆斯林族群，其回流的可能性，特別是女性的回流相當高，通常是因為婚姻的考量，希望能找到同族裔以及同宗教信仰的結婚對象，因此回到故鄉，較可能找到滿足其條件的對象。

是否遷移或回流的因素，對下一代未來發展的考量與性別差異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以 Dustmann (2003) 的研究而言，他認為父母對男孩子的考量，會為他選擇能增加其競爭力，對未來事業較有幫助的環境，因此移居到西方世界後，若以男孩子為遷移的主要考量，家庭全體回流的可能性相對於女孩子而言較低。反之，對女孩子的考量，則受文化背景的影響較大，不論是日常生活習慣或宗教信仰，常常都是以未來的婚姻為考量。

由上述內容中可得知，多數的影響因素是無法確切畫分隸屬於內在或外在的

影響。外在的影響，非個人力量可以改變，因此成為遷移決策思考的外圍框架，如第一項所說明之外在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對於遷移所造成的影響；但移民仍可在此限制範圍內，依自身的條件、偏好，與目的，做最符合自身需求的安排，如影響因素所列之第三與第四項。然而，僅考慮現實環境的優劣，並不足以完全解釋遷移決策的產生，而必須進一步考量移民與土地之間所產生之內在聯結性，以及其他如文化、宗教、人際網絡等無形的牽引因素。



第二節 移民的適應

一、適應的意涵

除了物理距離的移動以及國家界限的跨越之外，國際移民的另一種意涵在於來自一種文化或一個國家，依其自由意志，選擇進入了另一個國家與其中的文化場域，並懷抱著長久停留的打算。於是，隨著移入的過程，原鄉的文化，或者說原先所在地的文化，藉由個體的承載，隨著人類的遷移，跨越了分界，開始與另一個新社會的文化互動。當兩種或以上的文化接觸時，彼此影響、競爭與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情形；移民本著原鄉文化的基模，在新環境中探索與學習，做出許多的抉擇，並隨著時間產生轉變，逐漸成為新社會的一份子，其中的轉變可以是形於外的，例如語言、穿著、飲食等，也可以是隱於內的，如認同、安適感（sense of well-being）、歸屬感、自我定位（self-esteem）等。由於社會與環境本身，是隨著時間不斷變動的，回流移民的回到原鄉後的調適過程與情形，雖奠基於上述的基本模式，但可能更加的複雜，回流移民本身就是兩個文化的複合體，第一次移出時，已經歷過由出生地進入移入地的轉變過程，再回流至原鄉時，雖然不是全新的環境，但是在移居海外的期間，個體與社會整體都已有所改變，只是，與當年反向的適應與融合情形如何，是毫無阻礙的接受，或是另一段自我改變的過程，則是令人好奇與值得探究的。

由於每個社會所擁有的社會規範、風俗習慣、所認可的價值觀等必然存在著差異，移入者需重新調整自己，試著接納新社會的文化，此重新社會化的過程即為適應，亦稱為涵化。進一步來看，適應是指在一個文化中，透過模仿、實踐與試驗，從家庭、媒體、學校等場所，藉由與他人的互動，來習得語言、價值觀與規範（許夢芸譯，2007）；因此適應可被視為一種文化與心理的轉化過程，在兩

種或以上的文化互相接觸時，產生於文化群體、家庭或個人之中；其過程與結果具相當高的歧異性，會因為族群背景、世代，以及個人特質而有所不同。由於強調人與環境互動的連續過程，適應被視為人與環境互動時所產生的反應，包含採取的行為方式或技能，也意指人與環境互動後的結果或狀態，整體而言，是人與生活環境間的交互作用，最後達到和諧一致的狀態（張春興，1996）的行為，不論是移入或回流，除了跨越國境的地理界限之外，也涉入，或重新進入了另一個社會與另一種文化，於是，移入者能否在新環境中安身立命，達到物質與心靈的滿足，成了移民研究所探討的相關課題之一。

Graves (1967) 認為，個體在不同文化接觸下，身為具有能動性的參與者，會同時受到兩種文化的影響，即外界的文化（主流的文化）以及轉變中的族群文化（內部的文化、個體所屬的文化）(Graves, 1967; Berry, 2007)。能動性，為個體在社會中所擁有的決定性能力，一般與自由、自由意志、行動、創造力、原創力以及透過獨立個體的行動來產生改變的可能性相關連。人類自由意志與行動皆無法脫離社會做決定，由於行為與決策的基礎是受到建構自我為主體的環境所促成，就此意義而言，能動性是由社會結構所決定的，被生活常規特性所左右（許夢芸譯，2007），正如同移入者的轉變，除了個人的特質與喜好，也必定受到原屬文化與主流文化的規範。

從個人的角度切入，Ward 試圖將自我調適的概念分為「心理適應」(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與「社會文化適應」(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兩個部份。前者重視內在感受的敘事，關於初來乍到新環境時，面對文化衝擊(cultural shock) 及新環境的挑戰所造成的壓力等負面情緒，所產生心境上的轉變，強調個人心理層面的調適性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well-being)；後者則用以說明外在行為的轉變，特別是社會技能 (social skill) 的取得以及在地主流文化的學習 (cultural learning paradigm)，強調個體是否具有安居在地的能力 (Ward and Kennedy, 1999)。

心理適應會受到個體之性格特質與所具韌性 (**personal flexibility**)、處世態度與方式、生活型態的轉變、以及是否具有社會支持 (**social support**) 等因素影響。社會文化適應則較強調個人在新環境的競爭力，以及在不同社會間，個體是否具有可轉變的技能 (**transferable skills**)；其影響因素包括於新環境居住的時間長短、個人內心的認同、新環境與原有文化的相似度 (**cultural distance**)、語言流利程度、以及對於在地文化的了解等 (Ward and Kennedy, 1999)。

Richardson (1974) 觀察移民形於外的轉變過程，將其分為三個階段：(1) 移入初始，覺得新奇有趣，且有擺脫舊社會規範的放鬆自由感，對於移居地之慣性行為給予正面評價。(2) 開始因為接連遭遇文化衝擊而變得有些沮喪，並感覺在新社會生活充滿壓力 (**depressed and stressful**)，出現思鄉的情緒並懷念舊社會，有時會自覺遇到來自新社會的歧視與偏見。在此階段，有些人選擇再次遷移，若回到原鄉，即所謂「失敗的回流」，但也有可能繼續遷移至第三地。(3) 經歷了第二階段之後，對於新社會的生活將會再次感到滿意，並逐漸認為自己是新社會的一份子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new society**)，開始接受新社會的行為或生活模式，並逐漸適應新的生活 (Richardson, 1974; Scott and Scott, 1989)。

Berry (2007) 則以移入者的立場，就群體的角度，來描述移民與主流族群互動的情形，包含個體面對主流社會的適應態度 (**acculturation attitude**) 以及實際所採取的適應策略 (**acculturation strategy**)：

- (一) 同化 (**Assimilation**)：當個體在心態上不傾向保有對原所屬族群的認同與文化，並在日常生活中，尋求盡可能與文化他者 (主流族群的成員) 互動，樂意接受新文化與價值觀。
- (二) 分離 (**Separation**)：當個體強烈堅持保持固有族群文化，不傾向接受改變，甚至抗拒與主流文化接觸。
- (三) 融合 (**Integration**)：個體試圖保有部份的原有文化，但也樂意與主流族群有所互動，並選擇性地接受主流文化，成為複合式 (**hybrid**) 的文化組合。

(四) 邊緣化 (Marginalization): 當保有族群文化的可能性極低, 或個體所屬族群完全不願意或無法與他人互動, 此文化群體及隸屬其中的個體, 即在所處社會中處於邊緣化的狀態。

Berry (2007) 認為融合是移民最為常見的選擇與做法, 並非如早期學者所言, 新來的文化或弱勢的文化, 只能被動接受新社會的文化, 移民必定會被同化, 被主流社會所吸收, 成為其中典型的成員; 相反地, 移入者會在兩種文化的影響之下, 選擇性地接納對自己有利的行為模式與價值觀。但 Berry 也提及, 個體對於融合的選擇只能出現於具有相當的包容性並尊重內部文化多元性的社會, 在此結構之下, 各族群能相安無事生活於其中, 並互相影響; 所有族群必須接受基本的、共同的社會價值與規範, 其治理也必須兼顧不同族群的需求, 形成一種如同馬賽克拼貼, 族群互相鑲嵌的社會組成。換言之, 融合較有可能出現於族群關係和諧的現代化社會之中, 若社會過於保守或不易接納「他者」, 會使移入者有不被接受的排斥感。



二、影響移民適應的因素

遷移後的適應情形, 指個體與外在環境互動之後所產生之轉變, 因此轉變的本身並非單純由個體本身所能掌控, 除了考慮個人背景與特質之外, 也需考慮移入者與週遭社會的互動情形, 而個體在遷移前對移入社會的了解及期待與實際情形的落差程度, 也是影響適應情形的重要因素。

廖正宏 (1984) 認為, 遷移後所面臨的變遷與隨之而生的適應過程並不一定是自發性的, 除了個體本身的條件, 亦會受到外在社會環境的影響, 以下分項做探討:

1. 年齡: 不同年齡層具有不同的心理特徵, 年齡較大的遷移者在原住地的生活較久, 該地的社會文化已深深刻印在思想觀念當中, 人格特質的形塑亦接近

定型，要改變這些舊有的概念與行為模式而接受新的東西較為困難，況且遷入地社會的就業機會對工作人員的選擇較不利於年紀較大的遷入者。

2. 性別：女性遷移者在改變文化規範方面較男性遷移者來得容易，亦即，女性遷移者的適應能力較男性遷移者高。
3. 教育：教育是遷移者成功進入當地就業市場的重要因素，教育程度不僅影響其遷移後的第一份工作選擇，也影響其適應的程度；遷移後繼續接受教育是遷移者進入當地社會與職場的好方法，教育不僅可提供所需的知能，也會影響個人的工作態度與社會參與，並增進個人適應新環境的能力。
4. 社會資本與互動情形：個人與主流社會之間的互動情形亦會影響個人的調適過程，包含（1）社會參與情形，如婚姻狀況、家庭大小、與周遭在地人員及同事的相處情形；（2）遷移前的社會經濟地位；（3）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如親友、社交關係等人際網絡的經營能力與擁有程度；（4）物理性的移動經驗，如訪問其他地方的經驗多寡及曾經居住外地的時間長短與次數；（5）心理性的移動（psychic mobility），如接觸電視、報紙、書籍...等媒體及曾與外國朋友接觸的經驗等（廖正宏，1984）。

上述的因素並不適合以量化結果來畫分與適應情形之間的關聯性或階段性，但普遍而言，個體若以積極的態度面對新社會，在移入地的生活時間越長，社會參與及社會資本會越多，物理性移動與心理移動的經驗增加，對於環境與在地的社會文化了解越深，自然會促成移入者對該地的適應。即個人的適應程度會隨著時間而增加。

在華人研究方面，國際遷移的適應情形多針對移民進入與原鄉文化差異極大的社會環境，為了了解移民進入與原鄉較為類似的環境時，是否能避免適應的歷程，Tsang（2001）承襲 Ward 的概念，針對由中國移居至新加坡的教師與學生，以個人背景、條件及與主流社會的互動，來研究移入者的適應情形，其中，他提出了七個影響適應的因素：

1. 之前的國際接觸經驗 (Prior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若移民者在移出前，有較多接觸各國文化或與他國人士互動的經驗，移民者便能將這些經驗概念化及普遍化，在移居新環境後，能將這些舊有的經驗應用於應付新環境的各項事物與挑戰，也能依循當初內化的過程，將新的經驗與舊有經驗融合，對於移民適應新生活，會有正向的幫助。
2. 移出前對於當地的了解 (Predeparture knowledge)：在移民之前，若能對當地環境有更多的了解，就能減低對於當地環境的不確定性，以及預期之外的事件發生的機會，有助於情緒穩定及適應。
3. 語言能力 (Language competence)：語言能力對於移入者能否在當地社會具有競爭力，是極為重要的因素。
4. 自我勝任感 (Self-efficacy)：自我勝任感，為個體確認自我可成功執行所需的行為以達成所要求的結果的程度。當個體擁有較高的自我勝任感，他們對自我能力會較有信心，認為自己一定可以突破阻礙與困難，他們會願意練習與展示自己所學習的成果，即使結果並不成功、並不完善。擁有較高自我勝任感的移民，會勇於在新社會模仿與嘗試展現所學習到的新事物，因而得到回饋 (feedback)，不論此回饋是正面或負面的，都有助於拉近彼此的距離，且讓移民了解到自己所表達的是否合宜、是否合乎新社會的規範與期待，在此情形反覆出現的情況下，則縮短了移民融入當地社會的所需的時程。
5. 外向性 (Extroversion)：個體的外向性有助於進行人際互動，因而可增加與當地居民往來的機會。
6. 與在地的往來 (Association with locals)：與當地居民社交往來不僅有助於了解新社會的規範與社交技巧，也可縮短了解新環境所需的時間；此外，移民若與適合的當地朋友來往，比起都與同樣背景的外來朋友來往，會較快了解當地情況並融入當地。
7. 社會支持 (Social support)：在新環境遇到挫折時，若有來自在地親友或

社群的協助，有助於移民適應新環境及應付來自當地的挑戰。

Tsang (2001) 的研究發現，新加坡雖然也是由華人組成多數的社會，兩地皆可使用中文，但移入者仍會有面臨衝擊的經驗；亦即，就算移居的社會，與原有的社會具有相同的組成或相近的文化，移入者仍會面臨不同程度的文化震撼 (cultural shock)，也需要面臨一段適應的過程，所需的時間則因個人所面臨的狀況而有所不同；學生的年紀較輕，適應彈性佳，生活較為單純，因而適應當地的速度較快；教師所面臨的狀況較為複雜，需耗用更多心力去適應這個環境，以達成工作的要求及處理其他生活瑣事；由研究結果可知，職場發展是移入者適應當地生活重要的一環，而語言能力則與處理生活中各項大小事物以及是否能找到理想的工作有極大的關聯性。



三、回流移民的適應情形

移民回流後的適應情形，可分為兩大部份，一是對於外在生活環境的適應，例如天氣、在地的硬體設施、當地所販賣的各種貨品、社會治安等；另一則是兩地文化的差異性，像是不同的表達方式、法律規定、風俗習慣、官場文化，以及人際間的交往方式等。特別的是，即使擁有當地的生活經驗，且能使用相同的語言，回流者與在地民眾仍無法避免溝通上的問題，進而造成不愉快經驗，以印度的科技公司為例，進行團隊工作時，習於階層式管理模式（**hierarchical management**）的在地工程師，與接受美式訓練，做事不講情面的美國回流工程師，因溝通不良而起衝突的情形，往往不是單一個案（**Saxenian, 2007**）。

影響回流移民再適應的因素，與個人背景和外在環境有關；包括個人因素中的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在海外生活的時間長短、與原鄉聯結的程度、對原鄉的了解程度，以及個人在回流前所抱持的期待等；外在因素中則包括移入地與原鄉在經濟發展、生活水平、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差異性，以及原鄉社會接納外來事物、多元性與願意改變的程度。雖然在不同地區的研究中，回流移民的適應情形呈現了多樣的面貌，但從中可歸納出一共同的特質，即不論來自何地，在何種社會脈絡之下，不同世代的回流適應過程雖有所不同，但必須經歷逆文化衝擊的適應過程是不可避免的（**Gmelch, 1980; Gow and Iredale, 2003**），差別在於衝擊的程度、需適應的事物、過程所需時間的長短，以及所造成的改變。

以不同的世代來看，**Gmelch (1992)** 在針對海外回流巴貝多之移民的研究中，發現移民仍然需要重新適應，**Gmelch** 雖將回流移民視為改變原鄉社會的介質，可帶回原鄉社會所缺乏的資源，並成為原鄉社會進步的動力。然而，在實際的田野調查當中發現，移民即使在移入之初，懷抱著在原鄉生活的夢想，希望能享受自然而悠閒，且身邊有親友相伴的生活，實際回流之後仍會遇到很多困境，

例如從海外帶回了新的想法與概念，卻受到原鄉保守態度的反對。特別的是，在 Gmelch 此篇研究中提及，由於多是整個家庭一起回流，回流者包含兩個世代，對於父母而言，回流的意義等同於「回家」，雖然後續會遇到一些適應上的狀況，但起初是抱著愉悅的心情回流，不過對於年輕一代而言，許多人長期隨父母居住在海外，因為回鄉旅費是昂貴的負擔，年輕一代在成長過程中，很少回鄉探訪，對他們而言，回流的意義與感受與父母並不相同，有超過半數的年輕回流者在回流初期對於家鄉的生活非常不滿意，部份當地居民對他們融合外地文化的言行舉止報以不友善的態度，缺乏相同的興趣與話題、無法融入當地年輕族群的社交圈是他們普遍的困擾之一。

Potter (2005) 整理了聖露西亞 (St. Lucia) 及巴貝多年輕回流移民自述在回鄉之後遇到的困境，最主要的三項為：(1) 不易與在地人交朋友、(2) 生活步調緩慢、(3) 感覺受到排斥，無法融入當地。第一和第三項產生的背景原因在於，當地非常重視人際網絡，在地生長的年輕人，除了家庭之外，主要的人際關係來自學校的同學，在此情況之下，回流者與在地的年輕人，雖屬於同一世代，卻分屬兩個不同的群體，少有交集，而回流者的父母因為在當地成長而不會有類似的困擾。

以性別角色而言：Gow and Iredale (2003) 對於由澳洲回流中國、台灣、越南、孟加拉四個地區的移民研究中顯示，由於原鄉的社會風氣較澳洲保守，女性回流後會面臨較大的壓力，除了要接受傳統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及需負擔的責任與勞務，就業情形與職場發展也可能不如男性順利，特殊的經歷也使他們不易融入或被在地的女性社群所接納，此種情形在越南與孟加拉的研究結果較台灣與中國兩地的回流移民明顯。在 Potter (2005) 的研究中也提及，在巴貝多，由於社會較為保守，回流的年輕移民不易與在地生長的同儕做朋友，特別是在地的女性；若是女性的回流者嫁給在地的男性，則可能會因此與同樣背景的朋友較為疏遠而感到寂寞。

以社會態度而言，原鄉對於回流者在海外移居地的看法，可能會表現在一般大眾對待回流移民的態度上；與原鄉的情形相比，當回流者來自較為發達的國家時，其在海外的經歷可能會為其在原鄉帶來優勢並產生較高的社會地位；若是回流自原鄉普遍觀感較不看好的國家，當回流者表現出受到移居地區的影響時，則可能得到較為負面的回饋。

Knorr (2005) 對德國的回流移民所做的研究，對象是小時候因父母工作或其他因素，而隨父母遷居非洲地區，數年後再回流的情形；這些移民居住海外時，多半聚居於同族裔的社區之中，也會定期回德國渡假。回流之後，其周遭的親友、同學或同事，並未特別看待他們曾在海外生活之經歷，而是將其視為回流視為「回家」，認為他們在德國出生，且曾有在德國的生活經驗，身為德國人，理所當然應表現出符合社會期待的表現，而忽視其受到異鄉文化影響的部份；雖然居住海外時，來往對象都為同族裔者，對於德國的風俗習慣不陌生，也有回德國渡假的經驗，但並不是所有的回流者皆理所當然將德國視為自己唯一的家並能立刻表現出「合宜的言行舉止」，因而當來自外在社會的期待使他們必須隱去海外生活的影響時，回流者會在適應的過程中感到非常辛苦。

Tsuda (2004) 在關於巴西回流日本僑民的研究中提及，巴西的日本僑民本身相當以母國為榮，並認同自己的日本族裔身份，認為自己不同於當地民眾，卻在回流日本後，感受到自我與主流社會認知的巨大差異；即使出身自同樣的血緣與族裔，由於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回流者仍被視為外來者，而在日本形成群居的現象；儘管當地人認為是以友善的態度在對待回流移民，多數回流者並沒有太多的機會與當地人往來，無形之中被隔離於主流社會之外，且回流者只能從事低技術性、高流動性的外派工作。

同樣是自海外回流，1990 年代之後，由西方國家回到巴貝多的年輕移民則有非常不同的境遇，巴貝多的白人族群是加勒比海地區佔在地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當地向來崇尚西方文化，一些重要的企業體也是由白人家族所掌控，當年輕

移民回到巴貝多時，由於其西化的作風與流利的英語能力，職場生涯比起其他土生土長的對手佔優勢，在社會地位上也普遍較在地人高；他們的存在，形成了一新的社會階層（social location），稱為「Bajan-Brits」，介於在地居民與白人階層之間（Phillips and Potter, 2005）。

若進一步針對此情形加以探討，會發現社會的變遷對於移民回流後的境遇其實有著微妙的變化；巴貝多最早是英國的殖民地，近年來，整個社會則偏向受到美國的影響，因而，即使同樣來自海外，回流自英國和美國的年輕移民，在語言的使用與腔調上，會得到不同的回饋；在 Potter（2005）的研究中，回流自英國的受訪者表示，自己英式的口音、腔調及表達方式有時會被評論為「不好的」，沒有美國或加拿大的移民者討喜；不過，多數受訪者也表示，這種情況並不會造成他們太大困擾，他們將其他人的反應歸類為嫉妒的情緒。

近年來，華人移民回流的情形受到較大的關注，如 Salaff *et al.*（2008）由三個方向來研究加拿大多倫多市之年輕移民回流香港後的情形，包含（1）大環境職場的氛圍，如學歷與證照的認可、對相關工作經驗的重視等外在的制度因素；（2）社會關係方面，例如家庭關係以及社會網絡等；（3）個人的認同，探討回流者對於家與自身的歸屬感所在。在年輕回流者的預期之中，他們所擁有的個人資本在亞洲會比在加拿大更佔優勢，在原鄉的職場競爭中也較在香港成長的同儕有更大勝出的可能性；雖然有受訪者如願在回流後的短期之內取得理想的工作，但也有境遇與預期呈現嚴重落差的情形，須視個人所投身的職業領域而定。

由於香港的社會環境與加拿大差異甚大，回流者表示在離開多年之後，想再次重新融入，並不如想像中的簡單，特別是香港是個商業為主的城市，除了必須的證照、技能，及其他個人特質之外，人際網絡具有相當的重要性，而這一點常是回流移民在職場發展上最大的困境所在。另外，年輕回流移民所來往的對象之中，有相當高的比例是與他們擁有同樣背景的回流移民或是曾長期在海外求學的小留學生（parachute children），由於經歷與觀念上的差距，無形之中，回流移民

建構出了與在地成長的同儕不同的社會網絡。此外，為了維持本身的優勢性，回流者多數不會放棄與加拿大當地社會的聯結，且常常往返於香港和加拿大之間。

Ip (2006) 在中國上海及紐西蘭的奧克蘭市，針對由紐西蘭回流中國的移民做兩地的追蹤研究，受訪者的平均年齡為 39 歲，已回流三至四年，都是具有高薪的管理階層或具有專業技能的從業者。受訪者回流的主因都和工作有密切相關，回到中國，能有更大的個人發展空間以及更大的貿易市場，中國政府提出的種種優惠措施，包括稅率的優惠、特別發展區 (Special Development Zone) 及高科技園區 (Hi-Tech Zones) 的設立等，對於回流者而言是一項誘因。的確，回流之後，海外回歸的背景、專業的學識技能及流利的外語能力，為他們帶來職場上的成就，然而，回流者也發現在中國的生活並不如想像中的事事如意，職場文化的不同、與同事之間的相處不睦，成為他們最大的困擾。

由於經歷與背景的不同，與在地同事之間擁有的不同的工作倫理與態度，受到紐西蘭式職場文化影響的回流者，在交談與表達模式上也與在地的同事非常不同，兩者結合之下，不僅使受訪者們覺得和中國同事溝通不易，也影響了他們在中國的人際關係，間接造成了受訪者們構築出跨國的生活空間。他們表示自己的好友都是同樣自海外回歸的回流者，不一定侷限於紐西蘭的回流者，也包括來自加拿大和美國的朋友，不僅與留在紐西蘭的友人保持密切聯繫，也頻繁地到紐西蘭探訪，因為比起和中國的同事往來，與留在紐西蘭的朋友交談更令人感到愉快。

以台灣的情形來說，除了早期對於高科技人才從美國回流的文獻，以及往返於台灣、中國和東南亞等地區之間的台商研究之外，相關回流移民的研究報告並不多。Chiang and Liao (2008) 針對由澳洲回流台灣的年輕移民在台灣之適應過程的研究中，發現年輕移民回流台灣之後，除了必須適應台灣的工作環境，還必須面對生活環境和社會文化的再適應，即所謂的「逆文化適應」。在就業方面，回流移民會選擇與大學主修科系相關，並有較多機會使用英語的工作，以突顯自身的優勢，然而缺乏人脈，以及偏澳洲式的思考邏輯與行事風格，則可能造成他

們在與同事相處上，或是職場升遷上的困境；回到台灣後，除了污染嚴重、地狹人稠的生活環境之外，生活步調快、政治狂熱等社會文化，也令回流者無法接受；除此之外，由於受訪者多來自所謂的「太空人」家庭，回到台灣後，來自家庭的束縛力增強，造成了另一種來自內在的壓力。對這些年輕回流者而言，回流後的適應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適應不良的結果，甚至成為他們想再度回到澳洲發展的動機。

鍾佳君（2007）對於加拿大回流移民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結果，並更為強調就業因素對於回流的影響，認為回流者是因自己的專業背景在加拿大無法找到適合的工作，並在認為回流台灣以後，在職場發展上會比未曾移居海外的同儕更具優勢的期待下回台，卻在台灣職場遇到了社會文化所產生的隱型障礙，例如傳統而僵化的上下關係、缺乏在地的人脈、不懂台灣的人情世故，以及來自海外的西式作風無法得到工作夥伴的接受等，使得原先預期的效益打了折扣。與澳洲回流移民不同的地方在於，回流自加拿大的受訪者普遍表示加拿大的工作難找，失業率很高，為了工作，多數人並沒有太大的意願在近期內再次回加拿大定居。

由上述內容中可得知，由於擁有相當的族裔與血緣背景，卻缺乏共同的生活經驗與文化內涵，導致文化的差異性成為影響移民回流經驗的重要因素，而此影響力甚至可能成為回流移民考慮再次遷居海外的動力之一，儘管在衡量個人的職場發展與大環境的經濟情況後，再遷移的意願不見得會被付諸行動；然而，從中可看出如 Ip（2006）所述的情形，能夠使回流移民產生長久留下的意願，多是軟性的社會因素所造成，而非外在環境的硬體建設。

第三節 移民的自我認同

一、認同的意涵

認同是個體對於自我的看法，認同的本質，即個體如何界定自我(self)的過程。認同 (identity) 的本身帶有類同 (similarity)、差異 (difference)、反身性 (reflexivity) 和過程 (process) 等核心特質；亦即，為了界定出所謂的自我，就需要以相對於他人之類同、差異的角度，來建構關於自我的反身性感受，也就是所謂的自我身份認同。

Hall (1992) 對於自我認同之主體的形成有三種看法：啟蒙的主體 (enlightenment subject)、社會學的主體 (sociological subject)，以及後現代的主體 (post-modern subject)。(1) 啟蒙的主體是認為人是具有中心性的統合個體，人類具有理性思考能力，因此自我的主體是天生的、統一的，並具有核心性的。(2) 社會學的主體則反思在現代社會中，自我的核心並非自發性的，而是在與他者的互動中所形成，自我仍具有內在的核心，但是透過與外在世界持續互動，不斷地調整自己，且人們會將自我投射進文化認同之中，同時內化其中的意義與價值觀，使它們成為自身人格的一部份，產生具有一致性的行為模式，最後將自我嵌入社會的結構中，使得自我的表現與外在世界的運行變得更具可預測性。(3) 後現代的自我則認為認同之主體是破碎、多重而矛盾，甚至是無解的，認同的歷程是充滿開放、不確定且充滿疑問的，因而沒有固定的、永久的認同，認同也不具有所謂的本質性 (間接引用自蔡珮，2007)。

呼應上述看法，William James 描述自我認同為一種認識與思考的過程，包含主體的自我 (I)，以及客體的我 (me)，由於人們對於自我的訊息，大部份來自外界，而非始於默想或省思，因此來自他人與外界的評價，常常影響著自我

的認同，進而改變個人的信念與行為（趙居蓮譯，1995）；雖然自我的認同會受到個體核心價值的影響，但在如今日益複雜的社會網絡中，必然與他者產生互動，並遵循一定的社會規範，於是，人們會思考關於自我的存在及其於群居社會中的定位，亦即，在不斷地反問「我是誰」之問題，以及從外在反饋所得到的「你是誰」之答案中，形塑、調整，並進一步建構自我所在的定位。

教育心理學者艾里克森(E. Erickson)認為，認同可被定義為一種歷程(theory of ego identity formation)，植基於個人本質與他人互動之上，經過一連串的探索與嘗試後，個體會逐漸在各個面向做出屬於自己的決策與行為模式(Phinney and Ong, 2007)；於是，認同可被視為一種「成為」(becoming)的過程，在相似性與差異性的基準中逐漸產生；基本上，認同並非一種固定的本質，而是經由不斷轉變自我方向的過程累積而成，換言之，認同並非固定不變的，而是會受外在環境的變動而改變；當環境中的各種信念彼此衝突，或與自我概念相左時，個體會處於多方拉拒的狀態，並試圖把相關的多個層面統合起來，形成一個自己覺得協調一致的整體，在各種想法與信念取得平衡，進而達到自我統合(ego identity)的狀態。

當個體完成了自我的認同的過程，其整合內容不僅包含關於自我的想法，也納入了個體珍惜與尊重的信念與價值，因此當我們將認同視為一連續性地轉變，認同即構成了一項計畫，包含「該如何做」、「該如何行動」、「該成為何種人」等問題之解答，這計畫意指我們對於過往、現在與未來之自我認同表述的持續創造，墊基於自我認定之上，而此認定則依據我們從過去到現在的狀況，以及未來所希望成為的樣子。認同代表著我們內心所持有的身份，所擁有的真實自我，連結起個人內在的情緒以及外在的論述性（許夢芸譯，2007）。

二、移民認同之建立

認同在本質上是個歸屬 (ascription) 問題，由個人來自行歸屬，以及由他人來歸屬個人，而人們向來具有尋求群體認同及個人歸屬，於是，在相似性與差異性的比較之下，最直觀的經驗，便是尋求血緣與外貌上的類化。早期的認同研究，從本質主義觀點出發，認為群體的認同必然來自具同一性與原真性的特徵，如生理上的特徵或地域的特色，此集合體的所屬成員會內化共有的特質、擁有統一的社會經驗而建構自我，由於共享一種歷史、血統和文化，使族群成為單一特有的民族，具有穩定、連續不變的意義框架。

對於移民而言，個人的認同可透過祖先來確定個人族群的起源、根源與繼承，也可以反應個人、祖先或父母的出生地，然而，若我們只從一個人生命背景的條件來說明身份與認同的關係，則可能缺乏動態的人生經歷與轉折的過程描述，因為認同的形成與個人生活環境的變化習習相關，每一個生命的抉擇、社會與文化影響的結果都可能促使主體必須不斷地重新定位，尋找自己的位置，因此，認同的主體建構歷程，應是與個人的生命經驗與社會文化歷史脈絡無法切割的，如張玲 (2001) 研究台灣新移民在美國的自我認同時，認為以「台美人」(Taiwanese American) 做為身份表徵的移民，其認同的內涵有別於「華美人」(Chinese American) 及「亞美人」(Asian American)，此認同是建立在台灣移民及其子女從台灣帶來的共同信念和相似的歷史經歷之上，是由台灣移民們有意識塑造出來的。

由此可知，移民的經歷，是建構在空間與時間交織的特定情境之下，個體對於自我的認同，是隨著時間的延伸，由不同空間中的生活片段所逐漸累積、轉化；空間由時間軸線中抽離，就缺少了某部份的意義，而時間則傳遞了認同化的過程，不論是對於認同的自我宣稱或是自我歸屬，都需要有連續性 (continuity) (王和許譯，2006：28)，因此，所要關心的或許是認同化的過程，是存有和變化的

軌跡，而不是固定的認同狀態，因為恆定的認同狀態也許是不存在的。

高夫曼 (E. Goffman) 以框架 (framing) 的概念來總結人生經驗的多變複雜；從個人來看，或就社會和世界的組織構成而言，每一個特定的社會場景都是一種框架，每個框架都有其特殊的意義和規則，互動則在框架內部組織起來；個體對於人生的體驗，猶如一連串不同的布景與舞台；每個人對於這些場景以及其中發生的事件，都有不同的體會，但共享的框架會創造足夠的一致性和相互性，讓互動持續下去，也就是所謂的「互動秩序」(interaction order) 的觀念；而個體會在互動秩序中協調自己的認同，個體會在每一個特定的框架的例行活動中發揮互動能力，呈現出一個他人能夠接受的自我形象 (王和許譯，2006：70)。若將情境轉移至跨國遷移的歷程之下，移民所處的每一個社會，擁有其獨特的社會文化與風俗習慣，在每一個社會生活的期間，移民會受到當地文化與社會規範無形的影響，並轉而表現出符合外在期待的表現，以符應當地的社會秩序。

於是，移民的認同，不再僅以血緣或歷史傳承畫分的族裔(祖裔)群體做為畫分的依據，開始強調族群的文化與社會意涵，認為族群認同可被視為社會認同的一部份，是一種個人概念，衍生自個人所屬或所認定群體，具有情感上的依附性，也分享了群體共同的認知、價值觀、態度與信念；如同 Leach (1977) 所提，兩個族群的差異或許並非客觀的種族或文化差距，而是族群本身主觀上認為有差異 (間接引自王明珂，2005)，例如在他人眼中，來自中國與台灣的移民，可能被歸類為同一個族群，然而，來自中國與台灣的移民彼此卻不見得有同樣的族群認同，而試圖呈現彼此的差異，如 Lien (2004) 在美國舊金山與洛杉磯訪談了 15 位來自中、港、台三地的移民，發現他們有近七成認為自己是華人(Chinese)或華裔美國人 (Chinese American)，但來自台灣的移民在稱呼自己為 Chinese 時，則會加上「Chinese from Taiwan」以做為區別。

呼應上述 Lien (2004) 的研究結果，認同不僅成為一種區分我群與他群的策略，在不同的情境之下，我群的內部也可能會再加以細分出次級的認同；然而，

不論是哪一層級之認同，都是在兩種或以上的族群相互接觸一段時間後，才會出現被自我與他人探究的意義；因此，對於移民來說，族群認同的存在有其必然性與重要性。早期的研究採用所謂大熔爐的觀點，以群體的趨勢為主體，認為移民會切斷與家鄉的聯結，在新的土地上重新生活，接受新社會的規範與價值觀，並在數個世代後完全融合，成為新社會的一份子，即所謂的適應成功；移民建構或保持對自我族群(族裔)的認同，對移民個體而言，有助於內心的平衡及健康(good mental health)；因此，雖然就整體性而言，移民必定會受到主流文化的影響，且此影響會隨著移民的世代而加深，但族群認同在此處所指涉的，無疑是較偏向個人與微觀層面的，而非群體與群體間的關係消長情形(Phinney, 1990)。

Phinney (1990) 將移民之族群認同建構的過程分成三個階段：(1) 混亂階段，個體缺乏自主性對族群性的關注，沒有或極少認同的概念或問題，可能被動式地接受父母或長輩等他人給予的族群概念。(2) 探尋階段，不必然會遇到劇烈的族群文化衝突或強烈的情緒反應，但已知覺到族群區分對自我的重要性，或已投入探究自身認同的階段。(3) 定向階段：個體已形成明確且穩定的族群認同，能清楚辨別不同族群，對我群感到正向的情緒反應，如自尊與自信，對他群亦擺脫偏見或敵意，展現包容與接受，進而能和諧處於不同族群文化的影響之中(李繼利，2006)。

對於移民或下一代而言，族群認同常始於個體成長的家庭，隨著年紀增長，漸漸擴及到學校、同儕、社區等生活圈。就發展的觀點而言，在孩童階段，族群認同的基礎便已奠定，且有了初步形式的展現；個體歸屬於某一族群的自我標記(self-label)，以及對於所屬族群的基本認知，仰賴父母藉由家庭教育的方式加以形塑，包含對族裔與家鄉的認知、語言的學習、相關的價值觀與態度等等(Phinney and Ong, 2007)。以 Lee (1992) 研究布里斯本的台灣移民時，發現年輕一代在自我認同與價值觀念上受到父母的影響極深，而塑造此結果的原因，多來自父母的要求與期待，如在家中是否要說中文，未來的結婚對象是否要是華人

等；而同儕與生長環境也同樣是影響移民自我認同的重要因素，若年輕移民在成長過程中，就讀公立學校，接觸的對象多為非華人，則傾向接受同儕的價值觀，受澳洲文化的影響也較深，反之則較為傾向本身族裔的文化。

除了家庭環境，當個體因為成長、求學、工作，而使得生活圈擴大，與主流社會接觸的機會增加，難免會遇到主流文化與族群（族裔）價值觀互相衝突的情形，此時，家庭可能成為壓力的來源之一，但也成為個體試著整合、化解衝突的場域（Phinney and Ong, 2007），此種家庭與主流社會之間所造成個體自我認同的不連貫性，在 1.5 代移民身上更為常見。1960 年代之後移居美國的華人移民，被視為「模範的少數族群」（model minority），多數人從事具技術性的專業工作，在職場有相當好的發展性，隨之移居美國的子女，即所謂的 1.5 代年輕移民，在課業方面的表現也相當優秀，然而這些 1.5 代移民卻容易在青少年時代面臨自我定位的危機；學校教育與媒體所宣揚的主流文化，促使他們偏向認可自己為「美國人」，然而，回到家中，不論是生活習慣、親子相處、語言使用等各方面，都提醒著他們是「華人」（Chinese），更甚者，由於擁有原鄉生活的經驗，多數人明確知道自己亦不能完全歸屬於「華人」，而只是族裔與外觀上偏向華人；此時的年輕移民若無法在自我認同上取得平衡，可能導致未來選擇較為基進的(radical)身份認同，如認為自己為「美國人」，而排除自身為「華人」的部份（Tong, 2003）。

隨著年紀增長，青少年或年輕人會開始思索，在大小事物上做出自我的抉擇，最終達到成熟而穩定的認同狀態，使得衝突或猶疑等負面情緒的出現機率大為降低，而具向心力的族裔社群或結構完整（well-structured）的組織則是接續家庭教育，成為族群認同建構的主要助力（Phinney and Ong, 2007）。Phinney *et al.*（2001）針對來自墨西哥、亞美尼亞、越南，三地共 216 個移民家庭的第二代進行關於族群認同建構的調查研究，認為族裔語言的流利程度與族群認同的建構具顯著的正向相關性，且多數受訪者的父母相當重視下一代對於族裔語言的學習，此點在 Tong（2003）針對美國華裔家庭的研究中也有同樣的發現；而同族裔的

同儕往來，則更加強了族群認同，其影響甚至比語言的因素更加顯著。

以楊智翔（2006）研究澳洲墨爾本地區的年輕台灣移民為例，他發現，在家庭教育上，父母的管教方式會影響年輕移民的認同；在學校中，語言和同儕團體的互動是主要影響認同建構的因素；年輕移民的認同經驗在家庭、學校、以及人際交友圈的影響下逐漸累積並強化，進入社會後，雖然面對的社會層面更開闊，往來的對象可能也更多元化，但進入職場後，其認同卻有可能變得窄化，趨向自己血緣的族裔團體。而在自我認同呈現穩定的狀態之後，其外顯行為表現也隨認同之選擇而不同，兩者彼此相關，並互相強化；如認為自己是「澳洲人」的受訪者，移民時通常年紀很小，除了與家人溝通可能使用中文之外，一般交談都是以英文為主，且往來的朋友通常不是台灣人或是華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或同時認同兩種身份的受訪者，通常對台灣發生的事情有一定程度的關心，往來的對象則不一定以台灣人或當地人為主，但仍然會有部份台灣人的朋友。

對 1.5 代移民而言，選擇哪一種身份，不代表背棄或全然接受主流、族裔文化的影響，只是試圖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希望憑自由意志決定自己的人生走向；他們明確了解自己「複合式」(hybrid) 的族裔與文化背景，即使對自我身份做了抉擇，在其行為表現上，仍是持續著與主流、族裔族群的交流，差異性僅在於自我的重心與偏向所在。

三、移民之適應與認同

移民的自我認同與適應當地社會的情形，具有一定的關聯性。身為一個社會的移入者，移民本身具有複合式 (hybrid) 的經歷與內化過程，帶著原鄉的思想觀念與經歷，試著接受新社會的文化，並在接受與捨棄之間尋找平衡點，試圖表現出隸屬於該社會的思考與行為模式；其外在的表現可能起源於目前所處社會中之他人對於此種態勢呈現接受的狀態，但內在的個人認同往往處於自我形象與公

共形象不完全相似的狀態。於是，個人對於自我認同的選擇，不僅代表其族裔、血緣、原鄉等個人過往的立場與背景，更成為了當下對於自我定位的再現，將自我形塑為新的主體，使自我得到在新社會開展生活的立足點。當我們在自問「我是誰」之時，不僅在建立一個肯定的身份，所得到的答案，亦是一種建立新的立足點之策略，並在此基礎之上開展新的發言管道。

整體而言，移民若能在新的社會擁有良好的生活經驗，降低文化衝擊的程度，有助於提升當地社會的認同感，形成良性的循環。以廖珮君（2005）研究澳洲年輕回流移民在台澳兩地之間的適應與認同情形為例，移民若在澳洲生活的初期階段認為自我在當地擁有遭到歧視的經驗，可能會使移民對澳洲產生不滿的情緒，轉而回到台灣人的圈子，排斥外人，傾向不認同澳洲；相反地，在澳洲適應良好的情形會使年輕回流移民更能深入澳洲的社會，並進而認同澳洲；而其回流後的適應與認同情形，也會受到移居澳洲時所形成的適應與認同因素影響，若是對台灣認同度較高者，回流後的適應情形會較好。不過年輕移民在真正回流台灣之後，其認同仍會再次呈現變動的情形，因為週遭環境的刺激而改變；若在台灣有不好的生活經驗，可能降低對台灣社會的認同感，應而間接影響到其未來的生涯規畫與遷移動向。

Ip（2006）的研究也發現類似的情形，自紐西蘭回流中國的移民，在紐西蘭的美好經歷，使他們抱持著紐西蘭的價值觀，自覺與中國的同事無法溝通，不欣賞他們的工作態度，更不會強調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雖然為了經濟因素而選擇留在中國，但往來的對象多為同樣來自西方國家的回流華人，不與在地的他人產生較深入的互動，而是經常利用通訊設備與在紐西蘭的友人聯繫，雖身處中國，卻在生活中創造出了跨國的生活空間與個人網絡。在缺乏人際網絡牽絆及歸屬感的情況下，一旦外在的經濟誘因消失，例如退休，回流者便想要離開中國，再次遷居紐西蘭。

由此可知，移入者（或是回流者）在適應新生活的過程中，能否產生的良性

經驗，對於其自我的認同與定位，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而此經驗的產生，必須仰賴移入者個人開放的心態，以及社會中主流族群所表現出接納的態度，缺一不可。移民藉由與他人的互動，明白自己受接納的程度，並了解移居地社會的文化，進而試圖調整自己的外在呈現，能否與他人進行適當而有效的溝通，成為移入者適應當地生活，並進一步認為自己隸屬於當地社會的關鍵，如同 Thomas (1988) 所認為，移民需具備成功的跨文化溝通能力，包括協商雙方共享的意義 (mutual meanings) 與社會規範 (rules)，並在此往來循環不斷的過程中，最終獲致正面的回饋 (positive outcomes)，如此一來，移入者(或是回流者)才能在新的社會安居樂業，並逐漸融入其中。

不同世代的跨國移民可能面臨不同程度的溝通能力問題，移入者擁有多少移入地的溝通能力，將會影響移民是否能分享移入地之共同的意義系統及行為規範，也會影響他人認可並接受其身份認同之程度。個體接受來自外界的正增強回饋，有助於融入當地社會；若個體持續無法與社會中的他者有效溝通，導致接受過多的負增強回饋，在個體具有遷移選擇空間的情況下，則可能間接導致再次遷移的出現。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執行

一、研究對象與方法

過去關於台灣移民的研究，多著重在移出人口在移居地的情形及相關議題，反向遷移之回流人口較少被做為探討的題材；而不同世代的移民，由於本身經歷的不同，在語言、文化、經濟活動、自我認同等方面，皆可能呈現不同的特質；因此，研究者選擇以介於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間的 1.5 代移民，做為探討回流人口的主要研究族群，來了解其回流決策的形成及後續的相關議題。

回流移民，意指在原鄉出生，遷居海外數年後，再回到原鄉生活的移民。而 1.5 代回流移民，參考 Chiang and Liao (2008)、Salaf *et al.* (2008) 等學者所定義，指在原鄉出生，於年紀幼小時，隨父母遷居海外，在海外生活、成長，於成年之後，回流原鄉定居與發展者。由於 1.5 代移民在移居海外時，年紀較小，多是隨父母被動移出，於成年或能自我獨立之後，因各種考量，而自主決定回到原鄉發展；其成長經驗與對家鄉之認知的構築，是由兩個或以上的社會所構成，這樣的經歷使他們在許多方面擁有複合式的獨特性，雖同時受到兩地或以上的文化薰陶，卻不完全屬於、難以界定是否傾向任何一方，也是 1.5 代回流移民的獨特性所在。

為了了解台灣的 1.5 代移民，在本研究中，將受訪者限定在出生於台灣，於 1980 年代以後，在未成年或未能自我獨立之前，隨父母或其中一方遷居海外，至少居住一年以上，並取得移入地的公民身份或永久居留權；於成年或完成學業之後，依自我意志決定返回台灣發展，並有長久定居之打算，且在訪談進行時，已定居台灣達一年以上之時間者。

本研究之目的是呈現出 1.5 代回流移民的回流經驗及此一族群的心聲，希望

以人本主義地理學的原則探討移民的經驗與認同問題，更為強調遷移時的微觀過程，並將重心放在有決策能力的個體上，因此擬採用質性的研究方式，除了參考台灣與移入地雙方政府公佈的統計資料及委託研究報告，試著了解其所處的時代背景與社會脈絡，主要研究過程將利用半結構式問卷進行，透過通訊問卷的填答、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從個人生命歷程的轉變來了解這些自異國回流的年輕族群，去呈現出他們個人的感受與經驗的多樣性。

Yin (2003) 認為，個案探討是希望能擴充現有的研究及相關理論所涵蓋的範圍，個案研究的結果或許能和既有的理論相呼應，但無法被概略化應用在所有的情形中。因此，研究者亦參考個案探討的研究取向，目的不在於量化問卷並歸納出統計上的通則，而是希望點出研究族群的情形，讓讀者能對回流移民的遷移經驗及其多元性有較為深入的了解。



在大致閱讀過相關的前人研究與調查報告後，發現移民(移入者)的遷移決策，主要取決於個人的背景條件，以及大環境所提供的遷移機會與管道；移民本身是否實現遷移行為的最主要考量多是個人的、家族的發展性，且是偏向於主觀判斷的，但宏觀的跨國人口遷移研究與政府策略多半著眼於遷移所伴隨產生的經濟效益。

移入者進入移居地後的適應問題，以初次遷移而言，主要是在語言、家庭、工作與就業、人際互動與社交網絡、生活型態與社會文化等方面。而回流移民的適應性研究，則可分為幾個面向，包含移入地與移居地的經濟發展、文化差異、回流者本身所屬的世代(出生在原鄉的第一代移民，或是在海外出生成長的第二代及以後的海外族裔僑民)，以及原鄉社會對於回流者的主流態度等。而移民的認同情形，根據不同的時間、地點，移民的世代，以及移居地的情形，會產生相

當多元的結果；對於自我的定位，則仍然受到對族裔與原鄉的情感，以及成長經歷的影響。

整體的研究設計，是以研究的目的為主軸，並參考相關的研究，決定出研究的支脈，然後以研究架構圖來呈現概念（見圖 3）。首先，研究者想要呈現的是以時間脈絡來描繪 1.5 代移民的整體遷移歷程，包含當年遷出的情形、回流的原因，以及未來是否具有再次遷移的意願與規劃。接著，切割出特定的時空，即 1.5 代移民回流台灣後的階段，來了解其再適應的情形與自我的身份認同；個人背景與條件，所處的人生階段、大環境的情形，以及回流者與主流社會他者之互動，是形塑年輕移民再適應與自我認同的重要因素，而這二者之間亦互相影響。最後，釐清當年移出原因、回流原因、再適應情形，以及自我認同，與回流者個人之再遷移計畫之間的關聯性，並完成了整體遷移情形的記錄與歸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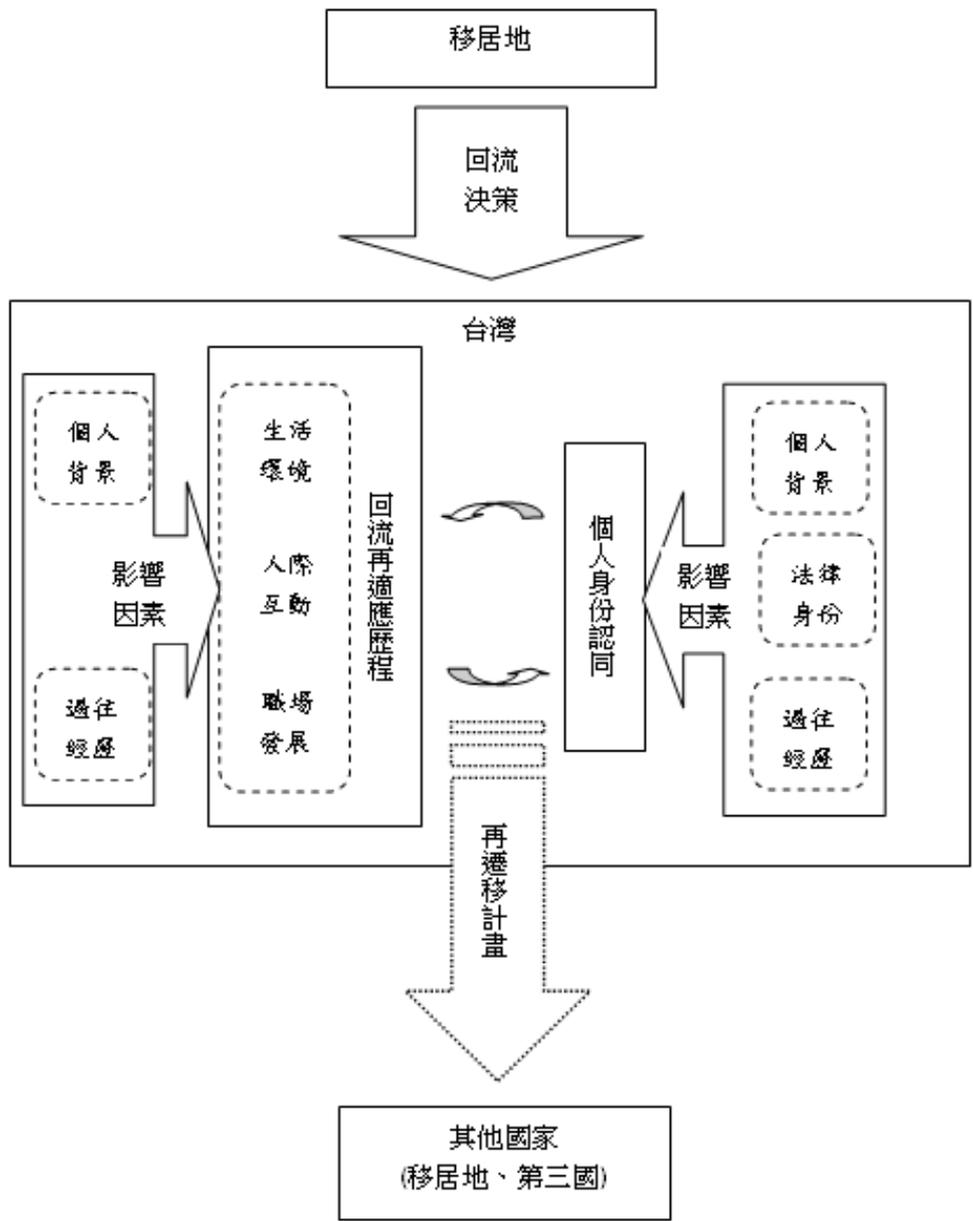


圖 5：研究架構圖

三、受訪者樣本分析

本研究的主要族群以 1980 年代後由台灣移居海外的 1.5 代移民為主，研究者透過滾雪球方式，在台灣各地區進行訪談，共完成 37 份問卷，包含 30 次訪談（包含面訪及電話訪問）及 7 份通訊問卷填答；目前受訪者多數居住在台北縣市（27 位），其他地方包含新竹（4 位）、台中（1 位）、花蓮（1 位），以及屏東地區（4 位）。訪談時間約為 45 至 90 分鐘，主要進行於 2008 年 8 月至 2009 年 1 月，並於 2009 年 2 月至 10 月，視情況許可利用電子郵件、電訪或再次面訪，和部份受訪者再次聯繫，以獲得更完整的研究資料。

在 37 份受訪樣本中，除了一位受訪者於 1979 年 12 月 25 日移出之外，其他年輕移民都是在 1980 年之後移出，於 1990 年之後回流，教育程度相當高，有 2 位仍在接受高等教育，其他 35 位受訪者擁有大專以上之學歷，20 位受訪者的最高學歷為學士，11 位是碩士（包含 1 位擁有雙碩士學位），4 位受訪者擁有博士學位。以下是對於受訪者背景的整理：

1. 37 位受訪樣本包含 27 位女性，10 位男性，主要來自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以及阿根廷，目前年齡分布界於 21 至 39 歲之間；有 3 位在 21-25 歲之間，14 位界於 26-30 歲，15 位是 31-35 歲，5 位在 36-40 歲之間。
2. 受訪者居住海外的時間，最短為 7 年，最長達 23 年。初次移出時間，有 3 位是在小學低年級之前，23 位在小學畢業前離開，中學時期移出的有 6 位，2 位則是在完成中學教育後移出。移出情形較特殊的有 3 位：受訪者#22 的父親是外派人員，在正式擁有移民身份前，曾陸續前往美國短暫居留。另一位男性受訪者（#25）受限於兵役問題，於服完兵役後才離開台灣。受訪者#12 在取得依親資格時，已在台灣取得大學入學資格，於是在取得學士學位後，才遷居至海外。
3. 回流移民們擁有豐富的短期遷移經驗，部份受訪者因個人因素，例如探親與

符合兵役、身份規定，而定期出入國境，或是因職業所需，如出差或外派，而形成經常性的往返遷移行為，地區包含東亞（中國、香港、日本）、歐洲、北美（加拿大、美國）、中南美洲（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

4. 其中的 17 位受訪者曾有長期居住於台灣及移居國以外第三地之經驗，原因仍以教育因素為主，其次則是因工作外派他國，或是隨父母再次遷移；

(1) 因教育因素而前往第三地：

台灣 → 加拿大 → 美國 → 台灣

台灣 → 阿根廷 → 智利 → 台灣

台灣 → 阿根廷 → 美國 → 台灣

台灣 → 阿根廷 → 德國 → 台灣

台灣 → 香港 → 加拿大 → 香港 → 台灣

台灣 → 阿根廷 → 加拿大 → 美國 → 台灣

台灣 → 巴拉圭 → 阿根廷 → 美國 → 台灣

台灣 → 阿根廷 → 德國 → 阿根廷 → 台灣

(2) 因工作因素而移居他國：

台灣 → 阿根廷 → 加拿大 → 美國 → 中國 → 台灣

台灣 → 阿根廷 → 台灣 → 巴拿馬 → 台灣 → 巴西 → 台灣

(3) 因其他因素而遷居第三地：

台灣 → 巴拉圭 → 阿根廷 → 台灣

5. 其個人資料與經歷整理如下表：

表 10：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編號	性別	年齡 ⁸ / 出生年代	婚姻 狀態	教育 程度	職業	慣用語言 ⁹	主要移居國 ¹⁰ / 身份	其他居住 國(地)	回流年齡/ 年代	回流 年數 ¹¹
#1	F	28/1980	未婚	B.A.	藝術創作者	中文*、英語	加拿大/公民	N/A	23/2003	5
#2	F	30/1978	未婚	B.A.	留學顧問	中、英語差不多	澳洲/公民	N/A	28/2006	2
#3	F	27/1981	未婚	B.A.	電機工程師	中文*、英語	加拿大/公民	N/A	23/2004	4
#4	F	27/1981	未婚	M.A.	金融業從業者	英語*、中文	紐西蘭/公民	澳洲	27/2005	3
#5	F	27/1981	未婚	M.A.	學生	中文*、英語、日語	加拿大/公民	美國	23/2004	4
#6	F	26/1982	未婚	B.A.	研究助理	中文*、英語	加拿大/公民	N/A	23/2005	3
#7	F	26/1982	未婚	B.A.	學生	英語*、中文	加拿大/公民	N/A	19/2001	8
#8	F	35/1973	已婚	Ph.D.	教師	中文*、西班牙語、 閩南語、英語	阿根廷/PR ¹²	N/A	19/1992	16
#9	F	27/1981	未婚	B.A.	設計師	中文*、英語	加拿大/公民	美國	23/2004	14
#10	M	21/1987	未婚	B.A.	學生	英語*、中文	美國/公民	N/A	28/2007	1
#11	F	32/1976	未婚	B.A.	牙醫	中文*、西班牙語、 台語	阿根廷/PR	美國	28/2004	4
#12	F	40/1968	已婚	Ph.D.	教師	中文*、英語	紐西蘭/公民	N/A	33/2001	8
#13	M	33/1975	未婚	B.A.	貿易公司從業人員	中文*、西班牙語	阿根廷/PR	N/A	31/2006	2
#14	F	34/1974	已婚	B.A.	貿易公司從業人員	西班牙語*、客語 英語、中文	阿根廷/PR	巴拉圭	20/1994	14
#15	F	33/1975	未婚	M.A.	貿易公司從業人員	中文*、西班牙語、 英語、台語、俄語	阿根廷/PR	N/A	19/1994	14
#16	F	34/1974	未婚	M.A.	貿易公司從業人員	西班牙語*、台語、 中文、英語	阿根廷/公民	巴拉圭	30/2004	4

⁸ 指受訪者在 2008 年時的年齡。本研究主要訪談時間進行於 2008 年 7 月至 2009 年 1 月，2009 年 1 月至 2010 年 1 月則持續與受訪者們聯繫，以取得更完善的訪談資料。

⁹ *指受訪者認為自己使用最熟練的語言。

¹⁰ 指受訪者擁有該國公民身份或永久居留權，不包含曾居住過、但未擁有該國公民身份或永久居留權的國家。

¹¹ 指回流後至 2008 年的年數。

¹² 受訪者僅擁有當地的永久居留權(Permanent Resident, PR)，不具備該國公民身份。

編號	性別	年齡/ 出生年代	婚姻 狀態	教育 程度	職業	慣用語言	主要移居國/ 身份	其他居住 國(地)	回流年齡/ 年代	回流 年數
#17	M	36/1972	未婚	B.A.	牙醫師	西班牙語*、中文、 英語	阿根廷/公民	美國	28/2000	8
#18	F	32/1976	已婚	B.A.	金融業從業人員	中文*、英語、粵語	加拿大/公民	香港	28/2004	4
#19	M	34/1974	未婚	M.A.	電腦工程師	中文*、英語、西班牙 語	阿根廷/公民	美國	28/2002	6
#20	F	29/1979	已婚	B.A.	家管	西班牙語*、中文	阿根廷/公民	N/A	25/2004	4
#21	M	34/1974	已婚	B.A.	牙醫	西班牙語*、中文、 英語	阿根廷/PR	巴拉圭 美國	30/2004	4
#22	F	25/1983	未婚	M.A.	教育行政人員	中文*、英語	美國/公民	N/A	24/2007	1
#23	M	27/1981	未婚	M.A.	貿易公司從業人員	中文*、英語	加拿大/公民	N/A	24/2005	3
#24	F	35/1973	已婚	B.A.	教育行政人員	中文*、英語、台語	美國/公民	N/A	26/1999	9
#25	M	38/1970	已婚	B.A.	教師	中文*、英語	加拿大/公民	N/A	37/2007	1
#26	F	30/1978	已婚	B.A.	家管	中文*、英語、 西班牙語	阿根廷/公民	N/A	20/1998	10
#27	F	37/1971	已婚	B.A.	家管	中文*、西班牙語、 英語	阿根廷/公民	美國	28/1999	9
#28	F	36/1972	未婚	Ph.D.	研究員	西班牙語*、英語、 中文、德語	阿根廷/PR	德國	33/2005	3
#29	F	39/1969	已婚	M.A.	教師	中文*、西班牙語、 英語	阿根廷/PR	美國	23/1992	16
#30	F	24/1984	未婚	M.A.	教師	英語*、中文	紐西蘭/公民	美國 英國	23/2007	1
#31	M	24/1984	未婚	B.A.	學生	中文*、台語、 西班牙語、英語	阿根廷/PR	N/A	18/2002	6
#32	F	29/1979	未婚	B.A.	金融業從業人員	中文*、英語、 日語、粵語	紐西蘭/公民	日本	23/2002	6
#33	F	27/1981	未婚	M.A.	教師	中文*、英語、日語	紐西蘭/公民	N/A	26/2006	2
#34	M	34/1974	已婚	B.A.	機械工程師	台語*、西班牙語、 中文	阿根廷/PR	N/A	19/1992	16
#35	F	29/1979	未婚	M.A.	設計師	英語*、客語、中文	美國/公民	美國	26/2005	3

編號	性別	年齡/ 出生年代	婚姻 狀態	教育 程度	職業	慣用語言	主要移居國/ 身份	其他居住 國(地)	回流年齡/ 年代	回流 年數
#36	F	35/1973	已婚	Ph.D.	教師	閩南語*、中文、 西班牙語、德語、 英語	阿根廷/PR	德國	32/2005	3
#37	M	35/1973	已婚	M.A.	規劃師	中文*、閩南語、英 文、西班牙文	阿根廷/PR 加拿大/公民	美國 中國	35/2008	1



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1.5 代年輕移民回流原因分析

回流移民在海外居住的時間，最短為 7 年，最長可達 23 年；除了移入國之外，有 18 位年輕移民曾居住過台灣和移入地以外之第三國達至少半年以上之經驗。多數年輕移民能夠流利地以中文或英文做口語表達，但流利程度因人而異，少數受訪者認為自己的中文書寫能力不佳。37 位受訪者之中，除了英語和西班牙語，還有 4 位會日語，1 位會俄語，及 2 位會德語。除了高學歷、專業技能，以及良好的外語能力，所有的年輕移民都能夠以流利的國語或方言(客家話、閩南話)交談，此點與移出時的年齡有關，而父母對於子女學習華語的堅持要求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素，因此多數受訪者在海外居住時，於家中使用原鄉的語言，並在年紀較幼小時就讀過中文學校，此點與 Tong (2003) 所述的美國移民家庭情況相似，在 1990 年美國的人口調查顯示，約有四分之三的 1.5 代華裔未成年人在家中是使用國語或是其他的方言，而非使用英語。

在本研究的 37 位受訪者中，除了 3 位仍在台灣接受高等教育之外，其他受訪者至少都有大專以上的教育程度。回流者多數曾在海外求學期間從事兼職的工作，除了一般服務業的工讀之外，翻譯人員、社區或校園義工也是常見的工作經驗，負責幫助新移民適應當地環境的工作，包括服務剛進校園的同族裔新移民，或是替近期才移入當地的學童指導課業。年輕移民回流時的年紀介於 19 至 37 歲之間，其中有 6 位是為了回台求學，其他人多處於個人職業生涯的初步階段，在訪談工作進行時，除了 2 位女性受訪者因子女年紀幼小而辭去原有工作之外，32 位受訪者目前都已在台灣有了穩定的全職工作，且其中有 18 位受訪者在回流台灣之前，曾有在海外從事全職工作的經歷。如此看來，受訪者們在移居地生活多年，不僅擁有可永久居留的身份，部份年輕移民甚至已在移居地找到專職的工作，在此種情形之下，是什麼原因促使他們決定回流台灣？在決策的過程中，所考量的因素又是如何？

經由訪談結果的整理，可將年輕移民的回流考量整理如下：

表 11：1.5 代移民回流原因分析

編號	移出/回流年齡	移居海外總年數 ¹³	移出原因	移居國	遷移型態	回流原因
#1	14/23	9	教育因素	加拿大	非全家遷移(父親在台灣)	環境因素
#2	12/28	16	教育因素	澳洲	全家遷移	家庭因素
#3	11/23	12	政治因素、教育因素、家庭因素、親友協助	加拿大	非全家遷移(父母在台灣)	就業考量、家庭因素
#4	16/27	11	教育因素、政治因素	紐西蘭	全家遷移	家庭因素、希望有東亞工作經驗、體驗不同生活
#5	15/23	8	教育因素、親友協助	加拿大	非全家遷移(父母在台灣)	就業考量、家庭因素、思考未來的方向
#6	15/23	8	教育因素、親友協助	加拿大	非全家遷移(父母在台灣)	家庭因素
#7	10/19	9	父母想要移居海外、親友協助	加拿大	非全家遷移(父親在台灣)	家庭因素
#8	10/19	9	父親應聘	阿根廷	全家遷移	教育因素、家庭因素、學習中文、婚姻考量
#9	16/23	7	教育因素	加拿大	非全家遷移(父母在台灣)	個人的生涯規劃、家庭因素
#10	8/20	12	教育因素、依親、拿身份	美國	全家遷移	教育因素、學習中文、了解台灣文化
#11	12/28	16	家庭因素、宗教因素	阿根廷	全家遷移	經濟因素
#12	22/33	10	教育因素、依親、拿身份、環境因素	紐西蘭	非全家遷移(父親在台灣)	家庭因素、體驗不同生活
#13	14/31	17	親友協助、拿身份、朋友邀約	阿根廷	全家遷移	家庭因素、婚姻考量、就業考量
#14	6/20	14	父親應聘	阿根廷	全家遷移	教育因素、家庭因素、婚姻考量
#15	11/19	8	家庭因素、親友協助	阿根廷	非全家遷移(父親在台灣)	家庭因素、教育因素、就業考量
#16	10/31	20	環境因素	阿根廷	全家遷移	就業考量、親友因素、嘗試新環境
#17	10/28	18	政治因素、教育因素	阿根廷	全家遷移	家庭因素
#18	14/28	14	家族事業因素、教育因素	加拿大	非全家遷移(父母在香港)	家庭因素、婚姻因素
#19	13/28	13	環境因素、朋友邀約、拿身份	阿根廷	全家遷移	家庭因素、就業因素
#20	7/25	18	政治因素、兵役問題、環境因素	阿根廷	全家遷移	經濟因素、家庭因素
#21	10/30	20	教育因素、政治因素、兵役問題	阿根廷	全家遷移	經濟因素、就業因素、家庭因素
#22	19/24	8	父親工作外派、依親、拿身份	美國	全家遷移	自己較習慣台灣的生活
#23	16/26	8	教育因素、親友協助	加拿大	非全家遷移(父親在台灣)	就業考量、希望有東亞的工作經驗
#24	14/26	12	教育因素、依親、拿身份	美國	全家遷移	個人生涯規畫、回台奉獻
#25	20/37	17	環境因素、社會因素	加拿大	全家遷移	思考未來的職場方向、回台服務

¹³ 指受訪者實際居住於台灣以外地區的總年數，不包含一年以下的短期居留時間。有些受訪者曾回台居住數年後，再次移居海外，因而移居海外的總年數不能單純以回流時間扣除移居時間。

						與奉獻
#26	13/20	7	社會因素、政治因素	阿根廷	非全家遷移 (父親在台灣)	教育因素、家庭因素、就業考量
#27	10/28	18	政治因素、教育因素	阿根廷	全家遷移	就業考量、婚姻考量
#28	10/33	23	不清楚	阿根廷	全家遷移	就業考量、家庭因素
#29	11/23	12	家庭因素、政治因素、親友協助、環境因素	阿根廷	全家遷移	婚姻考量、家庭因素、喜愛中華文化、就業考量、親友因素
#30	10/23	13	教育因素	紐西蘭	非全家遷移 (父親在台灣)	就業考量、家庭因素
#31	10/18	8	移民潮、拿身份	阿根廷	全家遷移	教育因素、學習中文、學習技術
#32	10/23	13	教育因素、環境因素、政治因素	紐西蘭	全家遷移	家庭因素
#33	12/26	14	家庭因素、教育因素、親友協助	紐西蘭	非全家遷移 (父親在台灣)	家庭因素
#34	7/19	12	家庭因素	阿根廷	全家遷移	教育因素、學習中文
#35	8/26	15	家族事業因素、依親、拿身份、教育因素	美國	全家遷移	家庭因素
#36			父母工作因素	阿根廷	全家遷移	家庭因素、就業考量
#37	12/35	23	父親想移居海外、兵役問題	阿根廷 加拿大	非全家遷移 (父親在台灣)	家庭因素、自我生涯規劃

從上表中可看出，促使年輕移民回流的因素，主要有三大類，家庭因素是最主要的回流原因，其次則是經濟與就業因素；教育因素與婚姻考量也是重要的回流原因之一：

- (一) 家庭因素：有 26 位受訪者認為自己是為了父母或家人而回流台灣，其中又可細分為三類，包含 (1) 為了與父母或家人團聚而回台，(2) 順從父母的要求或建議回台灣，以及 (3) 因家庭發生特殊變故而必須返回台灣。
- (二) 經濟與就業因素：有 15 位受訪者表示在自己回流的決定中，經濟與因素是主要的考慮之一，包含就業選擇及機會的多寡、平均薪資的差異，以及職場未來的發展空間等，另外，大環境突然的經濟變化也是促使他們回流的重要因素。
- (三) 婚姻因素：有 6 位受訪者覺得自己的回流與婚姻考量有關，因為已屆適婚年齡、父母希望他們能找一位同樣來自台灣的伴侶，或是由於配偶回台灣發展，而隨之回流。
- (四) 教育因素：有 7 位受訪者回台灣的目的之一是升學、學習中文或其他專業技術。
- (五) 其他因素：包含個人的生涯規畫，體驗不同的環境，累積工作經驗，宗教因素等。

由訪談內容可得知，對受訪者而言，回流考量通常是包含多項因素的，是經過仔細思考之後所做出理性抉擇，而非受到單一因素所影響，多數人會同時考慮家庭因素與就業因素，盡可能在能陪伴、照顧父母的情況下兼顧個人的未來發展性，包含繼續接受高等教育或選擇獲利較高、較有升遷機會的工作；例如受訪者#4 選擇回流台灣工作，一方面可陪伴父母，累

積相關工作經驗，也能體驗不同的生活環境；而婚姻因素，特別是尋找未來的人生伴侶，也是許多回流移民附帶的考量之一。不論是因何種考量而回流台灣，其回流原因通常與過往經歷及個人背景條件有關，以下各小節將試著就每一種回流因素做更進一步的分析：

一、家庭因素

影響 1.5 代年輕移民回流的最重要考量是家庭因素，家庭因素之所以成為年輕移民的首要回流考量，與當年在海外生活的家庭型態有極大的關聯性。以地點來看，遷居美國及阿根廷的 22 位受訪者中，有 21 位當年是全家一起遷移；回流自加拿大的受訪者多數屬於父親或母親往來於台加兩地的空中飛人，較少全家定居於加拿大的情形；遷居至澳洲或紐西蘭的 5 位受訪者中，有 3 位是全家遷移，2 位是隨母親居住當地；不同家庭型態的形成，除了受到大環境的影響，也與當時移出的目的有關：

- (一) 若移民的主要目的是讓子女獲得更好的教育，而非在移入地定居，父母可能並未結束或放棄在台灣的工作和事業，因而必須留下父母親雙方或是其中一方在台灣繼續工作，通常是父親安排假期前往移居地探望妻子和子女，而成為所謂的空中飛人。
- (二) 全家遷移之後，父母在移居地的職場發展上遭遇挫折的經驗，為了家庭生計，而選擇雙方或一方（通常是父親）回台灣工作，以因應家人在移居地的生活花費，也是典型的空中飛人家庭。
- (三) 若是因為台灣政治不穩定，害怕發生戰爭而移出，則傾向結束在台灣的事業或工作，全家移居海外。
- (四) 父母應聘至海外工作，或為了其他因素必須親身前往移入地，因而全家移出。
- (五) 若是移居至較遠的國家，由於往來旅費昂貴，且費時費力，多會選擇全家遷入移居地，而不會考慮往返式的空中飛人家庭型態。
- (六) 在移入地有親友，或是父母想要取得移入地的身份而與親友一起辦理移民手續，則可能全家一起移出，然而，在取得身份之後，可能由於工作、事業發展不順利、在當地缺乏親友陪伴，或是不習慣在移居地的生活，父母因而提早回流台灣。

而在本研究中，年輕移民在當年移出之時，雖沒有參與遷移決策的過程，但有半數（18 位）的受訪者明確指出父母之所以做出移民的決定，主要因素之一是為了能讓子女有更好的教育環境，而其中的 13 位年輕移民在海外生活時，曾與父母親雙方或其中一方分開居住；在

上述第一、二類家庭遷移型態中，當子女成長至能獨當一面，或是學業告一段落之後，母親往往便返回台灣與父親團聚：

當初我和媽媽、妹妹三個人一起去加拿大，爸爸在台灣，每三、四個月來看我們一次，後來我到美國唸大學...我媽不用再照顧我們，她就回台灣陪爸爸了。(#3，女性，回流自加拿大)

第三至六種情形是全家移出，但在移入地的生活不如預期，或是無法適應當地的生活，在衡量兩地的發展情況後，父母決定返回台灣，留子女在移入地生活，寒暑假再回台探望父母：

我們決定移民時，爸媽把台灣這邊的生意都結束掉了，房子也賣了，全家一起過去〔加拿大〕...後來發現這樣沒辦法過日子，經濟壓力太大，加拿大那邊的生意沒有那麼好做，於是我爸又回來〔台灣〕做生意，在〔台灣和加拿大〕兩邊來來去去，後來反正我也唸大學了，我媽就先回台灣了，她比較喜歡在台灣的生活〕。(#23，男性，回流自加拿大)

年紀較輕的子女可能托付給親友照顧，或是住在寄宿家庭：

我媽先陪我去溫哥華，我爸還在台灣，他們兩邊跑來跑去...我去了一陣子之後...我媽帶我去拜訪一些她的朋友，算是托她們照應我...後來我媽幫我找了一個homestay，〔讓我〕寄住在那邊，然後她就回台灣了，反正當時我都上高中了，沒過多久我就去美國唸大學了。(#5，女性，回流自加拿大)

受訪者#6 與上述年輕移民的情形相似：

剛開始是我媽陪我去〔溫哥華〕，我爸在台灣有工作，不能去...我媽有朋友在〔溫哥華〕那邊，朋友的小孩也在那邊讀書；後來，我媽回台灣，我就跟我媽朋友的小孩一起住，沒多久之後我就自己搬出來住...畢業的時候，父母都在台灣，認識的很多朋友也都回台灣了，所以我也想回台灣。(#6，女性，回流自加拿大)

正如受訪者#6 透露出想與家人團聚的想法，這些出身自空中飛人家庭的 1.5 代移民，由於父母在兩地奔波，年輕移民在成長過程中，與父母親之間的相處時間有限，因此希望能在兼顧自身發展的情形下，盡可能有多一點的時間和父母相處，而在學業完成後，決定跟隨著父母的腳步回台定居，如受訪者#19 的心態：

我從小就在國外，大部份時間都是自己一個人住，〔我爸媽陪我住一年多，就先

回台灣了〕，其實我跟爸媽他們不親...因為我們相處的時間不多，既然現在能在台灣找得到工作，就覺得還是回來台灣，多陪陪他們。(＃19，男性，回流自阿根廷)

同樣曾獨自居住海外的受訪者＃4，習慣了移居地的生活方式，也在當地找到穩定而喜歡的全職工作，當時對於是否要回流台灣猶豫了很久，但最後仍是為了陪伴父母，放棄了在移居地工作與生活，回台灣重新開始：

我之所以會回台灣，是因為我爸媽現在在台灣...我還在讀書時，他們就先回台灣了，畢竟他們住台灣比較習慣，而且親戚都在〔台灣〕這邊...其實我比較喜歡澳洲那邊的生活，我在那裡的工作也很好，可是我爸媽擔心我一個人，我姊姊之前就跟我爸媽一起回來了，是我堅持要留在那邊，後來覺得，他們年紀也大了，還是乖一點，回來陪陪他們。(＃4，女性，回流自紐西蘭)

由受訪者們的自述可知，因教育因素而移出的家庭，往往不會永久定居當地，而有極大的可能性會演變成空中飛人家庭型態，間接促成了 1.5 代移民的回流。另一種造成家人跨國居住情形的移出原因，是因台灣政治不穩定，擔心發生台海戰爭，而選擇出國避禍的家庭：

那時台灣的民進黨剛興起，〔台灣社會〕有很多抗議活動，我爸爸覺得當時台灣〔社會〕很亂，怕中共會趁機就打過來，所以要我媽媽帶我和我哥出國，我爸爸還是留在台灣工作，因為是以逃難心態出去的，我們帶了所有的財產出去，都不敢想以後會怎麼樣。至於為什麼會選阿根廷，主要是因為我哥是男生，有兵役年齡限制，所以得趕快離開，我們問過移民公司之後，發現阿根廷最快，而且不用那麼多錢，所以就決定去阿根廷了。(＃26，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受訪者＃26 的自述中，除了強調因政治與社會因素而移居海外，也提到了關於男孩子的兵役問題，囿於役男出國的法令限制¹⁴，而選擇移民門檻較低、能較快移入的國家。隨著時間過去，海峽兩岸的局勢逐漸穩定，戰爭發生的可能性降低，加以思念親友與故鄉的生活，一些父母開始考慮回台定居，子女則因教育或兵役法令限制而仍然留在海外：

我們是全家一起去〔阿根廷〕的，因為怕〔台海兩岸的〕戰爭打起來...去了一、兩年之後，我姊姊就去加拿大讀書了，我爸媽決定帶我弟一起回台灣，我弟還很

¹⁴ 根據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的規定(http://www.immigration.gov.tw/aspcode/index_ch_main.asp)，男性在年滿 15 歲之前出國申請不受限制，之後則需簽寫具結書，保證於年滿十八歲之翌年一月一日返國履行兵役義務，並於護照末頁蓋「尚未履行兵役義務」戳記，否則不予離境。

小，沒辦法自己照顧自己，反正看樣子台灣也不會有戰爭了，他們〔指父母〕住台灣比較習慣，而且在那邊〔指阿根廷〕的收入沒有我們家以前在台灣做生意來得好，所以我自己一個人留在〔阿根廷〕那邊唸完中學，然後就去美國〔唸大學〕了。(#19，男性，回流自阿根廷)

待子女完成學業之後，若移居地缺乏其他特殊因素，例如獲得滿意的工作、喜歡在移入地的生活而不願改變等，可能就會跟隨著父母的腳步回流台灣，如受訪者#3、#5、#6、#19、#19、#26，以及#30。

同樣是因家庭因素而回流，在上述兩種情形中，年輕移民仍然可依照自我的步調與時間表來決定回流的時間，但第三類受訪者的情形是因父母發生緊急變故，而不得不立刻返回台灣：

我們是因為我爸生病，所以很快就決定全家一起回來〔台灣〕，因為雖然我們會講西班牙文，可是畢竟在溝通上沒有中文方便，我們覺得回台灣〔父親〕會得到比較好的〔醫療〕照顧...後來我就留在這邊〔台灣〕唸研究所，就一直待下來了。(#15，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受訪者#16 是由於父親生病，全家人在匆忙的情況下返回台灣，留在台灣求學、就業。另一位出身自空中飛人家庭的受訪者#7 自承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會回流台灣，卻在接到父親急病的消息後，立刻回台，由於環境變化太大，加上完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使她一時之間無法調適，而經歷了一段辛苦的適應期，多年之後才能重新出發：

我很喜歡在〔加拿大〕那邊的生活，我以為我會一直住在〔加拿大〕那裡，所以很少注意台灣方面的消息，對台灣根本不熟，也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會回台灣，而且還是在這種情況下〔指父親生病〕...那時我剛申請上大學，覺得自己的未來才正要開始，突然有一天，聽到我爸爸〔在台灣〕病得很嚴重，只好放棄入學，趕回來台灣，之後兩年一直在醫院陪爸爸，但是爸爸沒有好起來，我也不可能再回去加拿大，那時覺得很茫然，不知道要怎麼辦才好，很不適應台灣這邊的生活，就整天把自己關在家裡。(#7，女性，回流自加拿大)

除了上述兩位受訪者處於無從選擇的情況中，對於年輕移民回台發展的決定，父母親的反應相當分歧，如受訪者#5 的父母，當年為了能給子女較好的成長環境與豐富的教育資源而移居海外，儘管後來父母回台定居，但仍希望受訪者#5 能留在美國或加拿大，認為對她未來

的發展會比較好：

我那時說要回來〔台灣〕，我爸是沒有跟我講什麼，但我媽就不贊成，她覺得我很沒用，好不容易想辦法讓我出國了，結果我還是要回台灣。(#5，女性，回流自加拿大)

受訪者#3 的遷移經歷與受訪者#5 相似，對於回流台灣的決定，受訪者#3 的父母既高興能一家團聚，也擔心回台灣會影響女兒將來的發展：

我爸媽喔，大概心情很複雜吧，他們一方面覺得我在那邊找工作比較好，留在那邊薪水比較高，福利也比較好...可是他們〔指父母〕一方面又很高興我要回台灣，因為這樣就能夠全家一起住，因為我爸之前一個人在台灣，很少有機會跟我們在一起。(#3，女性，回流自加拿大)

受訪者#2 在澳洲完成學業，工作數年後，決定要回台灣，父母對於她的決定既高興又擔心：

我爸媽之前就先回來台灣了，因為要照顧我的爺爺、奶奶，還有外公、外婆，他們〔指祖父母〕年紀都很大了...他們〔指父母與祖父母〕對於我要回台灣，大概也是很矛盾吧，一方面很高興可以住在一起，因為我們家從以前就是大家庭的型態，很重視家人團聚...可是他們〔指父母與祖父母〕也會擔心，認為讓我留在澳洲說不定會比較好，畢竟〔澳洲〕那裡環境好，福利也比較好，我也很喜歡〔澳洲〕那邊，可是，我最後還是想說先回台灣陪陪他們〔指父母與祖父母〕。(#2，女性，回流自澳洲)

同樣是因子女教育因素而移居加拿大的受訪者#23，有著不同的看法：

反正我本來就只是要去唸書的，辦身份是附帶的，唸完書，我要不要回台灣他們〔指父母〕都沒有意見，我以後也還是有可能離開台灣呀，可能是因為我是男孩子，所以他們比較不會限制我。(#23，男性，回流自加拿大)

相對於上述女性回流移民(#2、#3、#5)之父母的反應，在受訪者#23 的看法中，提到了父母對於子女再次遷移或回流的態度，可能因子女性別而有所不同，對於男生，表現出比較放任、不拘束的心態，受訪者#19 也是類似的情形：

我要去哪裡，我爸媽都沒有意見，他們都很支持，他們也在國外住過，不會覺得

國外的月亮比較圓，而且他們也沒什麼好擔心的，反正那麼多年來我都是自己一個人，我可以自己應付事情，再說，可能也是因為〔我〕是男生嘛，不像女孩子就是比較會受到家庭影響，他們對我比較放心。(＃19，男性，回流自阿根廷)

同樣是以因家庭因素而回流，上述情形是，年輕移民回流台灣往往是考量到父母親身在台灣，而決定回台定居，是基於自身的回流意願及自我的生涯規畫，即使父母對於其回流台灣的決定不一定抱持著贊成的態度，多數仍會尊重子女的決定，認為子女有為自身未來做主的權利；另一種情形是父母仍在移居地居住，但建議或要求子女回台發展，原因大致與求學和就業有關，認為回台後能得到更好的學歷與職場發展，或是希望子女能覓得同樣來自台灣的婚姻對象：

我住在阿根廷那麼多年，從來沒有回過台灣，原本我也想要留在阿根廷唸大學，可是我爸知道我有申請上台灣大學，就要我回來〔台灣〕唸台大，因為台大對我爸來說是個很好的學校，而且我們家的親戚都還在台灣，什麼外婆、叔叔伯伯之類的，我爸覺得我回來〔台灣〕有人可以照應，會比較放心，不是像一個人自己要到另一個新的國家去那樣子。(＃8，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來自台灣的父母，即使移居海外，仍非常注重子女的教育及成績，此點在海外華人移民研究的相關文獻上已相當常見，如 Tong (2003) 研究 1960 年代之後，以技術移民進入美國的華人家庭，不僅強調子女在學業上的表現，亦相當重視傳統文化的傳承，父母教養子女的方式、親子之間的互動情形，與當地主流族群或其他族裔相比，仍有相當大的差異性；如上述受訪者#8 的父親，認為女兒回台灣就讀大學，能得到台灣人心目中理想的學歷，因而強烈要求女兒回台求學，儘管受訪者當時並沒有回台的意願，但還是順從父母要求而回流台灣。另外，受訪者#8 也提到，因為自己是女孩子，回到台灣生活，有親戚能幫忙照應自己，不致於一人孤身在海外生活，父母親會比較安心，受訪者#33 的父母亦抱持著此種心態：

我喜歡紐西蘭的生活環境，可是我覺得〔紐西蘭〕那裡不太適合年輕人發展，所以我去了日本工作，本來想一直在〔日本〕那邊待下去，可是我爸媽一直希望我回台灣，他們覺得我一個女孩子在日本工作太危險，沒有半個認識的，萬一出事就糟糕了；在台灣有親戚，出了什麼事還有人可以幫忙照應，他們講很久了，我也不想一直讓他們擔心，就想說回來〔台灣〕試試看。(＃33，女性，回流自紐西蘭)

如同上述兩位受訪者所表述的情景，在本研究中，父母會擔心而要求 1.5 代移民回流的

情況，多半是發生在女性受訪者身上，與前述父母較不干涉男性受訪者的遷移動向之情形做對比，可發現，即使曾移居海外，許多移民父母仍是維持著較傳統的觀念，認為女孩子需要受到較多的照顧與保護，男孩子則應出外歷練，接受各種不同的挑戰。

另外，在傳統的觀念之中，接受高等教育基本上是為了能有一份好的工作，不僅可帶來經濟上穩定的收入，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對於未來尋找結婚對象也會有所幫助（Chiang, 2004），因此父母可能會希望為子女選擇「好的」學校與科系就讀，除了受訪者#8 因此而回台灣求學，受訪者#10 也是同樣的情形：

雖然我們〔全家〕住在美國，可是我爸媽還是很像台灣這邊的爸媽，很要求功課〔指成績〕，每一科都要拿 A...我對生物有興趣，想要唸醫學院，我爸媽很贊成，覺得這樣很好，因為台灣人都喜歡醫生〔這個職業〕...後來我有申請到台灣大學的醫學院，我爸媽很高興，他們聽到台大就覺得很高興，就叫我要回來唸〔台大醫學院〕...說實話，我回來〔台灣〕這邊超不習慣的，像我這種情形〔在美國長大〕的人，其實很少會回來〔台灣〕的。（#10，男性，回流自美國）

父母親之所以要求子女取得好成績、進入好學校，選讀「好的」科系，除了能為家庭帶來榮耀，也是認為能以此保障子女未來的前途；但所謂的「好的」科系，或說是「適合的」科系，會依子女性別而有所不同；如受訪者#14 希望將來能當建築師，但父母親認為女孩子不適合在工地工作，因而要求她回台灣就讀政治大學的企業管理學系：

我一直想要唸建築，我對建築很有興趣，可是我爸媽覺得女生不可以唸建築，會整天在工地弄得髒兮兮的，不適合...當時我已經在智利唸建築系的大一了，可是我爸一知道我有申請到了台灣的大學¹⁵，就要我回來台灣唸書，我很不想回來，可是還是得回來。（#14，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討論過數種不同的回流原因與經驗之後，發現儘管都是因家庭因素而回流，情況卻各有不同，有 17 位受訪者是依自我意願而回台灣與父母團聚；2 位受訪者則是在突然的情況下，回台照顧生病的父母親；6 位是在父母期望之下回流台灣；不論是哪一種情形，都顯示出，對於年輕移民而言，父母仍是最重要的拉力因素，其影響力不僅顯露在回流的決策過程，也反映在對於自我歸屬的表達中，並影響了未來的再遷移計畫。

¹⁵ 由於移居地的學制不同，移民不論是前往海外或是回流台灣就學，皆可能錯過開學時間而降級就讀。受訪者#14 是前往當地大學就讀數月後，才放棄當地的學籍，回流就讀台灣的大學。

二、經濟因素與就業考量

經濟因素，是移民回流決策背後最實際的考量之一，傳統的遷移理論或相關移民研究也認為經濟因素是影響人口跨國移動最主要的原因之一。除了學生與為了照顧年幼子女而暫時離開職場的女性回流移民之外，受訪者們目前所從事的行業中，有 9 位從事貿易或金融業，9 位為教師或從事教育相關工作，4 位從事醫療工作，6 位為設計工作者，3 位為工程師，2 位從事生物方面的相關研究工作，1 位正在進行藝術創作。

由於受訪者們的個人背景相當多元，所受的教育訓練、身處的職場範疇各自不同，加以回流自不同的國家，移居地的就業市場結構、經濟情況、平均薪資差異...等亦不相同，因而雖然同樣是因為經濟或就業因素而回流，每位年輕移民的考量仍有相當的差異性，主要可分成三種情況，包含評估就業機會的多寡、職場未來的發展性，以及整體大環境的變化。就業機會的多寡及未來的職場的發展性，需視移入地及台灣的熱門產業類別，以及受訪者本身的專業背景是否相符而定；職場未來的發展性，可能包含了較多的社會因素，例如移入地的社會是否具有排外的現象、年輕移民回流台灣之後，居住海外的經歷能否為其帶來優勢。移入地負面的經濟變化，可能迫使原本不具強烈遷移意願的年輕移民選擇離開當地，增加了回流的可能性。

(一) 得到更多的就業選擇性

年輕移民會依據自己的專長領域，比較移入地與台灣所能提供的就業機會多寡，再決定是否回流，在此種前提之下，產生了兩種結果，一是在認知上覺得在移入地可能無法找到令人滿意的工作，因而決定回台灣發展，如曾在加拿大與美國居住的受訪者#5 在回流前的想法：

我其實有想過留在〔美國或加拿大〕那邊工作，大學畢業的時候，我有去參加像是就業博覽會之類的活動，但是因為我唸的科系，我覺得在那裡不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所以決定先回台灣，再思考自己下一步要怎麼走。(#5，女性，回流自加拿大)

情況相似的受訪者#3 也有同樣的想法：

我畢業的時候，有試過在當地找工作，但在美國沒有找到比較適合的工作；回加拿大的話，我們住的那邊〔亞伯達省 (Alberta)〕科技業沒有很發達，而且我媽

回台灣了，妹妹也不在[加拿大]那邊，回加拿大沒有親人，所以也不會想說一定要留在加拿大；而且我是唸電機的，覺得回台灣應該會比較好，所以就回來了。(#3，女性，回流自加拿大)

另一種情形是知覺移居地的就業待遇不佳，而想回台灣另做嘗試，如同回流自阿根廷的移民，即使並非每一位年輕移民都有在阿根廷當地工作的經驗，但憑藉著從小對當地社會情形的了解，以及自己在就學時的打工經驗，阿根廷回流移民普遍表示，比起台灣，在阿根廷的工作選擇較受限制，平均薪資也較低，如受訪者#26 曾經對於自身在兩地的發展性做評估：

我那時有想過，如果我繼續留在阿根廷，就算唸到大學畢業，也很難到當地的大公司去工作，我可能一輩子都得在超市裡面算帳、操作收銀機，可是我不想這樣，所以才回來台灣的。(#26，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根據阿根廷回流移民的敘述，即使是移民的下一代，在當地仍多受僱於同族裔的僱主或自營小生意，由於在地的企業或公司，多傾向優先僱用當地人，移民想要在大企業、銀行或政府機構等所謂的好工作、好職位中被錄用或取得晉升的機會，較不容易，如受訪者#8 所述：

所謂的「好工作」，就是薪水高、地位高，又有保障，像是大公司、銀行、政府機關...之類的工作，可是在那邊要有「好工作」不容易...如果你沒有比別人更有用，那他們請自己人〔指阿根廷人〕就好了，為什麼要聘請你？(#8，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對於類似的職場經驗，回流自阿根廷的受訪者們並不認為這是一種歧視華人移民的現象，而認為此種情形的產生是人之常情，畢竟同族裔者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在各方面相處上，會比較有默契。「在別人的土地上生活，就要比別人更努力」，是阿根廷年輕回流移民們一致的態度，除了可看出年輕移民積極努力的韌性之外，也在某些層面上，反應了移入者無法完全融入當地、被視為外來者的心情：

他們〔指當地的大公司或政府機構〕在請人的時候，會先請當地人，如果不行，就請附近國家來的人，真的沒有人可以用了，才會請我們這種外來的人。(#11，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於是，評估過各地¹⁶的工作機會及未來可能的發展之後，年輕移民們選擇回到台灣；在

¹⁶ 部份受訪者曾考慮過到他國就業的可能性，如受訪者#28 是在阿根廷向多個位於不同國家的公司與機構投遞

台灣，就多數行業而言，上班族雖然工時長，工作量大，工作壓力也高，但台灣所提供之工作的選擇性較多，平均薪資也較阿根廷高，對年輕移民而言，仍然是相當有份量的回流誘因。

而關於回流的時機選擇，除了回台就讀大學的 7 位受訪者（#8、#10、#14、#15、#26、#31、#34）是在海外收到入學許可之後才回流，多數的受訪者是回到台灣之後才開始尋找工作，只有一位是在移入地向多個國家投履歷，最後決定選擇在台灣的工作：

當初我有投好幾份履歷到不同的國家，包括德國和阿根廷還有其他的，後來台灣這邊 offer 的工作我最喜歡，所以我就回來〔台灣〕了，薪水倒不是最主要的考量，我喜歡現在的工作環境和工作內容，如果沒有意外的話，應該會一直做下去吧。
(#28，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不論是回流自何地，年輕移民們普遍認為，自己在海外的經歷與專業訓練，包含語言、專業技能、較具國際觀、對外國文化的了解程度，以及與外籍人士相處的經驗，在台灣的職場競爭中會較佔優勢，因此不擔心回來台灣之後可能會面臨找不到工作的情形；且比起留在移居地，台灣能夠提供他們更好的就業機會及職場的發展性，如受訪者#8 的看法：

其實...我好像沒有想過回來台灣會不會找不到工作的問題...頂多就去當翻譯或是教語言吧...台灣會講西班牙文的人不多，聽說讀寫都很流利的人更少，台灣常常想要跟國外的公司做生意，要推銷自己，會辦一些展覽什麼的，其實很缺翻譯人員。(#8，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同樣回流自阿根廷的受訪者#13 也認為自己一定能勝任來自職場的挑戰：

我不會擔心回台灣找不到工作呀，只要標準不要放太高，不要自己沒什麼能力又要求高薪，其實都找得到工作啦，而且像我們比較會跟外國客戶溝通，國外出差什麼的也都行，不可能找不到工作的，像我現在的工作狀況就不錯，一年大概都會有三、四個月待在中南美洲，這一點是別人無法跟我比的。(#13，男性，回流自阿根廷)

受訪者#19 從美國回台灣發展，認為自己除了專業之外，附加的語言價值是自己的最大優勢：

回來台灣工作我覺得對我來說是比較有好處的，不會擔心找不到工作，雖然不能說現在的工作是有多好多好，可是薪水還不錯，重點是離家近，可以住家裡陪我

履歷，確定得到台灣的工作後，才動身回台。

爸媽...再說，我在這間公司生活過得很好，因為我的附帶價值高，我的英文比其他同事好，上司很倚重我，所以裁員也不會裁到我。(＃19，男性，回流自阿根廷)

綜合上述年輕移民的經驗可知，多數移民之所以回流，是因為直觀上台灣可供選擇的工作機會比留在移居地更多，雖然此想法是否屬實，必須考量各人的工作領域以及大環境的狀況，但所有的回流者在訪談進行時，確實都在台灣找到了穩定的工作；有些受訪者對於目前的工作相當滿意，沒有轉換跑道的打算，部份受訪者則是將現階段的工作當成是經驗學習與磨練，期待往後的晉升空間或是有其他的職業生涯規畫。

(二) 尋求不同的職場發展空間

部份受訪者表示，會回流台灣，並不是因為難以在當地獲得所需的工作機會，或是不滿意自己在移居地的工作狀況，而是希望回台後能有進一步的發展空間：

我會回來是因為剛好工作告一段落，我在〔加拿大〕那邊工作了好幾年，算是很有經驗的，可是我在我那個圈子大概已經不可能再往上了，差不多就是到了一個門檻了，因為我們家在台灣有投資，台灣這邊因此而提供我一個職缺，所以我就想說換個工作環境試試，順便回來了解一下台灣這邊的狀況，看看有沒有什麼發展機會。(＃25，男性，回流自加拿大)

回流自加拿大的受訪者#25 在海外職場的升遷遇到瓶頸，正如許都海外華人曾遭遇過的「玻璃天花板」情形，因而想回流台灣尋找其他的發展可能性；受訪者#13 也表示，自己在阿根廷的工作，雖然薪資與待遇尚可接受，卻缺乏可期待的遠景，也沒有升遷的可能，只能一直受僱於人，待在相同的崗位上，因此他希望回到台灣後，能夠多累積一些資金，習得相關的經驗，以獲得將來自創業的機會：

在〔阿根廷〕那邊是不擔心會找不到工作，薪水也還可以啦，只是如果想賺點錢自己開業當老闆就不太可能，而且我也不想一輩子就這樣〔重覆做一樣的工作〕...我是覺得台灣的環境要創業的話比較有可能，所以想趁現在還年輕，回來〔台灣〕試試看。(＃13，男性，回流自阿根廷)

來自紐西蘭與澳洲的受訪者們，尋求的不是像阿根廷回流移民般的職場發展目標，對於他們而言，希望能在不同的環境下工作，有不同的人生體驗，是相當重要的回流考量；以受訪者#12 的看法為例，紐西蘭社會鼓勵年輕人四處遊歷、體驗不同的人生經驗，年輕移民受

到身邊朋友的影響，也想試試不同的工作環境，台灣則是現階段最適合的地點，具有與紐西蘭不同的生活環境與職場文化，也不用辦理繁瑣的手續與簽證（因為本身已是台灣公民），也有親友在台灣可幫忙介紹、處理各項生活所需，回流台灣因而成為具有吸引力的選擇之一。

受訪者#4 雖然也希望能有體驗不同地方的生活，在金融業工作的她，卻有其他的目標，就是希望將來能進入跨國公司工作，若是能藉由回流台灣的機會，而擁有在東亞的，或是華人世界的職場歷練，加上之前在澳洲公司的西方社會工作經驗，相信對自己將來的職場發展必定有正面的助益。

另一位回流自加拿大，目前在商界服務的男性受訪者也有相似的打算：

如果你〔指研究者〕有在注意整個經濟局勢的變化，就會知道中國多有發展的潛力；加拿大那邊的生活環境雖然很好，但不適合做生意，真要做生意，還是要回東亞這邊來...我沒有在〔東亞〕這邊工作過，對很多不成文的文化或習慣都不了解，像我剛回來工作時，很多事就讓我很不習慣...我想要先在台灣工作一陣子，累積經驗，之後有機會的話，就要去中國，香港或新加坡也好。（#23，男性，回流自阿根廷）

（三）阿根廷經濟危機的影響

除了個人因素的考量之外，移入地的經濟情勢變化，亦會成為移民再次遷移或回流的決定性因素，特別是政治與經濟方面突來的困境。對於 1.5 代移民而言，移居海外多年，對台灣的了解程度有限，以阿根廷移民為例，阿根廷與台灣距離遙遠，旅行費用昂貴，受訪者們表示，居住海外的期間，多年難得回台探訪一次，有些移民甚至從來沒有回過台灣，在此情況之下，要做出回流的決定，難免猶豫不定。在本研究中，有不少來自阿根廷的回流移民表示，會下定決心離開阿根廷，主要是因為阿根廷在 2000 年底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危機，一時之間，經濟、政治、社會皆動盪不安，迫使他們不得不下定決心離開阿根廷。為了理解此次經濟危機對於回流移民的影響，必須先了解當時的情況。

1990 年代後期，阿根廷經濟發展惡化，GDP 增長率從 1997 年的 8.1% 衰退至 1998 年的 3.8%，之後直接進入數年的負成長，1999 年失業率迅速攀升至 18%；在此同時，阿根廷國內的許多資金逐漸被移轉至海外，面對各項支出與投資建設等所需的資金，阿根廷政府試圖以外債來彌補，不穩定的政治局勢不利於經濟發展，加以惡名昭彰的官僚作風使政府效能不彰，

阿根廷陷入嚴重的債務惡性循環中，移出或滯留海外不歸的人數也逐漸增加(江時學，2002)。

巴西是阿根廷的主要貿易國之一，繼巴西於 1999 年陷入金融風暴後，2000 年 12 月，阿根廷政府無力再負擔沉重的外債，宣佈放棄比索(阿根廷法定貨幣)與美元掛勾的金融政策，使得比索瞬間貶值 30%，為防銀行擠兌及資金外流，政府下令凍結民眾帳戶，禁止提領存款，多項美元存款甚至被凍結至 2013 年。由於阿根廷社會使用塑膠貨幣的風氣並不普遍，人民的日常生活相當仰賴現金，此一措施使得許多人民生活頓時陷入困境，部份地區出現民眾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活動，甚至因產生暴動而全國戒嚴 30 日。當時的阿根廷，不論在經濟面、政治面或社會面皆動盪不安；民眾對政客、制度及國家本身缺乏信心，大規模的移出潮於是出現，移出者多為年輕人及專業人士，正是國家發展所仰賴的主要人力資源，對阿根廷未來的經濟復甦與國家發展帶來負面的影響(大紀元新聞，2002/01/14)。

此次金融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各項凍結政策與示威抗議事件，使部份的 1.5 代移民下定決心回流台灣，他們不看好阿根廷未來的發展，即使必須放棄在當地的工作，還是決定離開；外在大環境的變化對於個人遷移決策的影響可從受訪者#11 的言談中窺見：

你〔指研究者〕在台灣一定很難體會，所有的銀行存款都被凍結了，到處都在示威抗議，能走的人都走了，我們〔指阿根廷的台灣移民〕都覺得很害怕，也很擔心自己辛苦賺來的積蓄就這樣沒了，所以一有機會就趕快先離開了，以後大概也不會再回去〔阿根廷〕了吧，那邊現在的經濟真的不好。(#11，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受訪者#19 曾在美國經歷了網路泡沫化的時期；當時美國不僅結束了十年來經濟高速成長的榮景，還陷入股市崩盤、經濟嚴重衰退和通貨膨脹的困境中，許多廠商與公司倒閉，四處掀起一陣裁員風(自由時報，2008/07/21)，受訪者#19 本身服務的電腦工作室也受到影響，因而回流台灣，也是年輕移民受移居地之經濟環境變化之影響，進而回流的相似案例：

我是學電腦的，在美國唸書的那一段時間，電腦方面的工作很熱門，像我還在唸書的時候，就有在一個學長開的工作室工作，接案子，做完再繳回去。原本想說畢業以後就留在〔美國〕那邊工作，沒想到遇上網路泡沫化，整個美國都很不景氣，到處都在裁員，學長的工作室也倒了，我在那邊多留了半年，也沒有找到比較好的出路，想說就先回台灣了。(#19，男性，回流自阿根廷)

當年輕移民無法確定回流之後能否有更好的發展性，難免會猶豫是否真的要離開移居

地，回到原鄉重頭開始，尤其是在習慣了移居地的生活，又對原鄉情形不夠了解的情況下；此時，大環境的重大變化，特別是經濟與政治的負面事件，會成為民眾離開現居地的最大推力；前述關於其他受訪者的回流考量，多半是由於來自台灣方面的拉力因素，如家庭因素、就業選擇性、未來升遷的空間...等；而阿根廷移民回流的情形，相較之下，較偏向來自移居地方面的推力，使得移民回歸原鄉。

三、婚姻考量

除了家人與就業考量，對於年輕移民而言，尋找未來的婚姻伴侶也是回流決策常見的因素之一；由於居住在海外，有過與不同族裔人士相處、來往的經驗，部份年輕移民發現自己會希望能找一位具有相同族裔背景的婚姻伴侶：

我那時有想過，我究竟要嫁一個阿根廷人還是台灣人，我也曾經嘗試過與阿根廷當地的男孩子交往，後來我覺得阿根廷人太風流了，我沒有辦法接受，他們〔指阿根廷的當地人〕在男女交往、感情、婚姻方面的觀念跟我們〔指華人移民〕比較不一樣，而且我爸媽也蠻傳統的，會希望我們〔指子女〕還是可以回歸，嫁給華人會比較好；所以我就想回台灣看看，說不定有比較多機會認識其他人，就是交往的圈子會有比較多選擇。(＃29，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回流自阿根廷的受訪者＃29，認為自己的擇偶條件是基於文化上的考量，不希望彼此的思考、觀念差異太大，而曾在美國與阿根廷居住過的受訪者＃19，則更進一步釐清自己對於未來伴侶的要求，除了希望來自同樣的族裔，更重要的是內在仍要保有近似台灣人的內涵，而非僅止於擁有相同的外表與膚色：

我還是會希望未來的女朋友是台灣人，所謂的台灣人不是光指長得像我們這種外表就可以了，內心也要像才行，像很多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他們會覺得自己是美國人，雖然長得像台灣人，他們的父母也是台灣人，可是他們在美國出生，他們內在是像美國人，這一種的就不是我說的〔理想對象〕；我覺得所謂的台灣人，還是要有一點像台灣人〔思考與作風〕的 style 才行。(＃19，男性，回流自阿根廷)

從上述兩位受訪者的說法當中可注意到，1.5 代回流移民在婚姻伴侶的選擇上，仍是偏向

與台灣人或台灣移民來往，而非與移居地的主流社會通婚；一方面是年輕移民本身認為彼此觀念、作風、習慣上會比較接近，可相處融洽；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父母的期待，希望子女不要嫁/娶「外國人」或「當地人」；以阿根廷回流移民為例，受訪者們認為阿根廷當地人對於工作、儲蓄、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態度，皆與台灣移民大不相同；相較而言，台灣移民對於婚姻的看法較為傳統保守，且有儲蓄的習慣，阿根廷人對婚姻的態度較為開放，儲蓄意願的偏低，但「超前消費」的意願卻「偏高」（江時學，2002），因此移民父母往往傾向不贊成女兒嫁給當地人：

我爸媽很不希望我嫁給阿根廷人...畢竟他們的觀念和我們比較不一樣，像我有些當地的同學，他們會把房子拿去抵押，然後拿這筆錢去旅行，他們的生活過得很愜意，不會煩惱沒錢的事，他們也比較沒有存錢的觀念，我爸媽就覺得這樣很恐怖，如果結婚的話，生活會沒有保障；而且，他們當地人的婚姻關係比較複雜，常常是「你的小孩和我的小孩聯合起來打我們的小孩」，所以我爸還是希望我回來〔台灣〕找個台灣人結婚。(＃8，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而父母對於子女婚姻對象的要求，並不是阿根廷回流移民特有的情形，在本研究中，另一位自加拿大回流之受訪者＃3的母親也有同樣的看法：

我媽是希望我不要嫁給外國人，因為我姑姑就是跟外國人結婚，她有時會跟我媽說，嫁給外國人，很多事難免會有代溝，就是他們〔指外籍的丈夫〕會不能理解，所以我媽就覺得我們〔指子女〕還是跟台灣人結婚比較好。(＃3，女性，回流自加拿大)

同樣是在「談得來」的前提下，對於刻意選擇某種類型的交往對象，部份年輕移民有著不同的看法，認為會與台灣人或台灣移民來往，並不是自己或父母要設定交往對象的背景，而是自身在海外成長的經歷，自然產生的選擇機制：

結婚對象的話，我是沒有說一定要設什麼樣的條件，我爸媽也沒有跟我提過，不過基本上，我之前的女朋友經歷都和我很像〔指曾有在海外生活的經驗〕，畢竟還是要能溝通吧，經歷相似會比較談得來；因為我自己有這樣的背景，自然而然，身邊的朋友都是和我差不多的，所以後來能夠在一起，又合得來的都是類似情況〔指由海外回流〕的女生，不是我一定要要求什麼樣的對象，而是自然而然就會形成這樣的結果。(＃19，男性，回流自阿根廷)

受訪者#10也有同樣的看法：

我未來的對象倒沒有想過說，一定是要曾經在國外居住過的，在台灣長大的女生也很不錯呀，當然，英文要好...只不過，如果是有同樣經歷的，當然會比較加分呀，這是很自然的。(#10，男性，回流自美國)

為了能夠尋找到適合的未來伴侶，在許多年輕移民的多重回流考量中，多數受訪者除了希望能找到同族裔、觀念相近，或是成長背景相似的交往對象之外，也希望對方能夠有較為國際化的眼界，能接受不同的文化：

未來的伴侶的話，我想，緣份到了就好，也不是說一定要怎麼樣的吧，像我現在的男朋友也沒有移民過呀...不過，至少不能害怕出國吧，或者說，不能有抗拒出國的心態，要有國際觀、有彈性一點才行，兩個人在觀念上和心態上不能差異太大，這樣才能長久走下去。(#11，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之所以會對於未來的伴侶有如此的盼望，除了希望對方能了解自己，彼此溝通無礙之外，受訪者#13提出了在生活上相當實際的一點：

我現在的工作在〔台灣和拉丁美洲〕兩邊來來去去，將來有一天，我可能還是會回阿根廷住，這種可能性不能說完全沒有，所以，雖然說我希望能在台灣找到未來的對象，但是如果她沒有在海外居住的經驗，這樣子如果有一天，我們真的要再次〔遷移〕出去，她的日子會過得很辛苦。(#13，男性，回流自阿根廷)

在訪談進行時，已婚的受訪者們，全部都是與同族裔的對象結婚，有二位的婚姻伴侶是在海外認識，且同樣是來自台灣的移民，其他則是在回台之後，才相識並結婚；另外，單身的受訪者中，多數的交往對象是在台灣出生、成長的台灣人，或是同樣自海外回流的台灣年輕移民，並沒有與外籍人士或非同族裔人士結婚的情形。

四、其他因素

除了家庭、經濟、就業，以及婚姻因素之外，其他回流的因素則包括回台接受高等教育、天氣因素、宗教因素，以及想要為台灣這塊土地貢獻個人的心力...等。

有 8 位受訪者回台之後，仍繼續進修，就讀大學和研究所，其中的 5 位，是在海外申請

到大學入學許可後，才回台就學，有 2 位則是在海外取得學士學位，回到台灣後，覺得仍需要持續進修，因而報考台灣的研究所；另外 2 位受訪者在回台工作一段時間後，以遠距教學或在台授課的方式，攻讀加拿大與紐西蘭的碩士學位。一位受訪者（#1）是因為身體狀況無法承受加拿大冬天寒冷的氣候，加以目前從事的工作具有時間自主性，因而週期性往返於台灣與加拿大之間。受訪者#24、#25 是抱著希望能回饋與貢獻自身力量的心情自美國與加拿大返回台灣；受訪者#24 表示，自己以前居住在台灣時，很崇洋，一直希望能到美國居住，真的移居當地之後，才逐漸發現自己還是比較喜歡台灣的社會，覺得美國社會過度強調物質文化；由於自身信仰的宗教，在台灣設有基金會，長期推行心靈福智推廣活動，自己於是決定回到台灣，在基金會底下擔任義工，希望能為故鄉貢獻自己的力量。



第二節 1.5 代回流移民的再適應

本研究的 37 位受訪者中，有 26 位居住海外超過 10 年以上時間，3 位長達 20 年以上，且有 8 位年輕移民居住於海外的時間多於在台灣居住時間。在這不算短的時間裡，1.5 代移民們在與台灣不同的社會文化中成長、受教育，試著習慣當地的生活環境、融入當地的社會，逐步建立自我的人際網絡；在此同時，無論是硬體建設或是社會文化，台灣的情況也正在改變，當年輕移民再次回台定居時，往往會發現台灣的情形與記憶中的已有所差異，於是，在回台定居的初期，年輕移民必然需要經歷一段再次適應的過程，受衝擊的程度以及適應生活所需的時間則因人而異。

從自身所認知的適應時間來看，有受訪者認為自己對台灣的生活方式非常熟悉，回台後三個月內就能如魚得水，但也有受訪者認為，需要花兩年以上的時間，克服生理上的不適應，經歷許多令人挫折的經驗，才慢慢習慣在台灣的生活，且在自然環境、生活環境、人際相處，以及職場文化...等各方面的適應面向上，適應與接受程度是不盡相同的；而這一切的影響因素，除了與個人條件及回流後的遭遇有關，也應從當年在海外的經歷加以分析，因此，本文首先描述移民回流後在各方面的適應情形，再進一步分析相關的影響因素。

一、回流後的適應情形

透過年輕移民的經驗整理，可從中了解 1.5 代回流者在台灣生活初期所感受到關於環境與文化上的衝擊；由於多數受訪者回台時正面臨進入職場的人生階段，除了自然與生活環境、社會上人際互動的適應，工作及職場上所可能面臨的各種狀況，也是移民回流後所需面對與調適的重要一環，以下將分別說明。

(一) 自然環境上的衝擊

自然環境是人為無法改變的，卻是回流移民在心態上較能夠接受的一環。本研究的受訪者們回流自美國、加拿大、紐西蘭、澳洲以及阿根廷，與台灣的天氣相比，移居國的緯度較高，氣候涼爽，也較為乾燥，因而移民回流後最初深刻感受到的即是氣候的不同。台灣是（副）熱帶海島型國家，天氣較為潮濕、悶熱，不少移民在回流的第一年可能會產生生理的不適應情形，例如過敏、氣喘、頭痛...等症狀，而需求助於醫生，但並不會因此對生活上造成長期

性的困擾。

台灣每年必然會遇到颱風、地震等天然災害，長年在台灣生活的民眾對此並不陌生，但對於年紀較幼小，特別是小學低年級前即移出海外的 1.5 代移民，在回台後遇到颱風和地震初次經驗時，可能感到震驚與害怕，是印象相當深刻的體驗：

那時我是自己一個人回台灣，回來的第一天，剛好就遇到颱風，風很大，招牌和樹木都一直搖，阿根廷那邊從來沒有颱風，我那時覺得嚇死了，回來的第一天就很想回去〔阿根廷〕，那時〔指回流初期〕一直都很想回去。(#8，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由於台灣對於颱風這類天然災害有相當豐富的應變經驗，各種防災宣導工作進行良好，年輕移民經歷初次的風災體驗後，發現不致於對個人安全造成威脅，便能以較輕鬆的心情面對。此外，因應台灣悶熱又潮濕的天氣，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選擇從事有空調的室內工作；部份受訪者表示，在回台初期，會盡量不在白日出門活動，或是減少假日到戶外活動的次數；少數受訪者表示曾因生理上的不適應而求助於醫生，此種情形在回台一年後就能顯著獲得改善，也有受訪者(#1) 在生活、家人、工作...等各方面條件皆可配合的情況下選擇往返兩地，冬天居住在台灣，夏天住在加拿大，以避開台灣的溽暑與加拿大的寒冬。

(二) 生活環境上的問題

除了天氣之外，另一個需要處理的適應問題是生活空間狹小所帶來的侷限性與壓迫感。台灣地狹人稠，若身處都會區之中，不論是個人的居住地方或工作場合的空間設計，即使是走在街道上，放眼所見多是高樓林立的景象，對於習慣寬敞空間的回流移民而言，容易造成壓力，且不易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得以放鬆的地方。除了曾在香港與日本居住過的受訪者以外，其餘的年輕移民對於剛回到台灣時，空間狹小以及連帶產生的情形，像是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過於接近，或是無法擁有足夠的私人空間...等，會覺得非常不習慣，例如，走在路上，總是必須隨著擁擠的人潮移動；在等大眾運輸工具或電梯時，排隊者或搭乘者彼此的距離非常接近，甚至爭先恐後；辦公室裡，同事之間比鄰而坐，稍有較大的動作或音量就可能彼此干擾，而產生受拘束的感覺；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非常接近，對於旁人的動作一目了然，也讓部份受訪者覺得缺乏隱私而困擾。

除了空間問題，交通狀況也相當令人困擾，整體路面設施的規劃設計使回流者感受到對行人的不夠尊重。台灣的交通流量大，車輛與車輛、車輛與行人之間的距離過於接近，等待

紅燈的車輛並未依規定停留在停止線後方，或是闖紅燈、紅燈右轉...等違規情形，讓部份移民在回流初期覺得相當危險。此外，路面的空間使用規劃並未留給行人較寬闊的使用空間，有些地方未規畫人行道，或是人行道與騎樓被路邊停放的機車、商家置放的物品或攤販所佔據，使得行人必須和車輛並肩而行，或是與車爭道；儘管行人與車輛駕駛都會留心，不致於經常釀成交通事故，但回流移民長期在海外生活，習於人車分道，保持安全距離，以及禮讓行人優先的觀念，回流後，面對人車之間過於貼近的距離，讓他們覺得相當危險而一時難以接受。

(三) 人際互動上的磨合

語言的使用是文化表現的形式之一，也是能否與他人擁有良好互動的重要工具；語言的使用能力，不僅在於口語述說的表面內容，能否適當傳遞並感受話語背後的意涵，也是與他人溝通的重要關鍵；當個體所成長的文化背景不同，塑造出不同的思考方式、處事態度與方法，即使能使用相同的語言、擁有同樣的族裔背景，回流者在與他人的互動中，誤會與衝突往往難以避免（Saxenian, 2007）。

對受訪者而言，回流行為代表著將要生活在另一個不同文化脈絡的社會之中，雖然理解移入地與台灣社會環境必定有所不同，但感受的深刻程度，必然是在回流之後，從人際的接觸中，才逐漸體會；不論是看事情的角度、口語表達的方式、談論的話題，或是表現關心的形式，皆相當不同。比起天然環境與生活空間方面的適應，受訪者們在無形的人際互動方面與文化資本不足的情形，顯然有更多的困擾，也並非短時間能夠輕易改善。

年輕移民在回流初期與他人互動時，最大的障礙往往來自外在面貌與語言表達形象的不相符，而造成了負面的互動經驗，如受訪者#7 自述當年回台生活時，自認中文能力不錯，卻因為說話有腔調，而經常被嘲笑或被諷刺，而在心理產生陰影，有一段時間常把自己關在家中，不願意出門與他人互動，也不想和別人說話，怕因此再受傷害。受訪者#6 的經驗則是在向攤商購物時，因為無法清楚以中文表達自己的意思，而被賣東西的長者責備：「台灣孩子，為什麼不會講台灣話！」。受訪者#14 在海外居住了 14 年，期間僅回台探親一至二次，19 歲時獨自回台求學，需要向各機構辦理一些手續與證件，因為中文的口語程度不流利，且不懂得如何表達一些專有名詞，因而常常與負責的職員產生衝突：

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我記得那個時候要去〔郵局或銀行〕開戶，可是我不知道那個詞〔指辦理個人的銀行戶頭〕要怎麼講，又解釋得不好，不太會解釋，因為

那時候我的中文不好，結果講了很久，那個人就很生氣，對我的態度很差，他以為我是故意鬧他的，我那時也覺得很生氣，覺得我又沒有做錯事，為什麼他們〔指負責的職員〕對我那麼兇，這樣很沒禮貌。(＃14，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由上述 3 位受訪者的經驗可知，此類因口語表達能力不足而產生的負面經驗其實相當常見。對回流者而言，無法在日常生活中流利地使用中文，可能成為與他人良性互動的障礙之一；若是為了能完整表達自我的意見，使用了中文以外的語言，則有可能被解讀為炫耀的表現，而被他人排斥；這一類的情形，在大城市以外的地區較為常見。此種情形的產生，除了代表一般大眾缺乏對回流移民的認知與理解，也可能是旁人嫉妒心理的展現；另一方面，也部份突顯了台灣整體社會仍不夠國際化，缺乏對於多元文化的包容性。

年輕移民面對因語言使用而引發的衝突，有些人會據理力爭，但更多的人會選擇默默接受；所幸，衝突事件的發生，隨著在台居住時間的增加，以及中文口語能力的進步，會逐漸減少，但仍難以避免讓年輕回流移民留下不好的回憶。除了語言表達能力之外，口語表達習慣的不同，也會造成了回流者與他人之間的隔閡或是誤解。與西方社會相比，為了顧及對方的面子，以及表現出客氣和禮貌，台灣人的表達方式比較婉轉，習於以較為迂迴的說法來表達自我的意見、感受，以及對於事物的看法，言談中常有言外之意，年輕回流移民往往不習慣此種說話方式，或是無法正確理解對方想表達的意涵，而造成雙方的溝通不良；另一方面，年輕移民受移居地文化影響，慣於較直接的說話方式也有可能在無意中傷害或得罪別人，為自己樹立了不必要的敵人或惹來不必要的困擾。

在話題的取材上，回流移民對於關心、禮貌與個人隱私的認知也與台灣主流社會有所差異，當他人認為回流移民說話不得體、不懂禮貌時，年輕移民則認為他人說話的方式與內容不尊重別人的感受及隱私，是不同於台灣文化的「不禮貌的表現」。在台灣，人與人相遇時，除了招呼與寒暄，總不免會閒聊或多問幾句與私人相關的事，例如就讀的學校、職業現況、薪資高低、婚姻狀況...等，都是常見的話題取材，並習於加上私人的評斷與勸告；年輕移民們並不習慣這一類的談話模式與內容，認為這些問題偏向個人的隱私，不適合拿來做為閒聊的話題。

不同的文化觀念塑造了不同的表現與互動方式，即使初期可能造成溝通上的障礙，但只要保持誠懇與接納的心態，從一次次與他人互動的經驗中，回流者會逐漸了解什麼樣的表現是台灣社會較能接受的，並在保有自我概念的前提下，逐漸調整自己的言談與行為舉止，展現融合兩地文化的風貌；而周遭的鄰居、同事、朋友...等人，也會慢慢了解與接受回流移民

們的作風，減少誤會與衝突的產生。

(四) 職場文化的調適

工作因素是移民回流的重要原因之一，認為回流後在台灣能夠擁有較多的工作選擇、較高的薪資，或是升遷、發展機會。多數年輕移民回到台灣後，並未面臨找不到工作的困境，但在真正進入職場後，往往在人際交往上遇到考驗，並非由於個人的專業能力高低，是因為缺乏共同經驗與觀念思考，而造成互動不良的情形。如何適應不同的工作文化及職場的競爭壓力，成了移民回流後的重要課題之一。

由訪談內容中得知，多數受訪者是回流台灣之後才開始尋找工作，只有一位（#28）是在阿根廷向位於不同國家的公司與機構投遞履歷，直到確定接受台灣方面所提供的工作後，才動身回台；其他受訪者在台灣的求職過程與一般年輕人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是透過 104 人力銀行…等求職網站，或是自行投遞履歷、透過親友介紹，面試，進而取得工作。多數人認為自己在海外的學經歷，以及能流利使用英語、西班牙語、德語、日語…等外語的能力，在順利找到工作方面是有幫助的。

儘管順利找到了工作，海外生活的學經歷以及語言的優勢只是取得在台職場生涯的入場卷，接下來才是真正進入了在工作與就業上的適應過程。綜合受訪者們認為海外與台灣職場文化的不同，可主要歸納為以下幾種情形：

1. 步調快速且強調效率

台灣社會的腳步較快，競爭激烈，在職場上強調努力奉獻與處理工作的效率，工作量與工作壓力較大，如同受訪者#3 所述：

台灣人的步調比較快，剛開始回到台灣，會覺得比較緊張。（#3，女性，回流自加拿大）

來自阿根廷的受訪者#21 也提到了類似的情形：

在台灣，上班就是一直趕，在阿根廷就比較悠閒，像以前我們工作到了下午，時間到就會每個人端一杯茶，做下來聊聊天休息一下，可是在台灣，如果這樣做，氣氛就會很尷尬，好像我們〔指阿根廷回流移民〕在偷懶一樣。（#21，男性，回流自阿根廷）

受訪者#7 則提出另一種對於台灣職場文化的看法，認為緊湊的工作步調是提升競爭力與壓低成本的方式，有利於整體素質的提升：

在國外，分工比較細，每個人只負責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行了，回到了台灣，一個人常要當兩個人用，要做很多事，要十八般武藝都會才行，這樣很累，但不見得不好，這樣每個人都會被訓練得比較厲害。(#7，女性，回流自加拿大)

受訪者#8 則認為，此種職場文化，雖然可提升整體的競爭力與工作效率，卻容易因為工作壓力，而造成個人心理上的過度負擔：

台灣社會對於容忍犯錯的包容性，和阿根廷比起來，比較低，雖然這種風氣可以促使大家認真努力，戰戰兢兢完成自己份內的事，但對個人而言，有時可能會背負太大的壓力，所以台灣才會有很多人有心理上的病症。(#8，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整體而言，是否需調整自己的工作步調，可能與受訪者在海外居留的國家有關，回流自阿根廷的受訪者，多認為台灣人的腳步較快，辦公室氣氛緊張；來自紐西蘭、澳洲與加拿大的年輕移民也有類似的看法，但程度則視受訪者的個人經歷而不同；曾在美國、德國、香港、日本等地居住過的受訪者們對於台灣生活步調的接受度較高，認為與在海外的生活差異不大。

2. 加班文化盛行

對回流移民而言，許多台灣人熱愛工作，辦事效率高，但生活步調快且工作壓力大，與海外的職場生活、工作觀念有所差異。在美、加、澳、紐、與阿根廷，普遍觀念認為工作與生活應該是分開的，準時上下班，享受私人的生活與休閒時間是可被接受的情況；即使是在上班時間，適度的休息仍是被接受的，以阿根廷回流移民的經驗為例，在阿根廷工作時，由於拉丁民族的風俗習慣，即使是上班時間，到了下午，往往會暫時停下工作，三、五位同事聚在一起，喝下午茶，彼此交流；但在台灣，並沒有類似的職場慣例，喝下午茶的習慣可能會被視為工作不努力的行為。

除了不應在上班時間從事非工作上的活動之外，近年來，加班在台灣成了職場的次文化。在台灣，多數人的生活即等於工作，因為工作量大，且工作責任制盛行，員工常需要付出額外的時間來完成工作，讓部份的回流移民很不習慣，猶豫著要準時下班，以擁有較多自我的

時間，或是入境隨俗，與同事們一起加班：

澳洲人很注重生活品質，會強調要把工作和生活分開，但台灣人好像覺得加班是理所當然的事，如果拒絕加班好像自己在辦公室的立場會變的很奇怪，大家都會覺得你很奇怪，好像你這個人很不合群還是工作不努力一樣，所以我也跟著加班，因為不加班好像不太好。(#3，女性，回流自加拿大)

受訪者#4 有不同的看法，認為需要加班是表示個人的時間管理須再加強，而非努力工作的表現：

我們在國外，主管會要求你要自己調配工作的時間，他們不希望員工加班，如果加班，表示你自己管理時間的能力不好，沒辦法好好分配自己的時間和工作，在工作的時間內把該做的事做完才是應該有的態度；但是在台灣，好像是在辦公室待越晚的人越努力，有些主管也會用這種方式來看員工努不努力，我覺得這樣不太對。(#4，女性，回流自紐西蘭)

受訪者#16 認為加班文化有時反而降低了工作效率：

大家好像都很習慣要加班，主管沒走，誰也不敢先離開，好像先走的人就是比較不努力的感覺，可是我就不懂，明明上班時間努力就可以完成的事，為什麼要一直拖到下班...明明沒事了，還要裝忙，又不能先下班，有時真的覺得很痛苦。(#16，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面對此種辦公室的次文化，回流者選擇了不同的處理方式；有些人堅持自己的作法，希望能保有私人的時間，因而選擇不接受加班，或是轉換工作地點，但也有受訪者認為加班是可以接受的，應入境隨俗；受訪者#23 認為自己並不會永遠留在現在的公司工作，目前的工作對自己算是另一種學習與歷練，因此願意接受超時工作；受訪者#21 則認為，與以往在阿根廷的工作相比，雖然在台灣的工作時間較長、工作量較大，但收入相對也較高，因而可以接受加班的要求。整體而言，回流移民認為抱持著對工作負責的態度是應該的，盡力完成工作是最重要的事，只是認為對於何謂認真工作，應該以工作的成果來做為評判標準，而不是停留在辦公室裡的時間長短。

3. 重視階級、頭銜與人脈關係

許多曾在海外就職於在地公司的回流者，回流後從與同事相處的經驗中，深刻感受到辦

公室「關係」的重要性，包含了上司與下屬之間的互動，以及同事之間的相處，即橫向的人際網絡。

在西方國家，公司同事雖有職位高低之分，但更重視的是團隊合作，因此職員面對主管或上司，直呼其名，或像朋友一樣的談話方式，是常見的情況，遇到交辦的事項，通常會以討論的方式來決定作法，但在台灣，特別是本土的公司，事情的處理是依照程序與層級進行，由上往下的交代方式，階級分明而不容質疑，如受訪者#4比較自己在台灣與澳洲兩地的職場經驗：

在澳洲，我們會直接叫主管的名字，他也會和我們開玩笑，不像在台灣的主管，會比較嚴肅，比較有架子，要別人尊敬他，聽他的話，比較不能商量或討論...在這邊(台灣)，老闆說的都是對的，公司規定什麼，你就是要遵守。(#4，女性，回流自紐西蘭)

由於強調階級差異，一些台灣社會習以為常的行為表現，例如以職位稱呼上司、讓主管走在前方，成了不成文的規範，也暗示了台灣人對於外在頭銜與關係的重視，受訪者#16 的感想：

在台灣，大家會很在意你從哪個學校畢業，或是你的頭銜是什麼，並因此決定對你的態度，他們對你好，是尊敬你的職位，不一定是因為喜歡你這個人。(#16，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受訪者#14 也有類似看法：

在台灣，一些做較低階級工作的人，像是倒垃圾、打掃之類的，在社會上的地位會比較低，大家對他的態度也可能比較不好...大家對你的態度，常常是看你的身份地位或是職位，而不是看你的能力或是你這個人。(#14，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由於成長背景不同，回流移民並不一定理解此類約定成俗的互動技巧，因而回流初期可能在無意中帶給同事或主管驕傲、不懂禮貌...等負面的印象。

除了與上司的互動，在工作場合能否維持與同事之間的友好關係非常重要；年輕移民與在地的同事彼此缺乏共同背景與經驗，不論是在表達意見、思考模式，或是做事方法上都可能南轅北轍；若是溝通不良，可能造成同事之間的嫌隙，長久下來，不僅無法營造良好的人際關係，更可能橫生不必要的枝節：

我以前在公司常常被人欺負，我覺得我這樣做並沒有錯，但是他們[指其他同事]都會覺得我不對，他們又不肯當面跟我說，我就覺得他們都會故意講話繞好幾個圈諷刺我，或是在背後說我壞話，有時候真的很生氣我就會跟他們吵起來。(#14，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年輕移民認為，台灣職場非常講究人際關係，做事情常常要考慮人情，很多事情的處理需要用到所謂的人脈，亦即強調個人的人際網絡，運用得當，不僅事情處理會比較順利，對於升遷也會有幫助，回流移民長期定居海外，在台灣缺乏成長過程長期積累下來的人際網絡，對他們而言，是職場發展上最不利的地方，如受訪者#17在醫院任職，認為自己曾在海外求學與就業，外語能力強，不論是臨床經驗和歷練都比國內醫師豐富，然而自己沒有國內大學的背景，缺少了同學或學長姊、學弟妹之類的人際關係，也沒有可為自己提攜指點的師長，缺乏人脈因此成為職場發展上的限制。

然而，並非所有的回流移民都會在職場上，遇到負面經驗。受訪者#28 曾提到自己回台後，受到許多同事的幫助；她任職於國內的研究機構，許多工作夥伴曾前往海外求學，能理解自己偏西式的思考與作為，對自己的言行舉止較為包容，願意花更多的時間與她溝通，也會適時給予勸告和建議，幫助她渡過剛開始的適應期。受訪者#2 從澳洲回流，也認為自己相當喜愛目前在台灣的工作環境，身為澳洲留學顧問，業務上常需與澳洲方面的合作機構往來聯繫，會有許多與外籍人士接觸的機會；此種較為國際化的工作環境，讓受訪者#2 輕易融入其中，避免了超時工作、與同事溝通不良...等負面經歷。由此可知，雖然國內和海外的職場文化必有不同之處，但不同性質的工作場合及同事的背景，也會是影響年輕移民在職場適應的種要因素。

(五) 小結

由訪談內容中可得知，回流移民的再適應是必然的經歷，除了上述所提需自我調適的部份，受訪者們也談到了在台灣生活的優點，如便利的大眾運輸、發達的電腦網路科技與各項自動化設備，大為提高了生活的便利性；正因為台灣土地有限，日常生活可能需要接觸的各個場合都相距不遠，不論是要探訪友人、逛街購物，或是到公家機構辦理各項事務，都非常方便，不需到處奔波，也節省了交通所需的時間；辦事效率高且提供各類型服務的公司行號與機構，距離近、營業時間長的各式商店，以及所販售各種物美價廉、款式多樣的物品，也是居住在台灣所能享受到的好處。

隨著回流台灣時間的增加，意外情形的發生頻率會降低，並逐漸感受到台灣生活的優點。當回流者能夠接受與欣賞在地生活的美好時，就已表現出了對在地生活的適應與接受；此種心境的轉折，正如受訪者#26 所言：

剛開始回來時，難免會比較，遇到什麼情況，就覺得〔阿根廷〕那邊比較好，〔台灣〕這邊比較不好，但是後來想一想，各地有各地的好處與壞處，每個地方的生活方式不一樣，既然要回來，就要試著去接受當地的生活，而不是只會挑剔每個地方的缺點，這樣子只會讓自己的生活更辛苦，也沒有辦法融入這個社會；其實，回來時間久了，也就習慣了，會覺得生活在台灣也很不錯。(#26，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回流兩年之後，多數年輕移民已擁有穩定的生活與職業，並能享受台灣生活的優點，但生活中難免仍有一些令人不滿意的地方，多是人際相處方面的困擾，或是因此而衍生的各種壓力與磨擦。面對這些狀況，有些人選擇參考別人的作法，試圖讓自己的言行舉止與他人相似，並欣賞這些做法的優點；也有人認為應該據理力爭，保持自己的作風，讓周遭的人理解自己的想法，互相協調與遷就；多數人則認為，平心而論，與他人之間的磨擦之所以會產生，是因為觀念與文化的不同，並不涉及作法及想法的好壞與對錯，多參考別人的做法，互相溝通，仍然是最好的解決方式，不僅有助於問題的解決，也有益於減少負面情緒的產生。此外，適時脫離台灣的生活情境，或向親友傾訴所遇到的問題，也是受訪者們常見的舒壓方式，在能力可及的情況下，有些受訪者會定期前往海外探訪親友，也有受訪者會邀約同樣自海外回流的朋友，安一同前往海外旅遊，暫時放鬆自我，重溫在海外生活的感覺。

二、影響年輕移民再適應的因素

儘管回流台灣，並不是搬遷至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居住，多數受訪者仍認為自己須經歷重新適應的過程，且需要花費比當年移居海外時更長的時間來調適自己；10位受訪者表示回流後過了2年以上的時間，才逐漸能夠適應台灣的生活，但也有近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在回台後6個月內就已習慣台灣的生活環境，沒有經歷過太多適應上的困難；至於為何會有適應時間上的差異，除了與個人的背景因素有關，外在環境也具相當大的影響力。

經由訪談結果的分析，以外在環境因素而言，可發現以下3項重要因素：(1)台灣與移居地的距離長短，使得兩地之間往來所需的成本不同，進而影響移民回台探訪的頻率；(2)若移居地的華人移民數量眾多，可能發展出屬於自身族裔的社團組織，移民與同族裔者來往的機會提升，有助於熟悉族裔的文化；(3)移居地的通訊設備與媒體的發展程度，關係到移民能否接收到台灣的即時訊息，以及與台灣親友聯絡的便利性。

個人方面的因素，包含移出年齡、語言能力、家庭型態、與移入國之主流社會的互動情形，以及個人的回流意願；年齡與個性部份決定了語言的發展程度，也間接影響了移民的社交能力，並進而造就個人與主流社會的互動經歷。

(一) 外在環境的影響

文化衝擊的產生，最主要源自於兩地之社會文化的差異性，因此移居地的整體社會情形，會對移民回流後的適應情形有所影響。年輕移民居住海外時，若有較多的機會與同族裔的人口相處、接觸台灣文化，了解台灣社會的改變，提升對台灣的生活環境及社會文化的熟悉度，對於回流後的再適應情形，會有相當大的幫助。

1. 兩地的距離及旅行成本

即使進入了全球化時代，移入地與台灣的距離所造成旅行成本的差異，包含旅時與旅費，仍對移民移動的決策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左右移民居留海外時，與台灣的聯繫情形。以加拿大的移民為例，9位居住加拿大的受訪者中，有6位受訪者一年至少回台一次以上，對台灣社會並不陌生，與台灣的親友保持著良好關係，回流後很快便適應了台灣的生活：

〔我從加拿大〕回來台灣，生活上都很適應呀，我以前就常常〔從加拿大〕回來台灣，因為我爸在〔台灣〕這邊，所以寒暑假我都會回來〔台灣〕，天氣、食物、

交通...都很 ok 呀，沒什麼適應問題。(#5，女性，回流自加拿大)

反觀移居阿根廷的 18 位受訪者中，有 5 位從未回過台灣，3 位曾回台探訪 1 次，其他多數是三年以上才回台一次，旅費昂貴是最常見的原因，旅途耗時也是考慮的因素之一：

從台灣到阿根廷很遠、很貴，又很麻煩，所以大家〔指台灣移民〕其實都很少回來。以前阿根廷到台灣的飛法是先搭到巴西，或是到其他任何一個中南美的國家停一站，接其他的乘客，然後再一起飛到洛杉磯，有的是到溫哥華，然後再從那邊到台灣；現在也可以從〔台灣〕這邊飛到 Kuala Lumpur (吉隆坡，馬來西亞)，再到 Cape Town(開普敦，南非)，然後直飛 Buenos Aires(布宜諾斯艾利斯，阿根廷)，這樣好像是最短的航線了，可是也要飛三十幾個小時；每次回來〔台灣〕或回去〔阿根廷〕都要轉來轉去，搭配不同的班機，中間至少要停兩次，有時候還要過夜，很不方便。(#29，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正如受訪者所言，阿根廷與台灣距離遙遠，且目前兩地仍沒有直航的班機，目前的作法是先前往日本、香港，或是美國境內大城市，例如洛杉磯，再搭乘其他航空公司的班機前往阿根廷¹⁷，旅費相當昂貴¹⁸，全家一起旅行，對於家庭而言是相當沉重的負擔；在此情況之下，多數年輕移民居住在阿根廷時，對台灣的情形並不熟悉，僅能從與親友的對話，或友人從台灣帶去的書籍與報章雜誌來了解台灣，缺乏親身體驗；因此，回流台灣如同遷居至另一個陌生的國家定居，因而面臨較大的衝擊。

2. 華人社群的情況與影響

華人社群在移入國的情形，決定了年輕移民在當地與同族裔人口往來的機會多寡。較早期移出的移民，囿於在地華人移民人數較少，鮮有機會能與同族裔的朋友接觸，因而不得不盡力嘗試融入當地社會；如受訪者 #12 描述自己當時的情形，在移入初期，住家附近的鄰居及學校的同學，完全沒有來自台灣的移民，因此自己往來的對象與朋友全部都是當地人；以下是她說明自己如何與當地的朋友來往，試著融入當地的環境：

¹⁷ 台灣目前沒有直航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航班，一般旅遊行程規畫會取道香港、日本或洛杉磯。

¹⁸ 根據五福旅行社、Skyscanner、中華航空、長榮航空等公司、機構的國際機票網頁查詢結果，以 2009 年 11 月的票價為例(避開寒暑假、聖誕節與新年等票價高峰期)，台北至溫哥華的來回機票價格約在台幣 28,500 元至 40,000 元之間。台北至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機票費用，取道各地會造成價格上的差異，以取道洛杉磯為例，為台幣 18,000 元加上 546 英鎊，以 2009 年 10 月 26 日的台灣銀行牌告匯率為 1:53.69 計算，換算成台幣總額近 95,000 元。

我剛去的時候，學校裡面一個台灣移民也沒有，所以我算是有點被迫融入他們的社會...我在宿舍的電話旁放了一本筆記本，要我的室友想到什麼可以教我的，什麼都可以，就請他們馬上寫在本子上，我就跟著學...他們〔當地的朋友〕約我去看橄欖球比賽，我也跟著去，一開始看不懂，因為我們以前在台灣不太看橄欖球比賽，但是他們會教我，久了之後，我也跟著會看橄欖球比賽，這樣也比較有話題可以聊。(#12，女性，回流自紐西蘭)

在適應了當地社會之後，再回到台灣，受訪者#12 表示自己能夠適應台灣的生活環境，但習慣了直來直往的真誠應對方式之後，變得不太能接受台灣人較為政治性，話中有話的相處模式。受訪者#14 也有相似的遭遇，由於小學低年級時即移出海外，在缺乏同族裔人士互動的情況下，不僅中文的口語表達與書寫能力較弱，也不了解台灣的社會文化與相處模式，以致回台之後，常與他人產生誤會與爭執。

另一方面，受訪者#3、#5、#6 移居加拿大溫哥華多年，當地不僅有來自中國、香港、新加坡...等地的華人移民，也有許多來自台灣的移民，因而有相當多的機會與台灣移民互動，長期來往的好朋友們都是來自台灣的移民，在人際互動上，與在台灣時的情形變化不大；回台之後，在兩地生活落差較小的情況下，自覺適應情形相當良好。移居阿根廷的台灣移民，也有類似的狀況；雖然當地台灣移民的人數比美國、加拿大等地來得少，但由於父母對於子女學習中文的堅持，中文學校成了年輕移民的族裔社群交流場合，同學之間不僅培養了深厚的感情，也會彼此分享從台灣帶去的物品，有助於了解台灣的狀況。即使成長之後回流台灣，彼此之間仍然保持密切的聯繫，互相鼓勵、互相幫助，有助於適應回流後的生活。

除了中文學校之外，教會也是華人移民主要的交流場所之一。透過信仰與教會信眾之間的互相幫助，能給予回流移民心靈上的支持與生活事務上的協助，幫助他們適應新環境：

我在美國的時候就有加入教會，回台灣之前，我就有請美國那邊的教會幫我聯絡台灣這邊的〔教會朋友〕，請他們幫忙我。我回來台灣後，〔台灣〕這邊教會的弟兄姊妹給我很大的心靈支持與鼓勵，他們會給我建議，也有幫我打聽工作，對我回來後的生活幫助很大。(#35，女性，回流自美國)

移居地的華人移民數量較多時，年輕一代與同族裔者往來的機會提升，有助於了解台灣的社會文化及人際交往模式，以華人為主要參與族群之社團組織的發展也較為蓬勃，不僅能幫助新移入的移民熟悉移居地社會，給予必要的幫助，也能在年輕移民回流之後，利用組織

資源予以支持，縮短適應台灣生活所需的時間、降低心理衝擊的程度。

3. 移居地的通訊設備與媒體的普及程度

移居海外之後，和台灣親友的聯繫，除了回台探訪，遠距通訊也是重要的方式之一；不同的時期、不同的移居國，通訊設備的發展情形及普及程度皆不相同，不僅影響到與台灣親友的聯繫頻繁程度，也決定了移民對台灣社會轉變的了解程度，間接關係到移民回流後的適應情形。早期移出的移民，由於通訊科技的發展不如今日普遍，想與台灣方面的親友聯繫並不容易，如受訪者#8 在 80 年代初期移居阿根廷，當時阿根廷的跨國通訊設備並不普及，打越洋電話回台灣昂貴而不便，在缺乏報紙、廣播、電腦網路...等其他管道的情況下，並不易獲得關於台灣的消息：

當時我們如果要打電話回台灣，還蠻不方便的，必須去市中心特定的某些電信公司排隊才能打國際電話，家裡的電話不能打，而且去那邊打的時候，還要拿碼錶去計時，不然電話公司有時候會故意多收錢。當時要打越洋電話真的很不容易，要搭車到一個地方，再轉車到市中心的某一個地方去排隊，很麻煩的，去一次要很花很多時間；我們也沒錢回台灣，所以很少知道台灣的消息，是我後來高中畢業時，到當地的台灣辦事處打工，才比較有機會聽到一些台灣的消息。(#8，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受訪者#12 在 1990 年代初期移居紐西蘭，非常關心台灣的情況，剛開始只能收看由台灣帶到當地的舊報紙，電腦網路興起之後，會特別找機會利用網路或無線電視節目來收看有關台灣的新聞：

在紐西蘭的時候，會很想知道台灣的消息，會很好奇，剛去的時候通訊技術沒有像現在這麼好，網路也沒那麼發達，那時如果我媽回台灣，要帶東西回去[紐西蘭]，都會用台灣這邊的報紙包一包，東西比較不會破，那些報紙我在紐西蘭都看好多遍，捨不得丟，如果誰家有什麼報紙、雜誌，就會很想要去借來看...後來就有所謂的小耳朵〔指無線電視頻道〕，如果朋友家有裝，就會把握機會去他們家看；後來電腦開始可以看新聞之後，就是電視公司會把新聞的影像放在網路上，因為當時傳輸速度很慢，而且電腦界面上全部都是看不懂的 code，所以我就去朋友家抄操作的步驟，就是要按什麼按什麼這樣，然後一大早去學校弄，當新聞畫面出

來的時候，當下那種心情，真是感動的痛哭流涕，因為知道自己是跟在台灣的人同步看著同樣的新聞，覺得好感動。(#12，女性，回流自紐西蘭)

從受訪者#8 及#12 的個人體驗中，可以看到通訊設備的進步，以及對移民的影響。移民們有意願得知原鄉的訊息，若受限於移居地的通訊設備，同步得到關於台灣的消息時，就會逐漸與台灣脫節，久而久之，對原鄉社會覺得陌生，因而提高回流適應的困難度，如受訪者#5 說明自己的觀察心得：

我們〔年輕一代的移民〕不像以前的移民，他們比較少回台灣，可是像我們這種就還蠻常回台灣的，所以很了解台灣的狀況；而且我〔在國外時〕常常跟我爸媽通電話，〔爸媽住在台灣〕，也會常跟以前的朋友聯絡，所以回來〔台灣〕居住時，很快就適應了。像那些回來〔台灣〕會不適應的，通常都是在台灣沒有朋友，或是以前〔在海外時〕很少回來台灣的，不然像我們這種的其實回來的，其實回來台灣之後都覺得還好，當然難免會有一點點不適應，但是不會很不適應。(#5，女性，回流自加拿大)

正如上述受訪者(#5)的看法，隨著科技進步以及交通、通訊設備的使用費用平民化，加上網際網路與視訊設備的普及化，跨國聯繫成了生活中的例行事務，多數受訪者(#3、#5、#6、#7、#8、#11、#13、#15、#16) 幾乎每天都會利用 MSN 程式或是電子郵件和朋友聯絡，不論朋友們是身在台灣或世界各處；如受訪者#1 每天都會用 skype 程式與在加拿大和美國的親人聯絡。想要收看台灣的新聞也不再需要特別花費心思或額外的支出，如受訪者#28 在海外時，每天都會利用網際網路收看有關台灣的新聞，回台之後，則改為收看阿根廷的在地新聞，隨時保持與兩地的聯繫，不致於與在地脫節，也有較多與親友談天的話題。

進入全球化時代之後，科技的進步雖不能完全消除距離的影響，但確實能讓年輕移民不論身在何處，都能了解原鄉與移居地的情勢變化，長期維繫與各地親友的情感也不再是如此困難的事；身處海外時，若能獲知較多關於台灣的消息，對台灣的情形越了解，回台後受衝擊的程度會越低；若能保持與在台親友的情感聯繫，能減輕回台後無親友陪伴的孤獨感，較易接受台灣的社會，進而融入其中。

(二) 個人背景因素

1. 移出年齡、語言能力，以及與主流族群的互動情形

心理教育學者艾里克森（E. Erickson）認為人生是連續不斷的人格發展歷程，前一時期的人格培養，必然影響到後一時期的認知發展與行為表現；而人在成年之前，正是人格塑造，即社會化的最重要階段（張春興，1996），而移民的適應概念為個體帶著原居社會所塑造的認知基模，在移居地逐漸調整、轉換，以適應移居地的要求，但轉變的程度視個人的背景與經歷而有所不同。

社會化的主要三個來源為家庭、學校，與媒體，這三個管道傳遞著一個社會所擁有的共同價值觀與規範。若年輕移民於較幼小時移居海外，特別是在小學低年級之前移出者，在台灣所建構的認知結構較為薄弱，是在相對不具有既定觀念的情況下，去接受移居地的社會文化；雖有家庭教育傳遞原鄉的文化，但整體思考模式的塑造仍是較偏向移居地之主流文化的，回台之後，處於外在面貌相似，但內在思考差異大的情況下，容易面臨較大的文化衝擊，如受訪者#10的經驗：

我在美國時，同學都看不出來我是從台灣來的，以為我是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可能是我的行事做風比較像美國人吧，反而不會特別和華人或台灣人在一起，我在美國有遇過一些年紀比較大才來美國的同學，像是高中畢業才去，或國中畢業然後去美國唸高中的，他們都會自己聚在一起，不太跟當地人在一起。我想，如果我是年紀大了才去美國，大概也會很難融入吧，像我現在這樣，年紀大了才想要回來台灣，回來的第一年就很痛苦，遇到很多 opposition，觀念、想法、作法之類的，都跟其他人很不一樣，他們〔指台灣人〕沒有辦法理解我為什麼會這樣想，或是這樣做，我也同樣不太理解他們。（#10，男性，回流自美國）

正如受訪者#10在美國的觀察，許多中學之後才移出海外的 1.5 代移民，在海外生活時，由於語言程度及觀念想法、行為模式的不同，容易以同族裔者為主要來往對象，不易融入移居地的主流社會；部份來自阿根廷與加拿大之受訪者們在訪談過程中也描述了類似的情形：

唸高中的時候，在學校當然跟同學還是會打招呼，可是我的朋友大部份都是跟我一樣，年紀大一點才從台灣來的，他們〔當地的同學〕其實也不想和我們一起，像是分組做報告，都是台灣人自己一組，情況就很像在電視節目看到的，會有很多的小團體。（#6，女性，回流自加拿大）

我們年紀那麼大了才出去，當然在語言上〔指西班牙文〕還是會比他們差呀……當然也會有一些當地的朋友，但是真正比較要好的朋友仍然都是華人，畢竟我們

和他們〔指阿根廷人〕文化不同，很多想法和觀念都不一樣。(＃11，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在台灣生活至中學後才移出的 1.5 代移民，由於原有的文化觀念與生活習慣已較固定，使得年輕移民覺得自己難以融入當地社會；這些年輕移民雖居住於海外，但與族裔文化的距離並不遙遠，加上交通與通訊設備的幫助，對於台灣的生活環境、生活方式、文化的熟悉度與接受度皆高，回流後較易融入台灣的生活，甚至可說是「回到」原本在台灣的社会生活模式。

語言能力的培養，與個人的遷移年齡有極大的關聯性。語言使用及語意的掌握能力，會相當程度地影響個人與他者的互動，進而關係到個體在社會生活方面的適應；因為語言不僅是與他人溝通、建立社交網絡的重要工具，也是學習與接受主流文化的主要媒介。在小學低年級或之前移居的年輕移民，若未經過相當刻意的努力練習，即使有參加中文學校的課程，也很難保持流利的中文能力，特別是在書寫方面；而能否擁有較佳的中文或外語能力¹⁹，間接決定了年輕一代的日常往來對象，也影響了他們對於主流文化與族裔文化的偏向：

我覺得語言能力真的會有差別，像我是小學畢業才去，我的中文很好，可是西班牙語比較差，所以我的朋友主要都是華人，就是像我們一樣的移民，可是我弟去的時候還在唸幼稚園，他中文不好，就比較喜歡跟當地的小朋友在一起，當然不會特地去挑朋友，只是漸漸就會有這種傾向出現。(＃19，男性，回流自阿根廷)

回流之後，是否擁有優秀的中文能力（包含國語、台語和客語），是影響生活與就業適應的一大關鍵。早期²⁰台灣社會大眾對於回流移民，也許並沒有太多的認識；回流者擁有台灣人的外貌，往往理所當然被他人視為土生土長的台灣人，而未考慮到年輕回流移民受到移居地文化的影響，具有不同的觀念與作法；此種對於身份的誤認，可能造成與他人互動的負面經驗，如部份受訪者表示回台之後，因為語言問題而遭受挫折，而與人產生爭執：

剛回來的時候，會覺得自己的表達能力好像有點問題，就是會講中文，但是我可能講得不好，別人好像都聽不懂我在講什麼...然後我也常常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有時講到後來，他們對我的態度就很差。(＃14，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具備了基本的會話能力之後，接著會面臨語言意涵的挑戰，例如無法理解一些特定的用詞，

¹⁹ 指移居國的慣用語言或官方語言。

²⁰ 指本文之受訪者們回流的初期，約為 1990 年代前半段。

而造成溝通上的阻礙：

有時候就是會有那種感覺，就是跟別人不一樣，覺得有隔閡，像是如果別人跟我說發生在我移民以前的事，我就知道，可是如果別人講一些比較近期才流行的東西，那我不曉得，就會講不下去，雖然這種事情不會影響生活，可是就是感覺不太好，好像總是和別人有一段距離。(#8，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另一種常見的情形是由於兩地習慣的表達方式不同，而溝通不良：

我覺得兩邊〔台灣和阿根廷〕講話方式不一樣，國外講話比較直接，他們會直接跟你說重點，可是台灣這邊比較不直接，講一件事要繞個幾百圈，然後我就常常聽不懂。(#15，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基本上，語言（中文）方面的困擾，不論是口語表達、腔調問題，或是書寫方面的能力，都會隨著在台灣生活時間的增加而逐漸改善，雖然在初期可能會造成一些負面經驗，但在溝通能力改善之後，回流移民在外語能力上的優勢便會逐漸顯現，有助於回流者恢復自信心：

我其實沒有擔心過找不到工作...我覺得會西班牙語在台灣很有用，台灣蠻需要翻譯人才的，雖然台灣有些學校有學西班牙語的科系，可是他們〔指西班牙語系〕的畢業生在說的方面比較不行，像我們從國外回來的就有優勢。(#1，女性，回流自加拿大)

工作上，我覺得我在國外住過，是真的有幫助。語言方面會有加分，而且我們會比台灣的同事多一些和外國人接洽的經驗，主管也比較會看重我們。(#26，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語言能力與口語表達方式的改善，有助於和他人的互動；與他人良性互動之增加，能幫助回流者了解台灣的風俗習慣與行事作風，形成良性的循環，減少負面經驗的出現，有助於回流者適應台灣的生活。

2. 家庭型態與個人的回流意願

移居海外時的家庭型態與家庭生活情形，會影響年輕一代回流的意願，並間接關係到其回流後的適應情形。全家一同遷移的年輕移民，會受到主流社會親子相處模式的影響，但必然維持著部份的傳統教養方式，如受訪者#10 描述自己對於父母教養態度的看法：

我的父母親已經算開明了，他們也會想要符合美國主流父母的樣子，但本質上還是很像台灣的父母，很保護孩子，會為孩子設想許多，要孩子努力讀書，很在乎成績，也許表面上說不會，但看到成績單上出現 B 或 C 時，還是很不能接受。我覺得我父母在 parenting 方面還是很台灣式的，這種 tradition 可能是很難改變的吧。

(#10，男性，回流自美國)

若是家中主要往來的對象都是台灣移民，子女的主要交友對象自然也是父母朋友的孩子，除了在家中幫忙家務，也會在華人所開的店家打工，畢業後亦可能受聘於華人僱主。如此一來，年輕移民雖身處海外，生活中多數時間卻是沉浸的台灣移民的生活圈中；講求孝順、重視成績、以家庭為重、凡事不要過於計較，以和為貴...等台灣社會尊崇的觀念，也逐漸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傳承給了下一代。以受訪者#13 為例，從小在家裡幫忙做生意，長大後，受僱於同族裔的僱主，回流之後，對於台灣的社會文化接受度頗高，在職場發展方面也很順利：

我在台灣的公司都待得很習慣呀，都可以接受，沒什麼問題，可能是因為我以前在阿根廷就是在台灣人的公司上班的關係吧。(#13，男性，回流自阿根廷)

與其他獨自居住在海外，或是未曾在海外工作的回流者相比，在此種環境下成長的年輕移民，回流後，較能理解台灣社會的觀念與一般大眾的行為模式，面臨文化的衝突會較少，對於回流後的生活也較為適應。

除了全家移出的情形，家人分居兩地的情形，也是現今移民常見的遷移型態。在本文的 37 位受訪者中，當年有 16 位的家庭型態是屬於所謂的空中飛人家庭，細節情形則大致可再分為兩類，有 9 位是父親因經濟或其他因素留在台灣，由母親陪同子女居住在移入國，另外 7 位則是由於 1.5 代移民移出時年紀已較長，父母或是母親陪受訪者們在移居國停留一段時間後，便先行返台。

家人相處時間過少，對年輕移民來說總是遺憾，因而考慮為了家人團聚而回台定居。在此種情況下的回流，是年輕移民仔細思考，衡量自身在兩地的發展情形，以及回流後可能面臨的不適應情形，才做出的取捨與決定，在主要目標（與家人團聚）達成的情況下，多數受訪者們並不會太介意在台灣的遭遇，如受訪者#2 與#12 自述，在海外工作多年，回台探望父母時，才驚覺父母已年老，為了能有多一點的時間陪伴父母，他們選擇接受離家近的工作，較不在乎空間狹小、污染嚴重、交通混亂...等生活上的缺點。

反之，違背了個人偏好與意志，因父母要求，或是其他因素而不得不回流台灣的年輕移民，在缺乏心理準備，或是事前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回台後除了面臨生活環境上的不適應與文化上的衝擊，心態上的抗拒也是造成回流初期諸多負面經驗的主因之一。以受訪者#8 的經驗為例，由於返台就讀大學並非自己所願，而在台生活初期面臨較多的困難與自我掙扎：

我當初根本不想回台灣，但是我爸堅持叫我回來唸大學。來台灣的第一天，剛好遇到颱風，阿根廷沒有颱風，所以我那時覺得嚇死了，一直都很想回去，可是我又不敢打電話回阿根廷跟我爸說，就是一一直在掙扎，一直不想留在台灣，想要回去阿根廷，可是又回不去。(#8，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由此可見，回流者能否適應在台灣的新生活，重點之一在於自身是否能保持開放的心態，以不帶偏見的胸懷去接納新社會的文化與作風，以積極主動的方式與他人互動；若總是想著另一個地方的優點，不斷地做比較，自然難以接受新社會的生活，如受訪者#11 所描述自己剛回台時的情形，總覺得受到他人排斥，間接造成自己也不喜歡台灣這個新環境：

剛回來是為了唸大學，最不習慣是台灣同學對我的態度，有的老師也對僑生很不友善，同學們也不喜歡僑生，覺得我們都是靠加分才進去〔大學〕的，還有很多因素...要怎麼說呢.....反正回來就覺得很不開心，什麼都不喜歡，就覺得還是阿根廷比較好，很想回阿根廷，即使到現在還是很想回阿根廷，連懷孕的時候也很想念阿根廷，有時會很想吃阿根廷的食物；我想，人大概就是這樣，像我以前在阿根廷，有時會很想台灣，但是在台灣，又很想念阿根廷...可是這樣日子真的會過得不開心。(#26，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面對回流初期的心理掙扎，以及不友善的環境，年輕移民會採取寬容的態度，希望自己多注意美好的一面，以此鼓勵自己面對各項挑戰：

我在阿根廷的時候，一路上都沒有遇到什麼被歧視的事，可是我記得很清楚，我竟然在回台灣後被歧視，就是曾經遇到一些狀況，感覺真的很不好，可是，我覺得是因為他們〔指台灣的同學〕看得沒有像我們〔指回流移民〕那麼多，所以才會總是很在意一些小事，像我們看多了，承受挫折的能力也比較高，會比較容易生存下去，不用一直計較，這樣生活也會比較好過。(#8，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大多數的受訪者表示，隨著停留在台灣的時間增長，自己漸漸能理解台灣社會處理事情的

模式，也體會到各地有各地的優缺點，沒有絕對的好壞，只是做法不同而已；因此，敞開心胸去接受當地的方式，試著和別人做一樣的事，讓自己變成這個大群體中的一份子，別人才會接受自己，自己也才能融入這個社會。

三、小結

在本研究的問卷設計中，關於回流後的適應情形，主要討論三個面向，一為生活環境方面，包括天氣、生活空間、交通情況...等；第二是社會環境方面，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情形；最後則是著重在就業與職場發展方面。由於受訪者們在回流時，多屬於正要踏入職場，或剛進入職場的人生階段，且在回流因素當中，經濟與就業因素是重要考量之一，因此關於職場方面的適應情形，往往是他們感受較強烈的部份。

1.5 代移民剛回台灣時，不免會以台灣和移入地的狀況做比較，回流自加拿大的年輕移民，居住海外時，經常回台鄉度假、探望親友，加以父母親定居台灣的比例較高，與親友的聯繫頻繁，了解台灣社會的變化，對於回台後的情形，多表示能夠接受且習慣在台灣的生活，沒有太大的文化衝擊與意外；回流自阿根廷的移民，看法則較不一致，部份受訪者表示回台後適應情況良好，對於回流原鄉的生活與環境，感到相當親切，但也有些受訪者對台灣的情況感到陌生，在適應過程中跌跌撞撞，而留下許多負面的經驗。來自紐西蘭與澳洲的移民，多認為回流台灣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體驗不同的環境與社會文化，抱持著開放的態度，去嘗試與接受台灣的情形。而回流自美國的受訪者，情形不一，兩位年幼時即移出的受訪（#10、#35）仍在努力適應台灣的環境，並抱持著將來會再次遷居回美國的期待，另外兩位（#22、#24）則是帶著為回鄉服務與奉獻的心態回台灣，希望自己能貢獻心力，回饋台灣這塊土地。

整體而言，在生活環境上，包含空間狹小、氣候溼熱、污染嚴重、交通混亂...等情形，以及各種人為的規劃與公共設施，雖令人不盡滿意，但還是能心平氣和地接受，儘管部份回流移民因此出現生理上不適應的症狀，例如因為悶熱而頭痛，或是因為空氣污染而氣喘，但在一段時間後，通常是半年至一年的時間，情況便會改善許多。社會文化與人際交往方面的適應過程，較令人印象深刻；1.5 代移民的成長與求學時期多在海外渡過，家庭、學校、媒體與同儕...等是個人社會化的主要來源，年輕移民所了解的、所接觸的，多是有關移居地的社會規範與風俗習慣；然而，不論是美國、加拿大、紐、澳，或是阿根廷，社會的許多面向其實與台灣的觀念與作法有很大的差異，年輕移民回流台灣後，遇到許多不理解的情形，也容

易在與他人互動時產生誤解與磨擦。面對此類文化差異所造成的衝突，部份受訪者默默接受，有些受訪者則選擇努力向周圍的人說明自己的意見，爭取應得的對待；也有些受訪者保持低調而謹慎的態度，以周遭的人為學習的對象，觀察他們的行為，理解他們的做法，並進而讓自己變得更像其中的一份子。

在適應台灣生活的過程中，來自家人與朋友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具有同樣背景與經歷的朋友，在觀念與思考方式上較為接近，容易遇到相似的境遇，也較能理解受訪者們的疑惑，除了能解答 1.5 代移民的疑惑，遇到問題時給予實務上的建議，幫忙解決一些生活上的瑣事，亦可藉由談話宣洩生活中所積累的壓力。受訪者們表示，剛回台時，較常和同樣自海外回流的朋友來往，之後才慢慢認識在台灣成長的朋友，但也不會因此疏遠了前一類的朋友，畢竟彼此是遇到困難時，互相扶持的夥伴。

在就業與職場發展方面，回流者自認並非帶著光環回到台灣，無法在進入職場初期即空降至較高的職位，但年輕移民認為自己是具有競爭力的；在海外生活的經歷讓他們有了寬廣的見識，培養出獨立的性格及國際觀，但是，缺乏在地的的工作經驗與人脈關係、不易適應約定俗成的職場文化，是他們普遍需要面對的問題。整體而言，年輕移民們對於台灣社會所能提供的就業選擇與職場晉升空間感到滿意，部份移民把回流台灣視為工作經驗與資本的一段積累過程，以此做為再次向外發展的基礎。

對年輕移民而言，回到台灣之後，雖然要克服的困難與當年移出時不同，但勇於接受外來環境變化，以及積極努力的心態，是同樣必要的。雖然部份受訪者表示，回流台灣後，所需的適應時間，比當年移出時還要長，過程也更辛苦，但這並不表示台灣環境不好，或是年輕移民排斥在台灣的生活；他們認為，當年的移出與現在的回流，是必須獨立看待的兩種狀況，不能相提並論。當年移出時，年紀較小，面臨的情況單純，且小朋友較具彈性，適應自然比較快；成長之後的回流，要面臨的狀況複雜，挑戰多，加上成年人必須背負的各種責任與壓力，自然需要多一點時間來調適。對於回流後的經歷，多數人抱持著正面的態度，能夠理性地思考，認為沒有一個國家的環境是絕對的好，或是絕對的不好，一切端賴個人對其生活方式的選擇，以及看待所在社會的角度；既然自己已做出回台發展的決策，自然就得接受台灣的環境與挑戰，只要不刻意心存抗拒或比較，一切總會慢慢好轉。

第三節 1.5 代回流移民的自我認同

一、回流移民的身份認同情形

在本研究中，問卷中關於自我身份認同的問題，採複數勾選的形式，訪問了主要來自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和阿根廷的受訪者關於自我身份與定位的看法，選項包含了單一國家的身份，如「台灣人」(Taiwanese)、「美國人」(American)，或是兩種身份的結合，如「美國華裔」(American Chinese)或「美國台裔」(American Taiwanese)、「國際人」(Global Person)及「其他」(Others)。多數受訪者會選擇「台灣人」之選項，以及移入地的身份 (American、Canadian、Australian、New Zealander、Argentine)，或兩種身份兼而有之；部份回流移民(4位)也勾選了連結兩地身份的選項，但通常不是最優先的選擇，如「紐西蘭台裔」(Taiwanese-New Zealander)、「阿根廷台裔」(Taiwanese-Argentine)，結果如下表所列：

表 12：1.5 代回流移民的自我身份認同

受訪者	自我身份認同(複選)
#1	Taiwanese, Canadian
#2	Taiwanese, Australian
#3	Canadian Chinese, Native Taiwanese 但有加拿大籍
#4	Taiwanese, New Zealander, Global person
#5	Taiwanese
#6	Taiwanese
#7	Taiwanese, Canadian
#8	Taiwanese
#9	Taiwanese
#10	American
#11	Taiwanese
#12	Taiwanese, Taiwanese New Zealander, New Zealander Taiwanese
#13	Global person, Taiwanese
#14	其他 (中間人 ²¹)
#15	Taiwanese
#16	Taiwanese, Argentine
#17	Taiwanese, Argentine, Global person
#18	Global person
#19	Taiwanese, 視情況而定
#20	Taiwanese, Argentine
#21	Taiwanese, Argentine
#22	Taiwanese, American
#23	Taiwanese, Canadian, 視情況而定
#24	Taiwanese, American
#25	Canadian
#26	Taiwanese
#27	Taiwanese
#28	Taiwanese, Argentine Taiwanese
#29	Taiwanese
#30	Taiwanese, New Zealander
#31	Taiwanese
#32	Taiwanese, New Zealander
#33	Taiwanese, New Zealander
#34	Taiwanese, Argentine Taiwanese
#35	Taiwanese, Taiwanese American, American Taiwanese, Global person
#36	Taiwanese
#37	Taiwanese, Canadian

²¹ 此選項非問卷上的原有選項，為受訪者自己填答，認為此說法較符合自身的情況。

Shelton and Sellers (2000) 從事關於非裔美國人民之自我認同研究時提及，個體在表述自我身份認同時，其實會受到當下所處情境的影響，例如所處的場合以及詢問的對象，而選擇適合當時情境的答案；亦即，每一個自我身份認同的選擇，代表著不同的意涵，且可從中理解個體欲突顯自身「隸屬」或是「不同」於所處的群體，且自我身份的選擇，會影響個體的決策與行動。在本研究的 37 位 1.5 代回流移民中，有 32 位認同自我的身份為「台灣人」，此結果顯示了 1.5 代回流移民欲留在台灣社會發展，成為其中一份子的決心，也表現了對於出生地與故鄉的情感偏向：

我在哪裡，我就是哪裡的人，不是有沒有公民身份的問題，是你既然決定要留在這邊，你就要成為這邊的人。(#28，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我在台灣出生，就是台灣人呀！(#15，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我是台灣人呀，畢竟是在〔台灣〕這邊出生長大，台灣是我的根，這是不會改變的！(#33，女性，回流自紐西蘭)

我本來就是台灣人，只是曾經在加拿大住過而已。(#6，女性，回流自加拿大)

我雖然有美國身份，可是我還是台灣人呀！(#22，女性，回流自美國)

另一方面，年輕移民也不諱言身份的選擇會受到當下所在的環境，是一種因地制宜的策略：

我現在人在〔台灣〕這邊，就是台灣人呀，硬要說自己是外國人不是很奇怪嗎？因為我真的是台灣人呀。(#16，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我現在在台灣，我就會說自己是台灣人呀，身在台灣，長得跟大家一樣，也講一樣的話，還硬要選擇自己〔指台灣人〕以外的身份，這樣不是很奇怪嗎？如果我現在在阿根廷，別人問我，我可能也會說我是阿根廷人呀，這是很正常的反應，就是看當時的環境做決定。(#15，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身份認同的〕答案要看我現在人在哪裡吧，我現在在台灣，我當然是台灣人呀，如果我在加拿大，我就是加拿大人呀。(#23，男性，回流自加拿大)

我都是呀，是台灣人也是加拿大人；在國外，如果我拿台灣護照，我就會說我是台灣人，如果拿加拿大護照，我就會是加拿大人，要看狀況而定。(#18，女性，

回流自加拿大)

此外，也有受訪者認為，決定當下的自我身份選擇最重要的依據是本身的目的，並不一定代表內心的認同與歸屬：

〔身份的選擇〕要看情況，如果要過海關的時候，我拿什麼護照我就是什麼人；平常的話，其實我是什麼人無所謂，你要說我是台灣人、阿根廷人，其實我覺得我都 ok，都可以接受。(#19，男性，回流自阿根廷)

身份對我來說沒有意義，有需要的時候，我就會是那種〔身份的〕人；像我擁有加拿大身份，是因為我想要到美國去求學，這是一種策略，只是這樣而已。(#9，女性，回流自加拿大)

我不會很強調我是什麼人；我會辦加拿大身份，是為了要去唸書，並不是為了要成為加拿大人；不是說我不喜歡加拿大，我在加拿大，我也認為自己是加拿大人，我回到〔台灣〕這邊工作，我就是台灣人；我是覺得，認為自己是什麼人，並沒有差別，不會對你的生活有影響。(#23，男性，回流自加拿大)

我認為自己是誰，主要是要看我的目的是什麼吧，如果我拿阿根廷護照，海關問我，我就會說我是阿根廷人，可是如果拿台灣護照，我當然說我是台灣人呀，實用性還是最重要的。(#13，男性，回流自阿根廷)

儘管部份年輕移民認為身份的選擇取決於實用的價值性，但也有受訪者描述追尋自我認同的掙扎過程，透露出身份定位對於自我的重要性：

我在 18、19 歲的時候，自我的認同問題就出來了，我就開始尋覓，那時一直在想自己到底是中國人是還是什麼人，我一直想一直想，我尋覓我的 identity 真的尋覓好久，這個問題困擾我好幾十年；我在台灣的時候，本來是很認同中國文化，可是後來我變成在國外長大，所以我很嚴重的 identity conflict，這種 conflict 是在我成長的過程中逐漸產生的；以前在台灣時，沒有這種問題，但在國外，他們就會跟我說：「你是阿根廷人嗎？可是你長得又不像」，但是我是台灣人嗎？可是我又不是在台灣長大，又不像其他的台灣人，這個問題我一直想，我回台灣還是在想，一直到去美國唸書，有一天我才恍然大悟，我才知道，其實我的 identity 是很 unique 的，我並不需要因為我的 unique 而困擾，最重要的是，我就是我，最重要

的是要認同我自己的 identity。(#29, 女性, 回流自阿根廷)

除了認同自我為「台灣人」的受訪者之外，有 4 位年輕移民對於自身的定位有不同的看法，分別是「美國人」(#10) 和「加拿大人」(#25)，以及「中間人」(#14) 和「國際人」(#18)。進一步詢問選擇此身份所代表的涵意，受訪者 #10 表示雖然自己在台灣出生，也擁有台灣的公民身份，但自己從小在美國成長，已適應當地的社會、喜歡在當地的生活，且自己的思考模式與行為作風相當美國化，因此認為自己是「美國人」。受訪者 #25 雖不是從小在加拿大長大，但非常熱愛加拿大的生活環境，且在環境保育、動物保護、社會救助、扶助弱勢...等方面對台灣社會感到失望，因而宣稱自己為「加拿大人」。

上述兩位受訪者因為自身的經歷與偏好而單選屬於移居地的身份，相當確定自我的定位，以及與國家、土地之間的關聯性；另外兩位受訪者則是認為無法將自我歸類、隸屬於特定的國家或土地，如受訪者 #14 認為問卷所預先設定的選項皆無法完善表達自身的狀態：

身份認同上，我覺得這邊的選項哪個都不是，每一個看起來都怪怪的，我覺得我應該算是「中間人」吧，就是夾在兩個國家之間；你在國外，人家就看你是東方人，不是當地人，你在台灣，人家又當你是外國人，一直都是這樣，不管到哪裡，不管離開多久再回來，還是沒有回家的感覺。(#14, 女性, 回流自阿根廷)

經過思考與討論之後，受訪者 #14 認為「中間人」這種說法會更適合自己，因為自己雖擁有台灣和阿根廷的公民身份與永久居留權，也在兩地生活了十多年以上的時間，卻無法對其中一地擁有百分之百的歸屬感，無法完全融入其中的社會，因而認為自己是介於兩地之間的「中間人」，以此表達出自我身份認同的游移不定。

受訪者 #18 則是另一種類型，其成長過程在台灣、香港與加拿大渡過，也在台灣、加拿大、美國、芬蘭...等國家之間往來，由於遷移頻繁，擁有在多個不同國家的生活經驗，受訪者 #18 認為自己較具有國際觀，思考模式與行為作風無法單純歸類於單一國家的影響，因而認為「國際人」的選項是比較符合自身狀況的辭彙。

進一步詢問回流移民在過往的親身經驗中，如何表明自己的身份，受訪者們多認為要視情形而定，在台灣與海外，可能會有不同的答案：

- (1) 若是在台灣，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會稱自己為「台灣人」，不會主動表明自己擁有他國的公民身份或居留權，只有被他人進一步詢問時，才會以「我曾經在海外住了一陣子」，或是「我是在台灣出生，但是在國外長大」等說法加以解釋。

- (2) 若是在移居國，會稱自己為「Taiwanese」，並補充說明台灣的地理位置及現況。
- (3) 在移居地，許多當地人可能對台灣的情形並不了解，年輕移民若被泛稱為「Chinese」，部份年輕移民會加以更正為「Taiwanese」，但也有些受訪者覺得可以接受此種說法，認為「Chinese」只是一種文化上及血緣上的統稱，並不涉及政治立場；不過可能會加以強調自己是來自台灣，而並非中國；此點與 Lien (2004) 的研究結果可互相呼應。
- (4) 若是在台灣或移居國以外的第三國，則視所使用的護照來回答，多數受訪者仍會聲稱自己是「台灣人，但是擁有加拿大籍」(#6)、「台灣人，但是在阿根廷住了很多年」(#16)，或是「Chinese，但是不是從中國來的」(#15)。

從上述的回答中可看出，年輕移民認為「台灣人」(Taiwanese) 和「中國人」(Chinese) 是不同的，並不喜歡被混為一談，因為認為來自兩地的人，不論是價值觀、想法或作法皆有相當大的差異；但也有受訪者表示是因為過去在海外的經驗，而不願被誤認：

在阿根廷的話，人家說我是 Taiwanese 是 ok，但是我很介意人家說我是 Chinese，因為 Chinese 就會覺得好像是指從中國大陸來的；在阿根廷，被當成中國大陸人不好，因為有一陣子，那邊有一些從中國偷渡過來的人，他們會做一些犯法的事，形象不好，所以不想被誤認。(#15，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對大多數的年輕移民來說，身居海外時，若被稱為 Chinese，雖不見得相當同意，但也不致於無法接受，畢竟對不同族裔者而言，華人在外觀上的差異並不明顯，在無法分別的情況下，直觀上仍會稱為「Chinese」：

現實情況是，我就是 Chinese “to them”〔指移居國的當地人〕，什麼 Hong Konger、Chinese、Taiwanese，他們〔指移居地的居民〕才不管；舉例來說，如果今天有一個西方人來台灣，那我們也只會說他是一個「老外」，誰管他是美國人還是加拿大人，其實他們的感覺也是這樣，今天他們說你是 Chinese，你硬要跟他說「No, I'm a Taiwanese」，他們只會覺得，那還不是都一樣，就是「老中」!(#23，男性，回流自加拿大)

除了以外表來評斷族裔之外，回流移民也提到，與其宣稱自己的身份，不如強調自己從何而來；因為生活在多元文化的國家，如加拿大，多數人都是外來客，大家都有共識，既然在此生活，便是這個國家的一分子，不需要再強調自己的身份，而轉為好奇對方從何處遷移來此；面對這類問題，加拿大年輕移民常見的回答是「我是從台灣來的」(I'm from Taiwan)，

或是「我是 Chinese，但是我從台灣來」(I'm Chinese, but I come from Taiwan)。由此可見，身份的選擇與表現方式是有彈性的，也是會轉變的；不論是在移居國或是在台灣，1.5 代移民身份認同的選擇結果雖可視為個人內在的主觀認定，以及對於自我定位的表現，但仍不可忽略主流社會之他者的影響，以下將試著歸納影響年輕回流移民選擇自我身份認同的因素。

二、影響身份認同的因素

由訪談內容中可得知，影響年輕回流移民表述自我身份的因素，移居國的公民身份並非唯一的依據，而是個人的內在想法以及外在社會環境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個人內在的認同，除了可顯現對於國家、土地的回憶、情感與歸屬，對於出生地、親友的所在地，以及移民本身是否感受到被當地社會所接納，認為自己是否融入移居地的社會、是否和主流族群「一樣」、感受到自己隸屬於該族群²²，都是年輕移民選擇自我認同的重要考量因素，以下將分別說明：

(一) 法律上的身份認同

是否為該國的公民，亦即是否具有該國的身份證和護照，往往是年輕移民決定自我身份認同時，直觀上所想到的依據。本文的研究族群是自海外回流台灣的 1.5 代移民，受訪者們皆為台灣的公民；若是移居美國、加拿大、紐西蘭，或是澳洲的年輕移民，必然已具備移居國的公民身份，唯獨移居阿根廷的年輕移民，雖居住當地多年，卻不一定是阿根廷的公民。

18 位移居阿根廷的受訪者中，有 13 位表示自己並未具備該國的公民身份（稱為紅本）和護照，只擁有永久居留權（PR，又稱為綠本），因此在被問及身份時，通常會表示自己是「台灣人」。究其原因，主要在於阿根廷的身份辦理非常繁瑣，令人怯步；比起手續上的複雜，官僚主義盛行、行政效率過差更是更令人困擾的原因，除了費神耗時之外，有時更需要額外的花費：

在〔阿根廷〕那邊辦〔公民〕身份很麻煩，弄了大半年，護照就是不出來，我爸辦了十幾年，就是等不到，因為在〔阿根廷〕那邊很容易遇到官僚的問題，沒辦法解決，就只好一直等，有時乾脆就不辦了。(#8，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以前有段時期有一窩蜂的〔中國〕大陸人跑去辦阿根廷身份和護照，他們都會「花

錢」〔指找人代辦或是送紅包〕去辦，變成我們這些合乎條件的、正規的〔移民〕，要去辦身份的話，不塞錢就拿不到身份，而且辦身份或辦護照的過程又很麻煩，弄到最後覺得很生氣，乾脆就不辦了。(＃13，男性，回流自阿根廷)

如上所言，部份移民在衡量情形之後，可能選擇放棄申辦阿根廷的公民身份與護照，因而習於自稱「台灣人」，以表明自己僅擁有台灣公民身份的現實狀況。不過，除了文件上所註明的身份之外，來自阿根廷的受訪者們也表示，自己與台灣這塊土地有斬不斷的牽連，表明自己是「台灣人」是一種對於故鄉的認同，也是自我歸屬的表現：

我在台灣出生，所以我當然是台灣人呀，這是不能否認的！我們又不像是在當地〔指阿根廷〕出生的第二代，我們跟台灣的關係是斬不斷的。(＃15，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台灣是我的家鄉，是我的親人、我的根所在的地方，以前還不會覺得這種感情很真實，但離開過〔台灣〕之後，就會發現自己的感情，畢竟在這邊住了這麼多年... 所以我的家鄉還是在台灣，人家問我的話，我都會說我是這裡〔指台灣〕的人。(＃26，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相對於回流自阿根廷的移民，來自其他國家的年輕移民並不存在不具備該國身份的困擾，多數受訪者們表示自己在法律身份上的確是美國人、加拿大人、澳洲人與紐西蘭人；但外在條件上具備了公民身份，並不同於內心對該地或該國必然具有百分之百的歸屬感。1.5代移民的特質之一，是本身保有兩個（或以上）社會的記憶與生活經驗，同時介於兩者之間，但無法將自己完全畫歸於其中一方，因此除了探究外在形式上的身份，更重要的，是了解其內在歸屬的情形，以及形塑今日身份選擇結果的力量。

(二) 個人背景的影響

1. 移出時的年紀：1.5代移民若在年紀較小時，特別是在小學低年級前即移出者，由於在台灣生活經驗較少，對於台灣社會文化的認識與習慣淺薄，移居海外後，如同未吸水的海綿，容易深入接受移居國的文化，使得整體的觀念與行為較偏向當地的風格，對於台灣身份的認同可能顯得薄弱，但不代表台灣身份的不存在或是不被自我所承認。若是中學時期以後才移出者，由於個體發展階段與教育的影響，本身基模已建構了台灣的文化模式，即使後來移居

²² 此地的「族群」並非以血緣或族裔做為分類依據，而是泛指國族，即移民對該國、該地社會所擁有的歸屬感。

海外，仍有較大的機會偏向台灣身份的認同。

2. 居住海外的時間長短：若是居住在台灣的時間明顯較居住海外的時間為長，其自我認同會偏向台灣，反之則偏向移入地。若是頻繁地往返台灣與移居地，或是週其性地居住於兩地之間，自我認同的偏向並不明顯。若是曾居住在數個不同國家，且居住時間長短差異不大，則可能選擇稱呼自我為「國際人」，表現出能適應不同國家、融入當地社會的彈性與開放特質，或是因此缺乏對特定某一國家身份的認同，轉而以城市、家人所在地點、居住時間最長、自己最喜愛的居住地點...等其他因素來決定自己的認同。

3. 家庭生活與教育的影響：父母的教養方式對於子女的認同會有所影響，在日常生活中一點一滴逐漸累積與建構。若是主流文化是較強勢的，或是較受到尊崇的，父母鼓勵子女與主流社群來往，接受該地的價值觀與作為，年輕移民認同的情形可能偏向移居地的身份，此點在美國與加拿大回流移民的情形中較為明顯。若父母不在子女身邊，或父母長期往返於兩地之間，亦即並非全家移民的家庭，傳統文化對於子女的約束力與影響力較弱，年輕一代有更多的機會接觸主流社會，認同的情形就可能會出現較為多元的結果。另外，阿根廷回流移民的情形，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年輕移民，具有明顯的差異性；多數來自阿根廷的受訪者，當年是採取全家一同遷移的家庭型態，父母親仍然保有傳統社會較為權威的管教方式，例如規定子女在家一定要使用中文，注重傳禮節，不可忘本；灌輸孝順的觀念，需幫忙做家事或幫忙家裡的生意，不應忤逆父母或做出讓父母傷心、蒙羞的事；認為讀書是保障子女未來發展的最佳途徑，相當在意子女的教育與成績、讓子女參與補習班課程，為子女規劃未來的路...等等。由於此種教養方式與在地的阿根廷人非常不同，久而久之，形成了年輕一代與當地族群在思考與行為上的差異性，使得年輕移民知覺自身與當地人是不同的，而傾向認同自我族裔的身份。

4. 對於社會文化的喜好與接受度：對於一地社會文化的接受度，可能會對移民自我身份的偏好造成影響；若個體本身認為該地的處事習慣或價值觀是不適當的、自己不喜歡的，而對在地的思考模式有所排斥，自然而然會拉開自我與在地族群的距離，進而弱化認同當地的身份。例如，受訪者#9認為加拿大人的生活態度過於悠閒，自己並不喜歡當地的氛圍，即使擁有該國的身份，但內心並未真正視自己為在地族群的一份子；相對而言，同樣回流自加拿大

的受訪者#25 則認為加拿大較尊重生命與人權，因而即使回流台灣，仍強烈偏向加拿大的身份認同。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家人與往來的主流族群，媒體亦是形塑個人認同的重要力量，長期接受媒體傳達的訊息與建構的意象，增加對該地情形的了解，或是認同媒體所建構的世界，便可能偏向媒體所代表的族群身份，如受訪者#24 的經驗，自己原本非常喜愛西方/美國的事物，包括流行音樂、電影、文學...等，所認同的，是媒體所塑造的西方/美國形象，然而移居美國多年之後，知覺得實際的情形和媒體所塑造的形象，其實有相當的落差，原本強烈偏向美國的身份認同也開始動搖，經過長期的探究與思考之後，最後回歸「台灣人」的身份選擇，此種身份認同甚至成為她決定離開美國，回台定居的因素之一。

(三) 過往經歷之影響

移民在移入地的生活情形以及與主流族群接觸的經驗，會影響自我身份認同的建構與結果。如同 Phinney and Ong (2007) 的研究結果，年輕移民回想其在海外的生活經驗及與同儕的互動情形後發現，在中學之前，年輕移民能和當地的孩童及學校的同學們相處融洽，玩在一塊，不分你我；進入中學之後，個人逐漸出現尋求心理上的自我統合的需求，開始注意自己的外在、所屬群體...等，因而可能轉向與同族裔或相似文化背景的朋友來往；校園中開始出現不同的小團體，而讓移入者感受到有形或無形的隔閡：

我想，我算是幸運的，〔在海外〕並沒遇到被歧視的情形；我覺得，那個年紀的人〔指中學生〕，還不太會去接受多元文化，主要還是會和自己同一群〔指同族裔〕的朋友玩樂，在學校可以看到很明顯的分界，大家都是一群一群的，主流的一群、非主流的一群，或是亞洲人自己一群。(#5，女性，回流自加拿大)

受訪者#4 在國中畢業後移居紐西蘭，雖然沒有明顯遭遇被排斥的情況，卻深深覺得無論自己再怎麼努力，也無法融入當地的主流族群：

在我們〔紐西蘭〕那邊，華人已經很多，已經自成一圈了，你甚至不用講英文，也可以在那邊生活，我當時覺得這樣子生活不太好，因為都已經出國了，〔就不要一直和華人在一起，應該多和當地人接觸〕，可是在學校裡，高中生並不成熟，會有很多小圈圈，我想打入他們的圈子，並不容易，到最後，還是只能靠近和自己同族群的，就是比較偏向華人，像我最好的朋友還是華人。(#4，女性，回流自紐西蘭)

上述受訪者們的親身經歷也部份解釋了為何在中學之前移出的年輕移民，較有機會融入移居地社會，偏向選擇移居地的身份認同，除了語言能力與文化觀念的影響，身邊同儕的態度也是重要的形塑力量之一。雖然並非所有的 1.5 代移民都曾在海外遭遇到被排斥，甚至是歧視的經驗，然而，一旦有類似的經驗，便會讓年輕移民留下強烈的負面情緒與印象：

我在公車上遇到的情況是，我們一群台灣女生在聊天 然後突然有一個外國人〔指當地的白人〕叫我們滾回我們的國家去；還有一次是在車上，有些外國人故意拿球丟我們的車子，有時候在走廊上被外國人摸屁股，那種感覺真的很不好，可是因為當時自己只有一個人，不知道怎麼跟人家吵，只好默默忍耐。(#6，女性，回流自加拿大)

當年輕移民無法感受到移居地社會的友善，或不被主流族群所接納，會轉向與同族裔者來往，一方面是文化背景、思考觀念相似、相處容易，另一方面是害怕再受到傷害；如受訪者 #6，在加拿大時，長期往來的好朋友都是來自台灣的移民，完成學業後，便考慮和朋友們一起回流台灣；受訪者 #29 的遭遇表現了移入者不被接納的痛苦：

我覺得我是在很嚴重被歧視的情況下成長的，像是眼光啦，言語什麼的，有些人甚至很不友善，只要一吵架就說：「滾回你的國家！」，這句話對我們移民來說是很大的打擊，而且是不管任何年齡的人，在吵架的時候都有可能這樣跟你說，有些人甚至會用那種看外星人的眼神看你；當然不是所有的阿根廷人都會對你這個樣子，但是只要遇過兩、三個人對你這樣子，那種傷害就夠了。(#29，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進入大學或職場之後，年輕移民被歧視或明顯受排斥的狀況會逐漸減少，但彼此之間的和平相處，並不代表完全地被接納，如回流自阿根廷的受訪者們常提到的一句話：「阿根廷人很友善，但友善不代表接納」(#8、#11、#15、#16、#26)；在與當地人互動的生活細節中，有時會讓移民覺得自己並不屬於「他們」當地人：

他們〔指阿根廷人〕對我們〔指台灣移民〕其實還好，還算客氣啦，當然因為你的長相，他們會覺得你是外國人，就是說，他們會覺得你是外人，不管怎樣還是會把你當外國人看，這跟你在那邊住多久沒有關係，因為你看起來就是外國人。(#16，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我們〔指台灣移民〕當然還是跟他們〔指阿根廷人〕不一樣啊，應該說是我們和他們不是同一群的，只是剛好住在同一個地方，不用說別的，以講電話做例子就好了，不用看到長相，只要拿起電話一出聲，他們就會知道你是「外國人」，應該說他們就會把我們當「外國人」。(#11，女性，回流自阿根廷)

這些在海外生活的過往經驗，不論是有意的排斥或是無形的隔閡，可能間接促使年輕移民向「台灣人」的身份靠近，如同受訪者#21 所言：

有時候，你認為自己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別人認為你是誰，你的外觀就代表著你的身份。(#21，男性，回流自阿根廷)

於是，在自我的認同上，以受訪者#19 為例，即使居住在海外的時間更長於在台灣的日子，「台灣人」的身分仍然成為他優先的選擇：

你問我是哪一國人，我兩邊都是，但偏台灣人多一點，因為外觀就是台灣人的樣子，在阿根廷畢竟還是無法被 totally accept，我並不是指責他們〔指阿根廷人〕歧視我們〔指台灣移民〕，只是我們不屬於他們那一群而已。(#19，男性，回流自阿根廷)

當年輕移民與其他族裔者的互動程度逐漸降低，便會形成族裔群聚的情形，雖然並非真的在地理位置上群居於一處，但移民的主要往來對象都是同族裔的朋友，而造成雖然喜歡當地的自然環境，卻無法融入當地的人文社會之中，建構出「我們」（移民）及「他們」（當地主流族群）之間，無形但明顯存在的界限，促使年輕移民的自我認同偏向族裔身份，增強了身為「台灣人」的意識，也因此產生了強調原居地的自我身份表述，如「〔我是〕台灣人，但是在阿根廷住了很多年」或是「我住在加拿大，但我是從台灣來的」。

三、小結

本節討論了 1.5 代年輕回流移民關於自我身份認同的選擇與影響因素，記錄了受訪者們直觀的答案，亦透過年輕回流移民個人經驗的整理，從中分析出具有明顯共通性的情形，再進一步歸納、推論出影響因素。研究結果顯示，多數年輕移民認同自己為「台灣人」，或台灣與移居地身份兼而有之；造成此結果的原因，除了文件上的身份記錄與個人所需之實用性

的答案，更取決於受訪者內心的想法、當下所處的環境，以及被詢問時的狀態，並間接呈現回流移民當下對於自我的定位，亦即個人已做出回流的決策，並決定在台灣長久停留，成為「台灣人」的外在表現。

由於 1.5 代移民生命歷程的特殊性，其生命經驗的構築奠基於不同的社會文化之上，每一段經歷皆塑造出了部份的個人認同，因而成就了複合式的自我身份認同，正如受訪者#19 所言，若要深入思考自我的定位，往往連年輕移民本身也無法將自己完全歸屬於單一的身份：

其實認真問我的話，我覺得我可以是台灣人也可以是阿根廷人，但是如果再進一步問我的感覺，我會覺得，好像都是，但又好像都不是，因為撇開護照上的身份不談，我覺得我對兩地社會都沒辦法 100% 的融入，兩邊的生活都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部份，但總是覺得缺少了一點什麼東西，可能是歸屬感吧。(#19，男性，回流自阿根廷)

因此，即使由研究結果中得到多數年輕回流移民強調身為「台灣人」的自我認同情形，仍不可因此而忽略答案的背後，其實都有著複雜的組成與形塑的各種力量。事實上，對 1.5 代移民而言，生命中的每一個階段、在每一塊土地的回憶都是有價值的，不同文化的融合不應造成認同的衝突與對自我的否定，而需要接受過往的一切所塑造出的自己，並肯定自我的獨特性、欣賞自己，才能繼續生活下去。於是，年輕移民們會依據不同的情況與目標，在多重身份中，選擇突顯出部份的認同來做為簡易的回答，如何進一步去分析簡易答案背後的組成，以及身份認同的轉變過程，是 1.5 代移民的認同研究中，最值得探究的部份，也是 1.5 代移民本身具有的獨特性之一。

第四節 1.5 代回流移民的未來動向

當被詢問到關於未來的遷移計畫時，多數受訪者目前沒有明確的規劃；認為自己可能會長久留在台灣的有 19 位，表示「不一定」的有 10 位，有 8 位年輕移民認為自己將來會離開台灣，其中 4 位已初步訂定移出的時間，移出原因仍然是以教育因素為主，覺得台灣的教育環境不佳，且升學歷力太大，因而計畫在子女達到就學年齡時，便要再次離開台灣；另外 4 位年輕移民的家人仍在移居地生活，因此在自我生涯規畫中，最終仍是要回到家人居住的國度，與家人團聚。

若單獨探討再次移出的意願，年輕移民希望再次移居海外的比例非常高；受訪者們表示，即使已決定在台灣發展，難免仍會想念移入國的生活，且會在兩地之間做比較，尤其是在小學時期即移出海外者，在移居地的回憶與生活經驗組成了人生相當重要的部份，且自己不論是在觀念思考或是言行舉止方面，皆受到移居地社會相當大的影響，與移居地的聯結難以切斷，於是形成兩地都是自己的家鄉，而難以抉擇長住地點的狀態。

但若加上現實因素的考量，情況就變得明確。以外在環境因素而言，兩地的就業結構、市場的發展性、經濟景氣好壞，以及薪資待遇…等差異性，都是年輕移民需要再三考慮的重要事項，例如回流自阿根廷的受訪者們表示，在阿根廷的經濟情況沒有好轉的情況下，不太可能回到阿根廷居住；回流自美國的受訪者#35 也認為，雖然自己較喜歡在美國的生活，未來也打算再回美國定居，但受到金融風暴影響，目前美國的經濟情況不佳，使她無法確切決定自己何時會離開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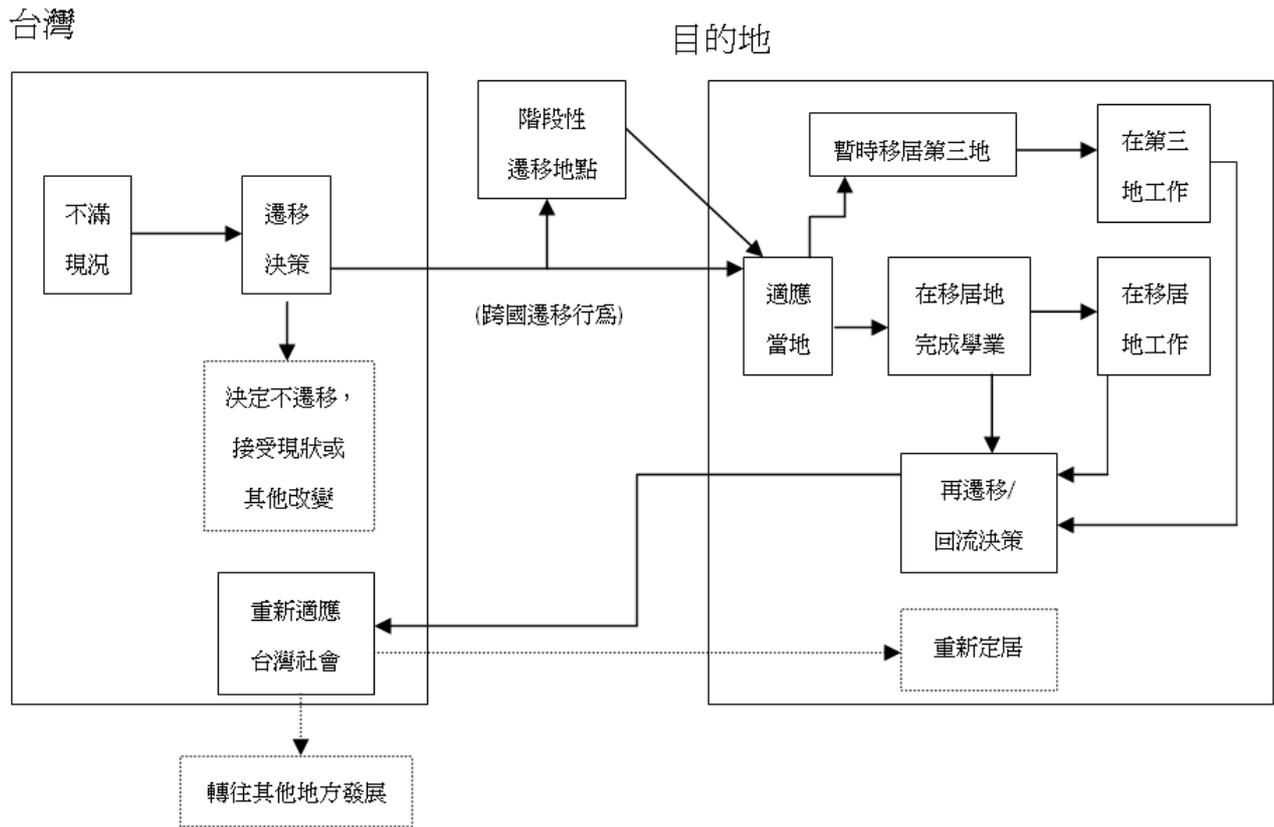
個人與家庭因素，也是決定是否再次移出的關鍵。在本研究中，許多 1.5 代移民是因為家庭因素而回流台灣，特別是希望能陪伴與照顧年紀漸長的父母親；在此情況之下，多數人會以父母目前的居住地做為第一優先考量的停留地點，因此未來數年，甚至數十年，若沒有其他的意外情形，不會考慮離開台灣；另外，對女性受訪者而言，因婚姻因素而考慮永久留在台灣，是極為常見的情形。年輕移民回流後，在台灣找到自己（未來）的婚姻伴侶，但對方不一定具有海外國家的公民身份或居留權，甚至可能缺乏居住海外的經驗；當婚姻伴侶的家人、朋友、工作...等生活重心全部建立在台灣時，便難以要求對方放下一切隨自己到海外重新開始，於是考慮永久定居台灣；若是自己的父母/親人還在海外，則會與先生和孩子定期至海外探訪，但全家再次移居的可能性極低。

相較之下，因工作因素而回流的年輕移民，特別是男性移民，對於未來遷移的可能性抱

持著較為開放的態度，認為海外若有更好的工作或發展機會，並不排斥長期外派或再次遷居海外。受到傳統觀念或大環境的機會結構的影響，多數女性回流移民會為了丈夫而留在台灣，不考慮再往外發展，也傾向不接受長期外派的工作，以免造成家人分居兩地的情形；男性回流移民多認為即使是婚後，因工作而再次移居海外仍然是可以接受的情況；女性隨配偶移出，比男性隨伴侶移出的可能性較高，也更可被接受。

由此看來，對於是否在一地永久停留，或是能否讓移入者產生長久定居當地的打算，人際網絡的牽絆往往是年輕移民的首要考量之一；另外，能否適應當地的生活，擁有正面的生活經驗，以及是否對於土地及在地的人們產生認同、自覺被社會所接納、擁有在地的歸屬感，亦會是決定年輕移民是否再次移出的重要關鍵，特別是具有跨國移動能力的高素質人力資源，因為他們所擁有的競爭力高，可選擇的機會較多，當在地的生活遭遇挫折，或是在地的社會缺乏對於移入者缺乏足夠的包容與支持時，無形中使回流者自覺與他人產生隔閡，而易於在缺乏歸屬感的情況下，考慮向外尋求發展，間接造成人力資源的流失，對於整體的社會發展，必定不會是正向的影響。

綜觀台灣 1.5 代年輕移民的整體遷移歷程，包含當年隨父母親移出台灣、因教育或工作因素遷居第三地、回流台灣，以及未來是否再次移出的人生規劃，可將其路徑與遷移概念繪製如圖 6；其中實線部份代表本研究之受訪者們的親身遷移路徑，虛線部份代表年輕移民曾經擁有但未實現的遷移決策，以及未來可能的遷移計畫。



資料來源：本圖以廖珮君（2005）所做關於澳洲 1.5 代回流移民遷移路徑示意圖為基礎，綜合本研究之受訪者們的個人經歷將以修改。

圖 6：台灣 1.5 代年輕回流移民遷移路徑概念示意圖

進一步分析受訪者們的遷移經歷，可看出移居不同國家的年輕移民所具有的遷移特性與共同移動路徑：

- (1) 回流自阿根廷的受訪者們，當年多是因政治因素，或為了家中男孩子的兵役問題，在移民代辦公司的建議下，選擇移居阿根廷。年輕一代成長之後，出現 4 種不同的遷移方向：
1. 留在阿根廷完成大學學業，並在當地獲得全職工作，直到受阿根廷經濟危機的影響，才回流台灣；
 2. 完成中學學業後，以僑生身份回台就讀大學與研究所，並因此長久居留台灣；
 3. 留在阿根廷完成高等教育的年輕移民，因台灣政府不承認部份的阿根廷學歷或證照，因此前往美國考取同等學歷或執照，再回流台灣；
 4. 部份年輕移民選擇前往美國或德國求學，完成學業後返回台灣。
- 至於未來的遷移計畫，多數受訪者認為自己會永遠留在台灣，部份年輕移民表示將會為了子女教育而再次遷居海外，但不一定回流阿根廷；少數受訪者考量到自己的家人仍留在阿根廷，計畫未來再次回阿根廷定居，但目前沒有明確的時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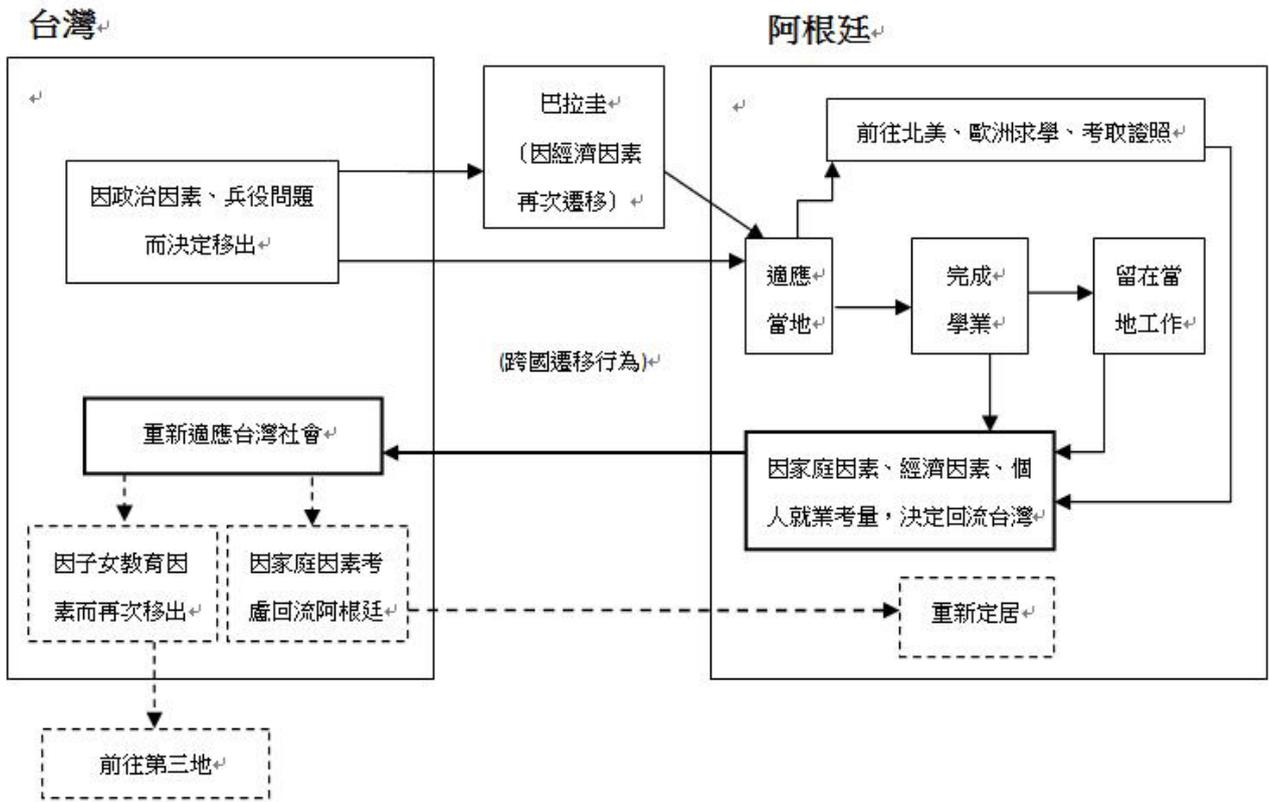


圖 7：阿根廷 1.5 代年輕回流移民遷移路徑示意圖

(2) 回流自澳洲的 1.5 代移民，當年多因教育因素而選擇遷居澳洲；其過往的遷移路徑較為單純，多往返於台、澳兩地之間；多數澳洲回流移民表示相當喜愛澳洲的生活環境，希望能再回澳洲定居，但短期內不會付諸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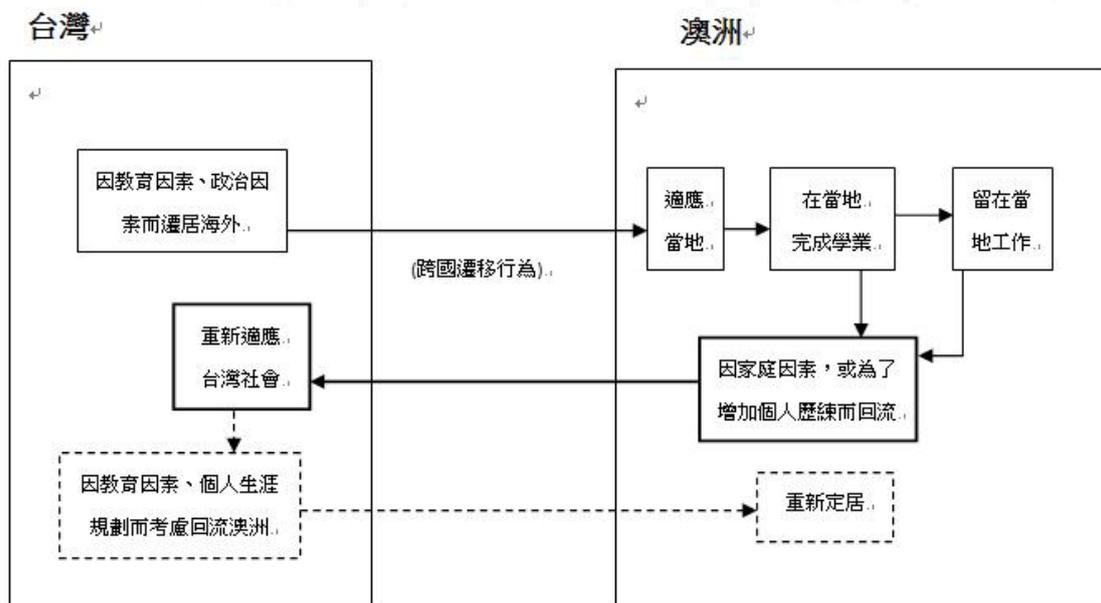


圖 8：澳洲 1.5 代年輕回流移民遷移路徑示意圖

(3) 回流自紐西蘭的移民，移出原因與澳洲年輕移民相似，以子女教育因素為主；年輕移民成長之後，可能前往澳洲接受高等教育，並留在當地發展，或前往他國就業；家庭/父母因素是其回流台灣的主因。在本研究的受訪者中，來自紐西蘭的年輕移民不排斥因工作、婚姻…等因素而再次遷居海外，但目前並無明確的再遷移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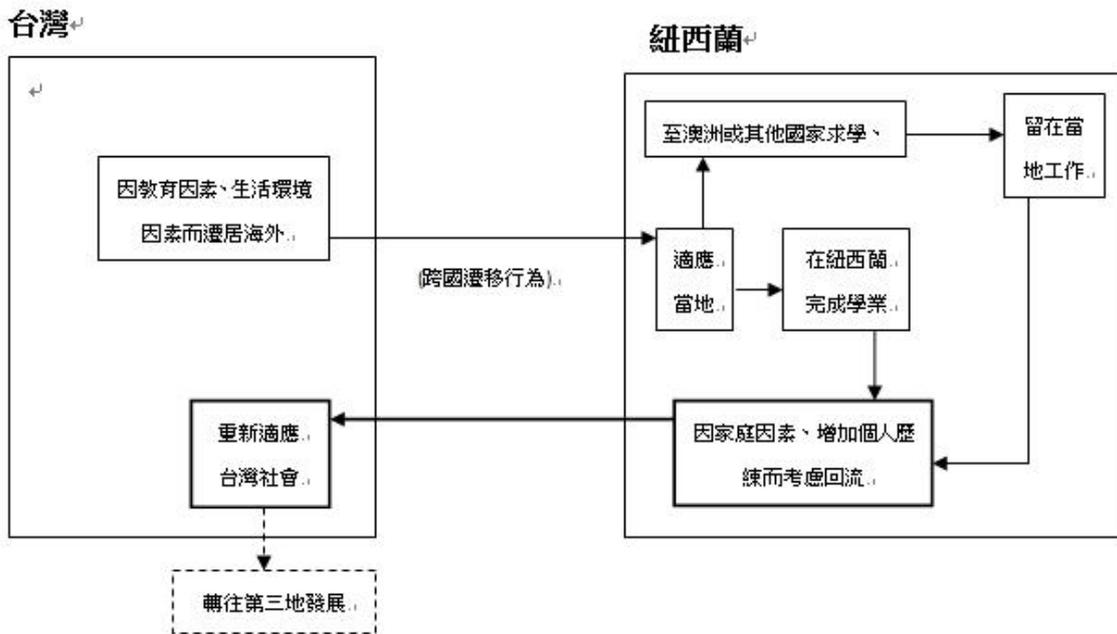


圖 9：紐西蘭 1.5 代年輕回流移民遷移路徑示意圖

(4) 來自加拿大的年輕移民，當年之所以遷居海外，同樣是為了尋求更多的教育資源與更好的生活環境，希望能夠接受加拿大的啟發式教育，或進一步前往美國求學。在家庭遷移型態方面，幾乎所有的加拿大年輕移民都是出身自空中飛人家庭，與台灣方面聯繫密切，會定期回台探訪親友。回流原因兼具家庭與經濟因素，除了回台與父母、親友團聚，也希望藉由自身優勢尋求較多的就業機會與未來的職場發展性。關於未來的再遷移計畫，有 2 位年輕移民（#18、#37）表示會為了下一代，再次移居加拿大；部份受訪者則認為，雖然喜愛加拿大的生活環境，但回流加拿大的可能性並不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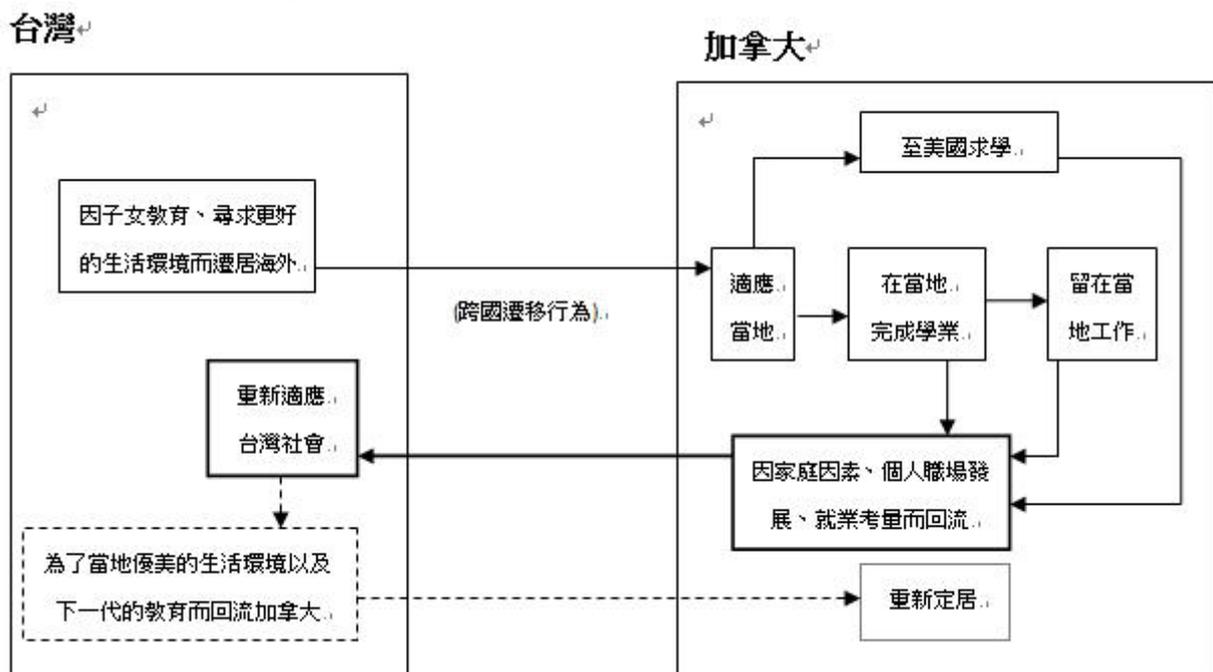


圖 10：加拿大 1.5 代年輕回流移民遷移路徑示意圖

(5) 回流自美國的移民，皆以依親身份前往當地，依遷移時間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年紀較幼小時隨父母移出，在當地成長，一是在中學時期或完成中學學業後，才移居美國。前一類年輕移民是為了家庭或教育因素回流台灣，希望在台灣停留數年後，再次返回美國定居；第二類移民則是在當地完成學業，工作數年後，因為喜愛台灣的生活，而自主回流，願意長久定居台灣，不考慮返回美國或移居他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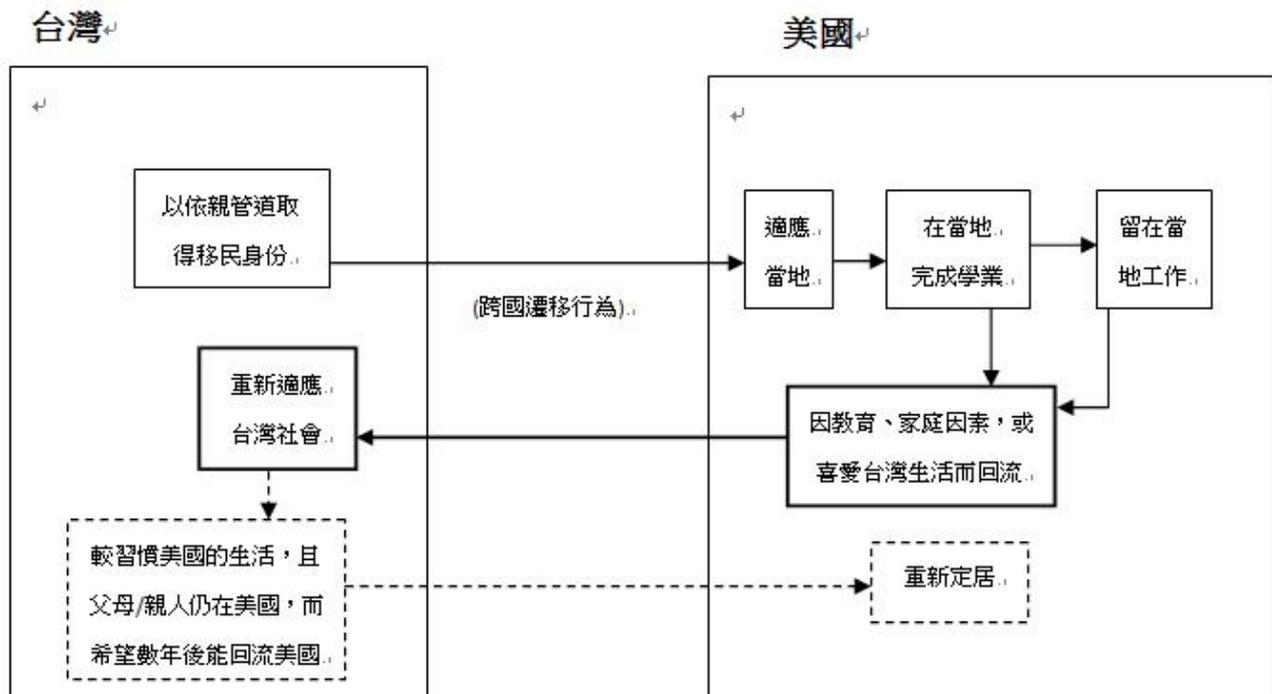


圖 11：美國 1.5 代年輕回流移民遷移路徑示意圖

綜觀 1.5 代移民的遷移歷程，從當年的移出，回流後的適應過程，直到未來的再次遷移計畫，可發現台灣社會的轉變與不變之處。以個人角度來看，家庭因素一直是影響年輕移民遷移決策的關鍵之一，經濟因素居次；以外在環境而言，回顧 1980 年代的移出原因，政治因素對於人口外移的影響力似乎稍微減弱，但教育、環境與社會因素仍然是年輕移民選擇未來再次遷居海外的主因之一。

在全球化的時代之下，人口的流動趨於頻繁，如何留住來自各方的人才，是在地發展重要的課題之一，對台灣的重要性亦然。與在海外出生、成長的第二代移民相比，1.5 代移民可算是台灣與移居國，甚至是第三國以上所共同塑造的優秀人力資源；但曾經在台灣生活的過往、人際之間的連結、對台灣這塊土地的情感，以及台灣社會所能提供的機會與發展性，使得年輕移民決定帶著在海外所習得的訓練與經歷回流台灣，若能留住這些自海外回流的年輕人才，必然能增加台灣社會的多元性與競爭力，而對未來的發展有正向的助益。然而，如何才能吸海外年輕移民回流？對於已回流者而言，如何才能使他們接受、適應在台灣的生活，擁有回鄉的歸屬感，並進而為台灣社會奉獻專業與心力，仍然是社會大眾與回流移民兩方面都必須共同面對與思考的問題。

第五章 結論

移民是一條一旦選擇便無法回頭的道路，不論初始的決策是否由自主決定，一旦開始了遷移的旅途，個體必然會受到不同地域之自然環境與社會文化的影響，而有所轉變，包含外在行為及內在思考，會逐漸不同於生命歷程完全建構於單一在地的人士。然而，個體無法完全脫離在地的社會，生命的發展也無法如完全無交集的平行線，當移民落腳於某一地域時，為了能於在地安適生活，移入者勢必得調整自己的心態與舉止，以配合當地社會運作的原則；因此，在遷移行動之後，移民必然面臨一段調適的過程，調適的程度及所需的時間，與年齡、對當地的了解程度、個人性格、是否有親友支持...等個人因素，以及他者對於回流者之態度、文化差距、社會之開放性與包容程度...等外在環境因素有關。

在時空變化與社會發展脈絡之下，從早期政治不穩定與害怕兩岸發生戰爭，到後來希望擁有更好的生活環境及為子女爭取較多的教育資源，部份台灣人民選擇移居海外，因而出現一群在台灣出生、居住數年後，跟隨父母移居海外的小移民，即為所謂的 1.5 代移民。以遷移時間與目的來看，1.5 代移民不同於早期為了深造而前往美國的留學生，或是為了尋求個人最大發展利基而跨越國界的彈性公民，他們多是在就讀中學或之前，被動隨父母移出，試著適應移居地的生活與風俗習慣，學習在地的語言與價值觀，一點一滴建立自我的人際網絡，並逐漸累積與鍛練自身各項有形與無形的資本。個人的生活經驗、生命歷程與回憶，奠基於不同的土地之上，由數個不同社會文化共同形塑，而產生具複合性的整體，便是 1.5 代移民的特殊性所在。

綜觀 1.5 代回流移民的經歷，發現其遷移模式雖仍置於全球化與跨國化的架構之下，卻並不與現存的、普遍認知的方式完全相同；不像定期往返兩地以探望子女的空中飛人父母，也不像來去各地，為了經營事業或爭取個人利益的彈性公民，更不同於循環遷移的跨國企業外派人員或短期移工。這些年輕移民，雖是跨國遷移者，型態卻更加偏向回流者，但相較於上一世代的回流移民，其長久停留台灣的意願與可能性較低，對於再次移居海外，抱持著開放的心態，並不拘泥於在地。他們是具有高度跨國移動特質的移民，但跨國遷移的頻率較低，遷移行為發生的時間間隔較長且不具固定的週期性，儘管遷移行為的出現與個人生命階段的目標有所關聯，但兩者之間並不具備必然性。

研究結果顯示，1.5 代移民的回流是具有多重考量的，家庭與經濟因素是回流的主因，但

也同時伴隨著婚姻、教育等因素；是移民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中，依據個人目標，主觀評估兩地或三地以上的情形，所做出的回流決策，並非因為擁有回流的意識，或個人與原鄉的情感聯結，而選擇回流台灣；此點相較於加勒比海地區的回流移民研究結果（Gmelch, 1980, 1986, 1992; Thomas-Hope, 1999; De Souza, 2005; Phillips and Potter, 2005），有著極大的差異，顯示了不同的地區，會蘊育出不同的人口遷移情形，亦點出了傳統遷移理論無法完全應用於不同社會脈絡與世代之狀況。

儘管大環境的經濟因素以及個人的就業考量同樣是台灣 1.5 代移民回流的重心之一，但與現有的華人回流研究結果相比（Iredale *et al.*, 2003; Ip, 2006; Chiang and Liao, 2008; Saxenian, 2007; Salaf *et al.*, 2008），台灣的 1.5 代移民更為強調家人之間的團聚與人際網絡的牽絆。如同 Salaf *et al.* (2008) 所言，經濟結構在某種程度上主宰了移民離開再次遷移或回流的可能性，但是，促使回流者逐漸根著在當地，弱化再次遷移之可能的最大原因，往往源自於人際網絡的擴展。1.5 代移民回流台灣之初，若缺乏親友的支持與協助，容易在生活當中遇到挫折，不欣賞在地的生活方式與社會習慣，而想要回到移居地，或是藉由其他形式遠離台灣，例如因工作因素外派海外；然而，隨著在地之人際關係與社會網絡的建立，留下的意願逐漸滋長，特別是重要關係人士的存在，如好友、人生伴侶及子女，會使台灣這塊土地對回流者產生不同的意義，離開的意願也因此降低。

關於年輕移民回流後的適應情形，在本研究中，多數受訪者認為自己在回台兩年之後，已能夠接受與習慣台灣的生活，掙扎於台灣與移居地之間的比較情結之情形也逐漸減緩，但其適應的心路歷程，並不完全符合 Richardson (1974) 所描述的階段轉變。部份年輕移民，特別是來自加拿大空中飛人家庭的受訪者，表示回流台灣的適應歷程相當平順，並未經歷沮喪的時期，但也有部份受訪者認為，自己在回台生活的過程中，遭遇許多的挫折與困難，移入初始的新奇階段並不明顯。受訪者之間的經歷與感受，之所以會有如此的差異，與個人背景因素，包含年齡、性格、語言能力、家庭遷移型態、回流意願等，以及在海外的經歷，如主流社會對移民的接納程度、移居地之華人社群的情形、移民本身與主流族群的互動情形等，皆有所關聯。整體而言，對台灣社會的了解、熟悉程度高，回流後的適應歷程會較為順利。

在自我認同方面，多數年輕移民選擇以「台灣人」的身份自居，並接受台灣與移居地的雙重身份。此種身份的選擇，與訪談當下的情境、個人在現階段的自我定位及目的有關，同時也受到當年在海外經歷的影響，當年輕移民自覺無法融入主流族群，或是曾有過被歧視的經驗，便有可能偏離對移居地身份的認同，轉而強化族裔與原鄉的身份認同。值得注意的是，

1.5 代移民的自我身份認同並非固定不變的，儘管多數年輕移民在訪談當下能明確對於自我身份做出選擇，答案也呈現相當的一致性，但 1.5 代移民本身經歷的特殊性，所塑造出複雜的認同組成型態，不應被直觀的身份勾選結果所簡化，而需更為強調此種選擇背後的原因、所代表的意涵，以及可能的轉變。

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國際接觸變得頻繁，競爭也變得激烈，跨國性的人才因此成為被積極爭取的目標之一，各國政府皆試圖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管道來吸引居留海外的高技術性僑民回流，希望能做為國家進步的動力；台灣早期由美國矽谷回流的 IT 工程師，配合政府政策，所帶動的產業轉型與經濟發展，就是一明顯的案例。儘管如此，其他類型的台灣回流移民，卻鮮少被討論與注意；透過此一對於 1.5 代年輕回流移民的研究，除了增加國內現有移民研究的多元性，研究者亦試圖促進社會大眾對於回流移民的了解，展現年輕移民的價值，讓他們的聲音被聽見；同時，希望此一研究結果能做為即將遷移/回流者的經驗參考，以及政府相關部門制定、推動僑務政策的背景資料之一，期望經由政府、社會大眾，以及回流移民三方面的合作，形成台灣社會正向發展的部份動力。

囿於資源、時間、樣本等條件的限制，本研究結果只呈現了 1.5 代移民的部份面貌；在此，研究者提出了未來可繼續處理的研究課題，以增添此一研究的完整性與價值性：(1) 分析回流自不同國家的 1.5 代移民之自我認同與適應情形，與第一代、第二代移民之間的差異性；(2) 說明移居不同國家之 1.5 代回流移民的政治認同情形，並解析對其自我身份認同所造成的影響；(3) 了解投身於不同職場領域的年輕回流移民之跨國遷移情形、適應歷程，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並加以比較；(4) 描述台灣、中國，與香港的 1.5 代移民回流後之經歷，比較其差異，並分析背後的影响因素。

參考文獻

- 大紀元新聞 (2007/10/04) <http://www.epochtimes.com/b5/7/10/4/n1856070.htm>
- 內政部 (2006) 2006 年人口政策白皮書
<http://www.immigration.gov.tw/aspcode/41.asp?classid=1>
- 自由時報 (2008/07/21)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jul/21/today-e4-2.htm>
- 行政院主計處 (2008)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4616&CtNode=3566>
- 阿根廷商務文化辦事處 (Oficina Comercial Y Cultural Argentina En Taiwan)
<http://www.argentina.org.tw/index.htm>
- 教育部國際文化教育事業處 http://www.edu.tw/BICER/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6235
- 新華社 (2004.09.16.) <http://www.news.cn>
- 僑委會 (2001) 華僑經濟年鑑--美洲篇(92 年版)，
<http://www.ocac.gov.tw/public/dep3public.asp?selno=2442&no=2442&level=B>
- 僑委會 (2004) 華僑經濟年鑑--美洲篇(93 年版)，
<http://www.ocac.gov.tw/public/dep3public.asp?selno=2442&no=2442&level=B>
- 監察院公報 <http://www.cy.gov.tw/communique.asp>
- 王志弘、許妍飛譯 (2006) 社會認同，台北市，巨流圖書。
- 王明珂 (2005) 華夏邊緣，台北市，允晨出版。
- 江時學 (2002) 阿根廷危機的由來及其教訓—兼論 20 世紀阿根廷經濟的興衰，拉丁美洲研究，第二期，2: 1-11。
- 佟新 (2003) 人口社會學，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市，二版。
- 李康、李猛譯 (2002) 社會的構成，台北市，左岸文化。
- 李繼利 (2006) 族群認同及其研究現狀，青海民族研究，17 (1): 51-53。
- 姜蘭虹、徐榮崇 (2000) 區位決策與就業適應—以雪梨的台灣移民為例，地理學報，27：1-20。
- 姜蘭虹、宋郁玲 (2001) 移民就業類型與適應—以澳洲台灣移民為例，地理學報，29：1-26。
- 姜蘭虹、徐榮崇 (2003) 澳洲台灣僑民現況之研究，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 姜蘭虹、徐榮崇 (2005) 澳洲台灣移民第二代的就業適應與回流之研究(II)，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徐榮崇 (2002) 澳洲台灣移民居住地的選擇與決策過程—以雪梨、布里斯本及墨爾本為例，中國文化大學地理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徐榮崇、姜蘭虹 (2004) 澳洲台灣移民的空間性與地方性：居住地的選擇與決策思考，人口學刊，28：81-107。
- 徐榮崇、齊力 (2004) 2004 年加拿大台灣僑民現況之研究，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 徐榮崇 (2008) 集體記憶與社會資本—談加拿大台灣移民的居住地選擇與思維，人口學刊，37：115-150。
- 許夢芸譯 (2007) 文化研究智典，台北縣：韋伯文化。
- 張春興 (1996) 教育心理學，台北市：東華書局。
- 張玲(2001) 台灣新移民在美國的文化認同，盧超漢編，台灣的現代化和文化認同，美國：八方文化，208-237。
- 廖正宏 (1981) 人口遷移，台北市：三民書局。

- 廖珮君 (2005) 澳洲回流台灣年輕移民在台、澳社會間的適應與自我認同，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 楊智翔 (2006) 澳洲台灣年輕移民生活適應與身分認同過程之探討—以墨爾本為例，台灣大學地理與環境資源學系碩士論文。
- 蔡珮 (2007) 符號互動、媒介、家鄉與離散認同：布里斯本澳籍台裔族裔邊界的形成與流動，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博士論文。
- 鍾佳君 (2007) 加拿大台灣回流年輕移民在適應與認同之研究，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 蕭新煌、Smith, C.、周素卿、陳東昇、曾熾芬 (1994) 台灣地區移民及其在美國的調適過程與回流轉向：以洛杉磯及紐約為例，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 Albarracin, J. (2004) Selecting immigration in modern Argentina: economic, cultural, intern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a dissertation presented to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 Berry, J. (2007) 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and adaptation, In: Lansford, J., Deater-Deckard, K. and Bornstein, M. (eds.), *Immigrant Famili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69-82.
- Borjas, G. and Bratsberg, B. (1996) Who leaves? The outmigration of the foreign-bor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8 (1): 165-176.
- Cerese (1974) Migration and social change: expectations and reality: a study of return migr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Ital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8 (2): 245-262.
- Chiang, L. and Kuo, L. (2000) An examination of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Taiwanese immigrants in Australia, *Asia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9(4): 459-481.
- Chiang, L. and Hsu R. (2006) Taiwanese in Australia: two decades of settlement experiences, *Geography Research Forum*, 26: 32-60.
- Chiang, L. (2008) 'Astronaut families': transnational lives of middle-class Taiwanese married women in Canada,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9 (5): 505-518.
- Chiang, L. and Liao, P. (2008) Back to Taiwan: adaptation and self-identity to young Taiwanese return migrants from Australia,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36: 99-135.
- DaVanzo, J. and Marrison, P. (1981) Return and other sequences of 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Demography*, 18 (1): 85-101.
- DeJong, G. and Fawcett, J. (1981) Motivation for migration: an assessment on a value-expectancy model, In: DeJong, G. and Gardner, R. (eds.),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 De Souza, R. (1998) The spell of the Cascadura: West Indian return migration, In: Klak, T. (ed.), *Globalisation and Neoliberalism: the Caribbean Context*, London: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27-253.
- De Souza, R. (2005) No place like home: returnee R&R (retention and rejection) in the Caribbean Homeland, In: Potter, R., Conway, D. and Phillips, J. (eds.), *The Experience of Return Migration—Caribbean Perspectives*, Burlington: Ashgate, 135-157.
- Dustmann, C. (2003) Children and return migration, *Population Economics*, 16: 815-830.
- Faist, T. (1997) The crucial meso-level, In: Hammer, T., Blockmann, G., Tamas, K. and Faist, T. (ed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mmobility and Development*, Oxford: Berg, 182-217
- Faist, T. (2000) The volume and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Guo, J. and Iredale, R. (2003) The view from Australia, In: Iredale, R., Guo, F. and Rozario, S. (eds.), *Return Mig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26-47.

- Gmelch, G. (1980) Return migratio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9: 135-159.
- Gmelch (1986) The readjustment of return migrants in Western Ireland, In: King, R. (ed.), *Return Migr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Problems*, New Hampshire: Croom Helm Ltd., 153-170.
- Gmelch, G. (1992) *Double Passage—the Lives of Caribbean Migrants Abroad and Back Home*,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Gow, J. and Iredale, R. (2003) Socioeconomic impacts of return migration: developing a comparative framework, In: Iredale, R., Guo, F. and Rozario, S. (eds.), *Return Mig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169-181.
- Graves, T. (1967) Psychological acculturation in a tri-ethnic community,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23: 337-350.
- Hall, S.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Rutherford, J.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273-325.
- Ho, D. (1994) Cognitive socialization in Confucian heritage cultures, In: Greenfield, P. and Cocking, R. (eds.), *Cross-cultural Roots of Minority Child Development*,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85-314.
- Ho, E., Ip, M. and Bedford, R. (2001) Transnational Hong Kong Chinese families in the 1990s, *New Zealand Journal of Geography*, 111: 24-30.
- Huang, S. and Yeoh, B. (2005)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nd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China's "study mothers" in Singapore, *Global Networks*, 5 (4): 379-400.
- Ip, D., Wu, C.T. and Inglis, C. (1998) Settlement experiences of Taiwanese immigrants in Australia, *Asian Studies Review*, 22 (1): 79-97.
- Ip, M. (2003) Seeking the last Utopia: the Taiwanese in New Zealand, In: Ip, M. (ed.), *Unfolding History, Evolving Identity—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 Auckland: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185-211.
- Ip, M. (2006) Returnees and transnationals: evolving identities of Chinese(PRC) immigrants in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33: 61-102.
- Iredale, R., Guo, F. and Rozario, S. (2003) Introduction, In: Iredale, R., Guo, F. and Rozario, S. (eds.), *Return Mig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1-26.
- Jones, D. (1992) Which migrants? temporary or permanent?,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 645 (1): 217-224.
- King (1986) Return Migr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overview, In: King, R. (ed.), *Return Migr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Problems*, New Hampshire: Croom Helm Ltd., 1-37.
- King, K. and Newbold, K. (2008) Return immigration: the chronic migration of Canadian immigrants, 1991, 1996 and 2001,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4: 85-100.
- Knorr, J. (2005) When German children come "home"--experience of (re-)migration to Germany and some remarks about the "TCK" issue, In: Knorr, J. (ed.), *Childhood and Migration*,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51-77.
- Lee, S. (1992) The attitude of Taiwanese immigrants in Brisbane towards assimilation: an internal perspective,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Honors Board, School of Modern Asian Studies, Griffith University.
- Ley, D. and Kobayashi, A. (2005) Back to Hong Kong: return migration or transnational sojourn, *Global Networks*, 2: 111-127.
- Lien, P. (2004) Behind the numbers: talking politics with foreign-born Chinese American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2 (2): 87-112.
- Liu, N. (2009)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Latin America,

http://www.danwei.org/guest_contributor/chinese_diaspora_in_latin_amer.php

- Luo, K., Guo, F. and Huang, P. (2003) Chinese: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emerging trends of reversal of the brain drain, In: Iredale, R., Guo, F. and Rozario, S. (eds.), *Return Mig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88-111.
- Olesen, H. (2002) Migration, return, and development: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0 (5): 125-149.
- Ong, A. (1999)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Phillips, J. and Potter, R. (2005) Incorporating race and gender into Caribbean return migration: the example of second generation 'Bajan-Brits', In: Potter, R., Conway, D. and Phillips, J. (eds.), *The Experience of Return Migration—Caribbean Perspectives*, 69-89.
- Phinney, J. (1990) Ethnic identity i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review of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8 (3): 499-514.
- Phinney, J., Romero, I., Nava, M. and Huang, D. (2001) The role of language, parents, and peers in ethnic identity among adolescents in immigrant familie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0 (2): 135-153.
- Phinney, J. and Ong, A. (2007) Ethnic identity development in immigrant families, In: Lansford, J., Deater-Deckard, K. and Bornstein, M. (eds.), *Immigrant Famili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51-69.
- Potter, R. (2005) The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second generation return migrants to St. Lucia and Barbados, In: Potter, R., Conway, D. and Phillips, J. (eds.), *The Experience of Return Migration—Caribbean Perspectives*, Burlington: Ashgate, 27-49.
- Potter, R. (2005) 'Tales of two societies': narratives of adjustment among second generation return migrants to St. Lucia and Barbados, In: Potter, R., Conway, D. and Phillips, J. (eds.), *The Experience of Return Migration—Caribbean Perspectives*, 49-69.
- Ricardson, A. (1974) *British Immigrants and Australia: A Psychosocial Inquiry*,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Sassen S., (1998) *The mobility of labor and capital: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labor flo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iller, N., Basch, L. and Blanc-szanton, C. (1992) Transnationalism: a new analytic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migration,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 645: 1-24.
- Scott, W. and Scott, R. (1989) *Adaptation of Immigrants*, Oxford: Pergamon Press.
- Salaff, J., Shik, A. and Greve, A. (2008) Like sons and daughters of Hong Kong: the return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The China Review*, 8 (1): 31-57.
- Saxenian, A. (2001) Silicon Valley's new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Cornelius, W., Espenshade, T. and Salehyan, I. (eds.),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the Highly Skilled*, San Diego: Center for Comparative Immigr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234.
- Saxenian, A. (2007) *The new Argonauts: regional advantage in a global ec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helton, J.N. and Sellers, R.M. (2000) Situational stability and variability in African American racial identity, *Journal of Black Psychology*, 26: 27-50.
- Stefanssom, A. (2004) Homecomings to the future: from diasporic mythographies to social projects of return, In: Markowitz, F. and Stefansson, A. (eds.), *Homecomings—Unsettling Paths of Return*, Oxford: Lexington Books, 2-21.
- Thomas-Hope, E. (1999) Return migration to Jamaica and its development potential,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37 (1): 183-204.
- Tong, B. (2003) *The Chinese Americans*, Colorado: Colorado University Press.
- Tsang, E. (2001) *Adjustment of mainland Chinese academics and students to Singapore*,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5: 347-372.
- Tsay, C. (2003) Taiwanese: significance, characteristics and policies on return skilled migration, In: Iredale, R., Guo, F. and Rozario, S. (eds.), *Return Mig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112-135.
- Tsuda, T. (2004) When home is not the homeland: the case of Japanese Brazilian Ethnic return migration, In: Markowitz, F. and Stefansson, A. (eds.), *Homecomings—Unsettling Paths of Return*, Oxford: Lexington Books, 125-145.
- Virtanen, K. (1981) "Counter-current: Finns in the overseas return migration movement," Finnish diaspora: Canada, South America, Africa, Australia and Sweden, In: Karni, M. (ed.), Paper presented at Finn Forum Conference, November, 1th-3rd, 1981, Toronto.
- Wang, C. B., Wong, S. L. and Sun, W. B. 2006. "Haigui: A New Era in China's Policy toward the Chinese Diaspora."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2(2): 294-309.
- Ward, C. (1999)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revisited,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0: 422-441.
- Ward, C. and Kennedy, A. (1999) The measurement of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3 (4): 659-677.
- Waters, J. (2005) Transnational family strategies and educ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diaspora, *Global Networks*, 5 (4): 359-377.
- Wilhelm, K. and Biers, D (2000) No place like home,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15:72-75.
- Wong, S. (1992) Emigration and Stability in Hong Kong, *Asian Survey*, 32 (10): 918-933.
- Wong, L. (1997) Glob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migration—a study of recent Chinese capitalist migration from the Asian Pacific to Canada,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2 (3): 329-351.
- Wong, L. (2003) Chinese business migration to Australia,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ate policy and the global immigration marketplace,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2 (3): 301-331.
- World Bank (2000)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port 1999/200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in, R. K. 2003.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 Thousand Oaks: Sage.
- Bretal, E. (2005) "¡Ay, este chino habla castellano!" El caso de los jóvenes inmigrantes de origen taiwanés en la ciudad de La Plata, IV Jornadas de Sociología de la UNLP: "La Argentina de la crisis. Desigualdad social, movimientos sociales, política e instituciones", 23, 24 y 25 de noviembre de 2005, Facultad de Humanidades y Ciencias de la Educación,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La Plata.
- INDEC(2001) Poblacion extanjera empadronada en el pais por lugar de nacimiento, segun sexo y grupos de edad, <http://www.indec.gov.ar>
- Zuzek, C. (2004) Identidad y aculturación--El caso de los inmigrantes taiwaneses jóvenes. II° Jornadas de Investigación del IDICSO, Facultad de Ciencias Sociales de la Universidad del Salvador, Buenos Aires, Argentina.

附錄：台灣 1.5 代年輕回流移民研究問卷

編號(No.)：_____ 姓名(Name)：_____

日期(Date)：_____ 場合(Place of interview)：_____

一、個人資料

1. 性別：男性 女性 2. 年齡：_____ 3. 出生地：_____
4. 電話：(H) _____ (Mobile) _____
5. E-mail：_____
6. 您在台灣的住址是：(請至少填上城市)

7. 回台灣之前，您是住在加拿大的哪一個城市呢？

8. 畢業學校：_____
9. 主修科目：_____
10. 目前從事的行業為：_____
11. 自己慣用的語言是：a. _____ b. _____ c. _____
12. 在加拿大的家中所使用的語言是：a. _____ b. _____
13. 目前您是否具有加拿大的公民身份？ 是 否

二、移出台灣之經驗

1. 您初次移出台灣的年齡是：7 歲以下 8~12 歲 13~18 歲 19~25 歲 26~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 歲以上
2. 是否為全家遷移？ 是 否
3. 當初從台灣移出的原因是？
a. _____ b. _____
c. _____ d. _____
4. 移民之前您或家人曾先到加拿大當地看過環境嗎？ 是 否

5. 移民之前，您在台灣曾做過哪些準備呢？

6. 當初申請移民加拿大的項目為？

投資移民 技術移民 依親 學生 其他_____

7. 移入加拿大初期，在當地有什麼不適應的情形呢？您如何處理？

a. _____

b. _____

8. 您認為您當初花了多久的時間適應加拿大的環境？

3個月內 3~6個月 7~12個月 一年以上 兩年以上

9. 居住在加拿大時，往來的朋友是否會以華人為主？ 是 否

10. 在加拿大曾參與過哪些組織、社團，或是義工活動(volunteer)？

11. 這些組織對於您有何影響？

12. 您覺得自己的英語程度比起當地人而言是：

自己的比較好 和當地人一樣 比當地人差一些

13. 在加拿大有哪些工作經驗？

a. _____ b. _____

14. 在加拿大求職或工作時，曾遇到什麼困難嗎？如何處理呢？

15. 在加拿大時，是透過哪些管道得到關於台灣的訊息？

16. 除了加拿大之外，曾居住過哪些其他國家？住了多久呢？

17. 定居國外時，您通常多久回台灣一次？

一年兩次以上 一年一次 兩年一次 三年以上一次

三、回台發展之經驗

1. 您初次回台灣發展的年齡是：13~18 歲 19~22 歲 23~25 歲 26~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 歲以上
2. 您回台灣的主要考量或原因為何？
a. _____ b. _____
c. _____ d. _____
3. 您是否有意願永久定居台灣？ 是 原因為 _____
 否 您預計何時會離開台灣？ _____
離開台灣的原因是 _____
4. 您的父母/家人對於您回台發展的看法如何？

5. 您覺得自己的中文程度是：很好 尚可 稍差 不好
6. 剛回到台灣時，在生活上最不能適應的是什麼？您如何解決？

7. 您認為您需要花多久的時間重新適應台灣的環境？
3 個月內 3~6 個月 7~12 個月 一年以上 兩年以上
8. 在台灣求學/求職或工作經驗上，曾有哪些不適應或難以接受的地方？

9. 您認為台灣的職場文化與國外最大的不同在於？

10. 您覺得您目前在職場或工作上的優勢與劣勢為何？

11. 您覺得移居國外的經驗，對於您個人的發展有什麼影響呢？

12. 您目前的婚姻狀況是：已婚 未婚
若是未婚，您對於婚姻對象的選擇有哪些偏好？

13. 對您而言，您覺得何處才是您的家？為什麼？

14. 您認為自己是哪一國人?(可複選，但請標明順序) 台灣人 加拿大人
 加拿大華裔(Chinese Canadian) 加拿大台裔(Taiwanese Canadian)
 Canadian Chinese Canadian Taiwanese 國際人 其他 _____

四、其他經驗及未來計畫

1. 您目前在台灣是否有覺得適應不良或無法接受的地方? 有 無
若有，是關於_____
2. 您是否考慮再回到加拿大定居或工作? 是 否
若有，原因為何?

3. 您是否有考慮移居第三地發展? 是 否
若有，請問您會想到哪一個國家? 原因為何?

4. 您會考慮讓您的孩子在哪裡長大或受教育?

5. 若有其他移民要回台灣發展，您會給他們什麼建議?
a. _____
b. _____